

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

走向大国之路
——邓小平与中美关系发展二十年

高瞻 著

丛书

天津古籍出版社

作者小传

高瞻，广东人氏，1959年12月生，汉族，历史学学士、经济学硕士、历史学博士，高级经济师。曾任《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和《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记事》副主编，在《党的文献》、《世界经济》、《世界经济与政治》、《港澳经济》、《中国纺织报》等报刊上发表过文章多篇。现任某中央大二型企业董事长。



前言

舞台与主角

外交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变迁的缩影。近代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从贫穷落后的弱国变成一个真正的世界性大国的历程，而最后完成这一历程的，就是邓小平主政中国及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 20 年。

从 1784 年 8 月 28 日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国皇后号”轮船驶入大清帝国的广州港开始，中国与美国的交往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两百余年间，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最初的中美关系，是平等的、正常的贸易关系，但是不久，中美关系的性质就变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对半殖民半封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侵略。在 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中美之间结成了同盟国关系，但是，这种同盟国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帮助国民党打内战失败了，随后，新中国与美国在朝鲜战场和台湾海峡进行了直接的军事对抗，接着，是长达 20 年的敌视和互不往来。在美国人的眼里，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是生活在“愤怒的孤独”之中。而美帝国主义，则是中国人民最仇恨的敌人。

但是，从 1972 年开始，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后历时



七年,中美两国冲破重重障碍达至关系正常化。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使中国获得了巨大的战略利益,中国外交也由此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美建交后,中国与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得到改善,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而中国和美国戏剧性地从敌对关系变成战略伙伴关系,从而携手对付他们的共同敌人——苏联霸权主义,使中国的国家安全得到了进一步的保障。随后中美两国又克服了对台售武的困扰,签订了“八一七”公报,使中美关系得到了六年的稳定发展。而这种稳定发展所奠定的基础,就使中美关系即使是遇上“六四”政治风波这样的超越了双边关系的复杂局面也显得非常的坚韧,几近崩溃的关系又奇迹般地在两三年的时间内恢复了正常。在1972年到1992年这20年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中,既有春风荡漾的吹拂,也有狂风恶浪的拍击,战略利益、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纵横交错,构成了这一时期中美关系风云变幻的复杂图景。随着这一复杂图景的变幻发展,中美关系也第一次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关系,并且,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中国也真正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成为国际社会中的重要一员。

在200年中美关系的历史上,也发生过许多令世人瞩目的事件。在清政府开始比较正式地同西方世界打交道的时候,是美国人蒲安臣率先倡导并身体力行“合作政策”;在老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势力范围接近尾声的时候,是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镇压义和团运动后,美帝国主义者比其他的帝国主义者更“慷慨”,退还“庚子赔款”的余额用在中国的“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上;而中美在朝鲜战争、台湾海峡危机和越南战争上的对抗,也几乎成了新的世界大战的导火索。但是,所有这些事件的发生,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过分弱小或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都没有对世界的战略格局产生过重大影响。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美两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地位和作



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以至于 1972 年尼克松在“打开”中国大门的第七天时兴奋地宣称“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1973 年 3 月,邓小平第二次复出。1974 年 4 月,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时,就开始了他自己所说的对中美关系的“参与”。1977 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此后,他一直密切注视着中美关系的发展,把握着中国对美外交的大局。邓小平既是宏观的决策者,又是具体的谈判者,同时扮演着战略家与策略大师的角色。因此,观察这段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无论如何离不开邓小平的言论和决策。实际上,我们在研究任何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时,都不能不注意参与其中的重要人物的作用。黑格尔说:“我们应当把世界历史人物——一个时代的英雄——认做是这个时代眼光犀利的人物;他们的行动、他们的言词都是这个时代最卓越的行动、言词。”

这样,本研究确定,从外交史的角度,以 20 世纪 70 年代初到 90 年代初这 20 年中美关系的发展为历史舞台,以邓小平为主角,探讨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性大国的变迁历程。

目 录

ROAD LEADS TO HIGH POWER



目
录

第一章	拓荒时代	1
	一、中美建交谈判	1
	二、邓小平访美	32
	三、《与台湾关系法》的出笼	38
第二章	冰河下的暖流	44
	一、里根对华政策的倒退	44
	二、“八一七”公报的诞生	59
	三、在摩擦中前进	72
第三章	阳光与风暴	87
	一、短暂的蜜月	87
	二、1989 年政治风波的影响	95
	三、再度正常化	112
第四章	统筹全局的战略观	131
	一、“东西南北”论天下	132
	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142
	三、从战略的高度审视中美关系	152
第五章	内外有别的政治观	164
	一、跨越意识形态的障碍	164



二、政治体制改革与美国模式批判	172
三、人权问题与政局稳定	182
第六章 兼收并蓄的经济观	196
一、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193
二、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	196
三、中美技术转让问题	209
第七章 解决台湾问题的夙愿	219
一、美台关系及对台售武问题	221
二、不排除使用武力的战略考虑	231
三、“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政治智慧	240
结 语	253
附 录 参考文献	260
后 记	276



第一章

拓荒时代

从尼克松政府到卡特政府这三届政府，是中美关系从解冻到建立正常关系的时期。1972年尼克松到中国的“破冰之旅”，中国方面的谈判代表主要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到1974年4月尼克松政府的后期，邓小平已经复出并代替病重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主持中国的对美外交工作。实际上，邓小平经历了尼克松、福特和卡特三届政府，主持了与美国进行长达七年的复杂谈判，最后完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一、中美建交谈判

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在苏联扩张主义的压力下，中国和美国分别从各自的战略利益出发，考虑结束已持续20年之久的敌对状态并结成遏制苏联的战略联盟。中国 and 美国的这种考虑以及随后采取的行动，使世界的政治军事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是非常严峻的。从50年代以来，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交恶，朝鲜战争、台湾海峡危机和越南战争



的明争暗斗,使美国成了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到 60 年代,中苏关系破裂,1969 年中苏边界还发生了严重的武装冲突,战争一触即发。其时,从中国的周边环境看,苏联在中国东北、华北和西北的中苏、中蒙边界陈兵百万,印度在西面敌意未消,东面从南朝鲜、日本到中国台湾省,正是美国的岛链防线,而美国还正在印度支那同与中国唇齿相依的越南进行战争。中国基本上是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在国际上,毛泽东把全球所有的国家划分成“三个世界”,中国在第三世界,中国与之打交道的国家,也多在第三世界。因此,中国的穷朋友不少,富朋友不多,要援助的不少,能帮忙的不多。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中国正面临着一种四面受敌的战略困境。而在国内,中国正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和社会都处于混乱状态。所以,打破这种内困外患的处境,对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中国的最主要的敌人中,口号上排的是“美帝、苏修”,实际上最危险的是“北极熊”——“修正主义”的苏联。从中国的统一战线理论出发,为了对付最危险的敌人,是可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实际上,在 1969 年的中苏边境冲突爆发后,毛泽东、周恩来请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师作“战略研究”,老师们提出的为对付苏联的威胁而在战略上“打美国牌”、“联美抗苏”的建议,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首肯。^①

从美国方面来看,尼克松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是要保持美国在世界政治和军事上的主导地位。但在已经形成了的“多极”世界里,要保持美国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是越来越困难了。要维持这种以美国为霸主的“秩序”,就需要一种新的“势力均衡”,也就是说,美国不能

^① 这段史实可参阅熊向辉:《历史的注脚——回忆毛主席、周恩来及四老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 年版;王永钦:《1969 年——中美关系的转折点》,载《党的文献》,1995 年第 6 期。



天马行空、孤军作战,美国必须与世界上所有非敌对的战略力量保持联系和协调的机制。在此时的美国全球战略中,中国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大国了,它是与美国、西欧、日本以及苏联并立的世界五大中心之一。从美国的角度出发,西欧和日本是稳定的盟友,苏联是最凶猛、最强大和最有威胁性的敌人,如果美国和中国能够化敌为友,那么,全球势力均衡的砝码就能操纵在美国手里,美国就将拥有最有利的战略优势。从策略上看,此时,美国有两个最为紧迫的问题,即如何应付苏联急剧发展的战略武器的威胁和彻底摆脱已经泥足深陷的越南战争,而“中国牌”对此都有牵制和斡旋的作用。

所以,尼克松访问中国后所宣称的“改变世界的一周”就意味着:中美两国的联手,改变了美、苏、中都在进行两面作战的格局,中美两国是同时把两面作战的包袱都甩给了苏联。因此,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是完全符合中美两国共同战略利益的。

1972年2月,以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问中国为标志,中美两国开始了关系正常化的进程。1973年2月,在基辛格访问中国的时候,中美双方商定互设联络处,迈出了走向关系正常化的第一步。

1973年3月10日,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六年的邓小平终于复出政坛。1973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12月,邓小平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1974年4月,邓小平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了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际舞台上的一次最辉煌的展示。邓小平在政坛复出后仅一年多的时间,就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现在世界政治讲坛上,这不仅是一种政治殊荣,而且还预示着他将在中国的外交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974年4月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期间，邓小平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开始了他对中美关系的“参与”。4月14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纽约的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酒店设晚宴招待邓小平副总理。在经历了1972年戏剧性的轰动场面后，到1974年，中美关系由于美国政治上的水门事件和中国内部政治斗争等诸多问题的阻梗而经历了一个相对沉闷的时期。1974年3月基辛格访问中国时，毛泽东主席没有满足基辛格与之会见的期待。所以，借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的机会，基辛格要设法与到会的中国领导人会面。但是，基辛格在当时并不知道邓小平是何许人也。1995年基辛格曾回忆道：“说实话，我那时不知道他是谁。因为他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所以我们那时以为他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名顾问，甚至不知道他是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我记不太清楚当时一些具体细节了，但我在纽约和他一起吃过晚饭。他处理事情的果断、能力以及对事物的洞察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①事实上，这次会晤是很有意思的。在尼克松政府以及在以后的福特政府里，就制定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而言，也许除了尼克松和福特本人作为总统外，基辛格起的作用是最大的。由于基辛格在两任总统内担任国务卿，并由于他个人的能力、功绩及影响力，在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领域内，基辛格个人的意向往往是举足轻重的。虽然基辛格没有在其回忆录中对这次会谈作任何记载，但在最近解密的基辛格与中国和苏联领导人的谈话记录中，则有详尽的记载。与邓小平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对美国毫不留情的抨击形成有趣对比的是，在私下里，邓小平与基辛格的第一次会谈，却是十分友好和坦诚的。在会谈中，双方谈到了苏联问题、中东局势、印巴关系、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以及日本和欧洲等等各个方面的问题。

① 高屹：《历史选择了邓小平》，武汉出版社，1999年版，第466～467页。



题。在谈到双方都最切身的问题——中美两国关系如何走向正常化的问题时,邓小平与基辛格有如下对话:

邓小平:到现在为止,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变化。

基辛格:我们一如既往地把保持良好和朋友般的中美关系看作是最重要的。正如我同毛主席和周总理会谈时所说,我们愿意进行我们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邓小平:这个政策和建立在这个政策基础上的原则,是得到毛主席本人支持的。我相信,从你同毛主席的两次长谈中,你会明白这一点的。我想,你上一次和他会晤时谈了有三小时。

基辛格:我们谈到了许多细节,所以我从不注意报纸对我们关系的报道。以我们的经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

邓小平:我看过你同毛泽东主席谈话的记录。很坦率。你们从战略角度出发,讨论了中美之间的关系。

基辛格:好,我今天晚上能看到来自中国的老朋友而感到特别高兴。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能够认同毛主席和周总理论论的每一个细节,而且我们还可以肯定我们的政策所确立的方向。

我想让你知道,我一直都在思考我们在北京签署的最后一份公报措辞。我们可以通过黄镇大使讨论公报的意思,或今年的晚些时候和你面谈,如果我履行我一年一度的北京之行的话。

邓小平:在台湾问题上可以做什么?

基辛格:正如我告诉过你的那样,我们正在继续裁减我们在那里的驻军。我们正在思考怎样使最后一个公报所表达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得以生效的办法。我们还没有形成整体的想法,但我们愿意倾听你们的任何意见,公报的措辞是你们拟订的。

乔冠华:我在考虑这个问题,明白问题的实质,我参加了公报的起草,拟订了它的语言。其主要意思就是毛主席告诉你的那



些。我们之间的关系的正常化只能以日本模式为基础。其他模式都不可能。所以,我还可以说,关于我们两国关系的现状,我的看法是,我们的关系应该前进,而不应该后退。这一点,我和布鲁斯大使坦率地谈过了。我们的谈话很友好。

基辛格:我知道你对他说的话,我们把这些话深深地记在心里。

邓小平:关于这个问题,还有两点。第一,我们希望这个问题解决得相对快点。但是,第二,我们对这个问题并不心急。这两点毛主席也向你提起过的。

从这次谈话中可以看出,邓小平的话不多,但每一句都讲在关键的问题上。从一开始接触中美关系,邓小平与毛泽东就是心意相通的:首先是要从战略高度来看待中美关系,核心问题是台湾问题,解决问题希望能快一点,但也不心急。在中美关系比较冷淡的这一时期里,邓小平和基辛格这次会谈中所表现的愿望和诚意,对下一阶段中美双方的继续谈判,起到了积极作用。

1974年8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副总统福特继任总统。同年11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受福特总统派遣来华访问,从1974年11月至1975年12月,邓小平以副总理的身份参与了与美方的五次会谈。这五次会谈,是邓小平正式主持中美建交谈判的开始。

1974年11月26日上午,邓小平与基辛格会谈。会谈的主题是如何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程序。

邓小平:外界有很多的看法说法,认为我们的关系已经冷却,而且进展速度也已经慢下来。但在本质上,我相信双方都同意,我们的关系的进展是正常的。

① 威廉·伯尔著,庞伟译:《基辛格秘录》,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334~353页。



但我也应该说,认为这些说法是无中生有也是不正确的,比如说,博士昨天以及在10月份同外长会谈时提到,我们开炮更频繁了。

基辛格:是的,而且变得更准确了。

邓小平:当你们把一位大使派往台湾,当他们在美国又建立起几个领事馆的时候,有些猜测和说法是很自然的。

基辛格:尤其是你绝不相信我们的一些行为是愚蠢和毫无计划的结果时,是这样的。领事馆的事我也是过后才知道。

邓小平:至于我们对“关系正常化”的看法,我相信博士和其他的美国朋友们都很清楚:那就是“日本模式”。这方面,你们曾经要我们这边提出具体模式,其实我们早就说过了,就是“日本模式”。同时,我们这边也希望你们那边能再往前多走几步。

基辛格:总理先生,这一点反映了你所说的——你向我们表明了一个总的想法,也就是日本方式。我们可以接受这个基本原则。但我们有很多日本人所没有的具体情况。我认为,在日本模式的框架中,我们应该坦率说出我们认为必要而又不违背你们的原则的东西,然后看是否能找到达到我们目的的办法。之后,我们才能提出方案。

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你们欠我们一笔债。

同日下午,邓小平继续与基辛格会谈。

基辛格表示,美国政府也希望“大致将采用日本模式来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但有一点不同,如果我们能在台湾保留联络处,在北京设立大使馆,则对贵我双方都最为省事。此外,我们会完全依照日本模式”。

① 威廉·伯尔著:《基辛格秘录》,第356~358页。



对于基辛格的这一“倒联络处”方案,邓小平口气强硬、毫无回旋余地地予以回绝。邓小平指出:“本质上你的想象,也就是你的考虑,不符合日本模式。我们觉得本质上,那还是‘一中一台’的变形。(基辛格:怎么说?)主要是你只是换位置而已,改变联络处的地位。目前的情形是你们在北京放一个联络处,我们在华盛顿放我们的联络处,然后你们在台湾还是留着一个大使馆。这就显示关系正常化的必要条件还没有出现。换句话说,即使你们改变这个顺序,也就是在北京设立大使馆,在台湾设立联络处,也不能改正这个问题。人家会说,其实这只是另外一种‘一中一台’而已。因此,我们恕难接受这种模式。”“另外一个问题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法。若要解决台湾问题,假设你们已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台湾问题就应该留给我们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毛泽东主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解决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应由中国人来解决。”^①

在1974年11月27日上午的会谈中,邓小平、基辛格继续就国际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到最后的时候,邓小平再次重申了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三个原则:一、坚守上海公报,拒绝“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解决方案;二、台湾是中国人民的内部问题,只能留给中国人民自己解决,解决方式是和平的或者是非和平的,应由中国人民决定;三、不承认有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可以参与解决台湾问题。但邓小平也说了,如果美国政府“需要台湾”和面临“国内困难”的话,中国方面可以等。^②

1974年,毛泽东在世,邓小平则是刚刚复出。邓小平在代表中国政府与基辛格进行谈判时,是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思路,以强硬的姿态表达了中国政府在中美建交上的原则和立场。基辛格虽

① 威廉·伯尔著:《基辛格秘录》,第364~371页。

② 威廉·伯尔著:《基辛格秘录》,第372~389页。



然表示,可以考虑以“日本方式”实现关系正常化,但是,因为美国政府还缺乏必要的准备和诚意,所以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未能出现突破。

1975年1月5日,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月10日,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1月17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又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此时,邓小平已接替病重的周恩来总理,统管外交事务。

1975年10月19日,基辛格抵达北京,为福特总统访华作准备。10月20~21日,基辛格与邓小平进行了会谈。在与邓小平的会谈中,基辛格就中美关系讲了一套闪烁其词的话,还是坚持原来的立场,并把球抛到了中国一边。基辛格说:“让我来说一下我们的双方关系吧。在正常化的进程中,我们已经清楚地表达了我们的继续遵守《上海公报》原则,我们会向你们作一些关于公报的系统论述,建议你们沿着那个方向进展。我们认为在双边关系上表现出活力,并且把我们的双边关系向前推进是十分重要的。对我们而言,问题是在抵抗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的对霸权的渴望的时候,如何把我们的位置调整到最佳。如果是那样,那么我们为我们的关系作出一些行动就是很重要的。如果中国在美国人的意识中不是一个重要因素,那么要得到公众对已经做的事的支持非常困难。除非我们的双边关系有所改善,否则那是不可能的。这完全取决于你们。”

邓小平对于基辛格的言辞没有作出直接的回应,而是对美国可能出现的新的绥靖主义作了尖锐的揭露。并表示:“我们一直认为我们应该依靠我们自己独立的力量来对付苏联,我们从未对这个问题抱有幻想。”21日晚,毛泽东会见基辛格时说:“昨天,你和副总理争吵的时候,你说美国对中国无所求,中国对美国无所求。在我看来,这



些话不完全正确，也不完全错误。小问题就是台湾，大问题就是世界。”毛泽东还以他特有的幽默和气派说：台湾问题可以过一百年解决，反正他是不打算处理这件事情了。^①

1975年12月，美国总统福特访华，他向毛泽东和邓小平表示，将来在适当的条件下，也就是说，在他再次当选总统后，按照“日本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随后，福特把注意力放在国内的大选和美苏缓和方面，在对华关系上采取了“拖”的方针。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政局也风云变幻：邓小平再一次被打倒；毛泽东去世；粉碎“四人帮”。如此这般，由于中美双方国内政治的原因，使中美建交的谈判暂时停顿了下来。

1977年1月，美国新政府上台。卡特总统、万斯国务卿和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博士是制定美国外交及对华政策的核心人物。但是，他们三人对中国所要采取的外交政策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

卡特总统在上台以前就认为，尼克松总统1972年对中国的访问和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是美国外交的一大成就。这一成就可以使西太平洋地区的稳定与和平达到一个新的阶段。然而，卡特清晰地认识到，在美国，尤其在美国国会，支持台湾的势力很大，甚至，台湾院外活动集团的人士可以左右美国的远东政策。卡特总统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我在1976年赢得几场初选之后，就已经领教了他们（指台湾院外活动集团的人士——引者注）的厉害了。他们纷纷邀请我的亲属和在普兰斯的邻里免费到台湾的台北去度假旅游。台湾的领导人宴请那些经不起奉承的人，给他们赠送有吸引力的礼物，并怂恿他们对我施加影响。”^②值得注意的是，卡特有一个自认为是非常清

① 威廉·伯尔著：《基辛格秘录》，第492～515页。

② 吉米·卡特著，裘克安译：《保持信心》，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173页。



晰的看法,那就是: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决不能背弃美国对台湾安全所承担的义务,也不能使美国同苏联已趋紧张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应该说,原来缺乏外交经验的吉米·卡特州长在即将担负起领导美国的责任时,还是想更多地了解中国。在1976年大选获胜后不久,卡特就请其时还在福特政府任国务卿的亨利·基辛格到普兰斯谈论有关中国的许多问题,包括基辛格多次访问中国所得的印象。卡特到白宫上任后,就立即仔细地研究了尼克松和基辛格同中国领导人谈话的详细备忘录,查阅了未经公开的福特总统向中国人发表的一些讲话。1977年2月初,卡特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态度,在其办公室约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黄镇。华盛顿的外交界人士注意到,这次会见的时间长于卡特早先会见苏联驻美大使的时间。1977年5月,卡特总统在圣母玛利亚大学发表演讲时,还明确地提出了美中关系是美国全球政策的一个“中心环节”。他说:“我们认为美中关系是我国全球政策的一个中心环节,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关键性力量。我们愿意同富有创造力的中国人民就全人类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密切合作。我们希望能找到一种方式来弥合仍然把我们双方分开的那些分歧。”但无论如何,在卡特总统的心目中,尽管他一直把中国问题放在心中,然而在外交事务的操作上还是有許多需要优先处理的、他认为更为重要的问题摆在心头。^①

卡特总统外交政策的主要助手万斯国务卿后来也回忆说,卡特政府在上台之初,他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加强北约组织,争取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达成协议,并恢复中东和巴拿马谈判的势头。”实际上,万斯国务卿十分热衷于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他认为:在当时的国际政治军事格局下,避免核浩劫是美国和苏联以及全

^① 吉米·卡特:《保持信心》,第175页。



世界的共同利益,美苏应该达成对核均势的共同控制和管理。^①而在中美关系问题上,万斯认为,虽然“没有同一个拥有近十亿人口的国家建立正常关系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他强调的是“小心谨慎”,要考虑“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要考虑“维护台湾人民的安全和福利”、还要考虑“同莫斯科的关系、同东京以及其他亚洲盟国的关系”等等棘手的问题,^②而且,万斯还认为,“就经济发展和军事力量而言,中国并不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强国”,所以,无论如何不应当有任何“人为的期限”迫使政府以其最初的目标为代价寻求加速实现正常化。^③万斯的希望是,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应该“在总统首届任期过半时实现”。^④

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是极力反对苏联扩张主义著名的“鹰派”,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是强硬的反共分子。但是,布热津斯基从美国的战略利益出发,一直强调同中国建立新关系的长远的历史意义,他认为:“华盛顿与北京建立真正的合作关系将大大促进远东的稳定。从全局观点来看,这对美国与苏联进行全球竞争是有利的。”而从策略上考虑,布热津斯基更强调以加强中美合作来对付苏联。布热津斯基觉得:“既然我们不打算把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与苏联的不良行为联系起来(万斯强烈反对这种联系),那么为什么我们反而要让苏联把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与美中改善关系联系起来呢?其实,美中合作倒可以促进莫斯科懂得双方克制和互惠互利的价值。因此,我十分重视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及使之不断发展。对华关系是我最直接掌握的关键问题之一。”^⑤

① 赛勒斯·万斯著,郭靖安等译:《困难的抉择》,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7页。

② 万斯:《困难的抉择》,第19页。

③ 万斯:《困难的抉择》,第76页。

④ 万斯:《困难的抉择》,第19页。

⑤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著,邱觉应译:《实力与原则》,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228页。



上述三人的对华政策观点显然是一种左、中、右的排列。对于与中国建立正常关系,布热津斯基是积极的,万斯是不太积极的,而卡特则是摇摆在他们二人之间。由于卡特政府在其成立之初主要由万斯行使外交职责,所以对与中国的关系,事实上是不太重视的,也没有一套完整的对华政策。布热津斯基在回忆录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在总统就职前举行的非正式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商定亟待办理的项目时,竟没有中国问题。1977年1月,新当选的卡特总统在召开第一次国家安全顾问会议的时候,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们为总统准备了一套“总统审查备忘录”,在此备忘录中记录的问题,是按照总统提示的事件的重要性依次排列的,有关中国问题的分析列在《第24号总统审查备忘录》里,显然,中国问题在卡特总统的眼里并不十分重要。^①卡特还口头交代布热津斯基说,在着手与中国搞关系正常化时要慎重,“不应该像尼克松和基辛格那样对人家曲意逢迎,同时要当心避免引起国内各种集团的反对”。^②

所谓的《第24号总统审查备忘录》认为,美国新政府应当按照其前任承诺寻求同中国关系的正常化,与此相一致,美国政府应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撤回所有的驻台军队并终止与台北的外交关系。但是,中美关系正常化没有一个确定的时间表,而且美国政府还应该寻求一个来自中国政府的明确承诺,即《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废除,必须以中国不对台湾使用武力为交换条件。1977年6月,在讨论《第24号总统审查备忘录》期间,卡特政府内部就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时间和条件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布热津斯基和万斯两派不同的观点第一次公开表现出来。布热津斯基主张的是与中国建立一种安全关系以阻止苏联扩张的立场。布热津斯基在其回忆录中

① 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第229页。

② 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第233页。



写道：“我在会上极力主张万斯访华时答应实现关系正常化，同时采取相应措施把我们同台湾的关系降格，并采取行动向中国人表示我们非常严肃地对待双方的政治和战略关系。可是我在会上相对地孤立，大多数与会者认为我们还不能操之过急。”^①这些认为不能操之过急的“大多数与会者”就是如上所述的以万斯为首的不急派。到7月30日，在为万斯访华启程而召开的一次预备会议上，卡特总统才“突然决定”万斯应尽可能快地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②但是，台湾问题仍然议而未决，万斯和万斯一系的官员如国务院政策规划署的首席中国问题专家保罗·克莱斯伯格等人，就依然主张在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后，美国将保持与台湾的官方关系。其实，万斯等人非常清楚，中国方面绝对不会接受此等方案。早在1974年，邓小平就断然拒绝了基辛格提过的类似方案。万斯等人的意图是，不能让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发展影响更重要的美苏武器控制谈判和巴拿马运河条约的批准。为此，他们采取了拖延的谈判态度，其策略就是向北京提出一个关系正常化以后保留美国在台湾的官方代表的方案，而北京方面肯定不会同意这个方案，这样双方在谈和磨的过程中，就达到了“拖”的目的。万斯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并没有期待中国人会接受我们的建议，但是我觉得提出来是明智的，即使最终我们可能是不明智的，即使最终我们可能不得不放弃这项建议。”^③

而在中国方面，从1976年初周恩来去世到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前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的政治上层主要关注于内部事务，对外政策不可能有重大的调整。1977年7月，邓小平在第三次被打倒后再次复出。在对美政策，尤其是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中国政府的态

① 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第233页。

② 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第233～234页。

③ 万斯：《困难的抉择》，第80页。



度是始终如一的。

1977年8月下旬,美国国务卿万斯一行受卡特总统派遣前往北京访问。这次访问是卡特政府上台后第一次对中国的官方访问,其时距卡特政府上台已有半年之久。

首轮谈判由万斯与中国外交部长黄华进行。在首轮谈判中,万斯解释了美国方面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万斯解释道:为了确保美国与台湾在诸如贸易、投资、旅游及科学交往等领域正在开展的交流活动,美国“官员”“以非官方的形式”在实现关系正常化后留驻在台湾是有必要的。此外,对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声明也要增加一个附加条件,就是美国要在关系正常化后发表一个声明,以表达美国对中国人民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和兴趣,而中国坚决不能反对这一声明并鼓吹以武力解放台湾。万斯声称,如果中国接受这些条件,那么,美国将全部撤回驻台部队和武装设备,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惟一合法的政府。^①对于万斯的提议,黄华表示了中方不可能接受。

在第二轮谈判时,邓小平以中方首席谈判代表的身份出席。万斯在回忆录中记载了这次谈判的情形。万斯写道:“邓像其他中国人一样彬彬有礼,他心平气和地说我的看法是从上海公报后退了。他给我念了一次谈话的备忘录中的几段话。据说基辛格在这次谈话中同意美国欠了中国一笔债,并答应将按照中国的条件实现正常化。他提起1975年12月同福特总统的一次讨论,在这次讨论中总统曾说,1976年大选后,他将更加能够按照所谓的日本方式来实现关系正常化。但是邓忽略了总统附加的一个限制性条件——台湾问题必须得以解决。邓把我向黄华提出的建议说成是从以前的事态后退了。邓说中国

^① 万斯:《困难的抉择》,第82~83页。



充其量只能接受日本方式。他指出我的建议只不过是设立一个门前没有标志或国旗的大使馆。”^①中国官方的记录则有,在这次会谈中,邓小平指出:“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在台湾问题上干脆就是三条:废约、撤军、断交。为了照顾现实我们可以允许美台间非官方的民间往来。”^②

在此次会谈中,邓小平“干脆”这一快人快语和把中美建交的条件浓缩为“废约、撤军、断交”这六个字,已充分地显示出一个国际政治强者的姿态。同时,邓小平又非常策略地对万斯坚持的美国要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发表的那个声明没有作什么指责,由此,美国方面也发现了中国领导人的灵活性。但是,卡特总统也敏感地注意到:“由于某个下级官员透露了中国人表现出‘意外的灵活性’这一错误消息,邓小平在万斯结束访问时对新闻界发表的最后一次讲话措辞相当严厉。中国人最不愿意的就是有人指责他们在原则问题上有灵活性。”^③

总而言之,万斯的访华,虽然提出了一个“倒退的方案”,也没有就中美关系达成任何协议,但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是,它提供了一个机会,使邓小平第一次以中国外交决策者的姿态向美国人展示了他的外交风格。

万斯访华后,邓小平已明白无误地向美国卡特政府表示了中国政府在中美建交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和灵活态度。但是,卡特和万斯仍不急于实现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万斯回国后,卡特就曾对记者说,对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他并没有感到要被迫采取“冒险的行动”,要美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毫无疑问将在未来更合适”。在卡特

① 万斯:《困难的抉择》,第83~84页。

② 薛谋洪:《当代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27~228页。

③ 卡特:《保持信心》,第177~178页。



看来,中美关系正常化相对于争取参议院批准巴拿马运河条约和美苏战略武器和谈来说是“次要的”,而且,鉴于邓小平在台湾问题上的坚定立场,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的美台关系仍是一个头疼的问题。^①

与国务卿万斯的观点不同,影响卡特政府外交政策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他认为,万斯的访问是不成功的,所以他想亲自到中国走一趟,以便他在美国政府内对制定对华政策有更大的发言权,并尽快实现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为此,布热津斯基与观点相同的奥克森伯格(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中国问题专家)和霍尔布鲁克(助理国务卿)进行了商谈,并由奥克森伯格向在华盛顿的中国官员提出,布热津斯基希望中国邀请他去访问。中国方面很快就对此作出反应,1977年11月初,布热津斯基接到了中国对他的邀请。^②实际上,自联络处建立以后,布热津斯基就与中国驻美国联络处的副主任韩叙定期举行外交政策的研讨,以至到“坦诚相见、无所不谈”。这样,中国方面就听到了美国政府内部的不同声音,并了解到布热津斯基在与中国建立战略联盟关系和共同对抗苏联威胁方面的积极态度。^③但是,布热津斯基的行程并不顺利,也许是万斯等人觉察到布热津斯基的意图,所以他们极力反对这一行程。正是由于万斯等人的反对,使布热津斯基的中国之行拖延到了1978年5月。^④

而正是在这半年间,国际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是苏联在欧洲和第三世界采取了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破坏了美苏之间以及中苏之间的战略均势,使美国政府对美苏缓和和军备控制的兴趣日减;

① 卡特:《保持信心》,第178页。

② 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第235页。

③ 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第236页。

④ 布热津斯基与万斯等人的争吵的细节,布热津斯基的回忆录有详细的记载,见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第235~242页。



中国也因为苏联军事威胁的日益严重以及苏联与越南的越来越紧密的合作而感到腹背受敌。这一变化的形势,对于中美之间的战略合作是一个外在的推动力。

1977年10月,苏联开始在欧洲部署SS20导弹和“逆火式”轰炸机,SS20导弹的设计意图就是对西欧进行毁灭性的打击,而“逆火式”轰炸机则可以把空中打击的半径划到北美。到1978年初,苏联已部署了18枚SS20导弹。苏联这一非常富于军事挑衅性质的举措,开始改变了卡特总统对苏联威胁的看法。1978年5月,卡特总统警告说:“在欧洲,我们面临着非常严重的问题。”“苏联建立了数量惊人的坦克装备和各种军事力量,像SS20导弹这样的核武器已经远远超出了它们自身合法的安全需要。”^①

非洲和亚洲也在苏联和古巴的挑拨下弄得烽烟四起。1978年3月,古巴介入了非洲之角的欧加登战争。4月,在阿富汗,苏联支持的哈菲祖拉·阿明发动了一场成功的军事政变,推翻了以陆军中将穆罕默德·达欧德·可汗为首的亲西方政府,苏联势力迅速进入了中亚的心脏地区。5月,古巴训练和装备的喀坦根反政府武装占领了扎伊尔的科尔韦基地区。对于苏联和古巴的这些举动,卡特总统屡屡提出谴责。卡特表示,苏联的非洲政策将破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前景。对于苏联的行径,中国官方最权威的《红旗》杂志在1978年4月的评论文章中指出:非洲发生的战争表明了苏联“扩张主义的险恶伎俩”,而“明天的战争正像安哥拉和非洲之角的那些战争一样即将发生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

此外,苏联也对中国制造威胁。在1978年初,苏联开始在远东地区部署了SS20导弹。4月份,苏联的海军、海军陆战队和空军在东北

^① 卡特:《保持信心》,第256页。



亚海域也进行了一次罕见的大规模的海陆空协同作战演习。在此期间,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和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到达中苏边境观看了一场模拟中苏战争的军事演习。对此,中国国防部长徐向前在8月份的《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提高警惕,准备战斗》的文章,指出苏联陈兵中苏边境,对中国构成了“直接的军事威胁”并企图最终“达到侵犯中国的目的”。文章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提高警惕,准备战斗,以歼灭来犯之敌。苏联在中国北部制造紧张气氛的同时,还在中国南部营造一个南北夹攻之势。到1978年春,苏联已经成功地将越南纳入到了它的反华联盟中。3月,河内政府关闭了私人自由市场,4月,没收了南方的私人储蓄,并开始在全越南大批地驱逐华侨,越南正配合苏联完成对中国的C型战略包围。苏联的举动事实上已经给中国造成了新的、更加巨大的军事压力。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布热津斯基进行了他的首度访华。布热津斯基的这次访华,正是由于形势的变化,“本来是低调的,是去协商的,现在一下子变成非同小可的使命。”^①

在布热津斯基临行前(1978年5月17日),他和奥克森伯格起草了一份卡特总统给布热津斯基的指示,卡特总统略作修改便签了字。这样,布热津斯基就给自己的中国之行铸造了一把“尚方宝剑”。

卡特总统这份指示的要点是:

一、美国政府已把美中关系看作美国全球政策的一个中心方面,并希望在新的国际格局中建立战略联盟的关系。

卡特向布热津斯基指示说:你此行的第一个、也是中心的目的,是着重向中国领导人阐明,我们把美中关系看作美国全球政策的一个中心方面。美中两国具有某些共同利益,双方有着并行不悖的长期

^① 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第242页。



战略利害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双方都反对任何国家谋求全球或地区霸权。所以要表明美国对与中国建立合作关系具有战略方面的兴趣,而且这种兴趣具有根本的和持久的性质。

二、卡特总统已下决心接受邓小平关于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三个条件,并希望进一步探讨出新的“一种美国方式”来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问题。

卡特向布热津斯基指示说:你此行的第二个目的是保证寻求关系正常化。卡特请布热津斯基告诉中国领导人:美国决心推进关系正常化的进程,重申美国接受中国的三个基本条件,并重申美国的五点。在这些问题上,美国已经下定决心了。伍德科克大使将从1978年6月开始参加适当的谈判。卡特还授意布热津斯基向中国领导人讲清楚,在关系正常化的时候,美国将单方面发表一项声明,呼吁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要同中国人达成谅解,请他们不要反驳这项声明。此外美国将继续使台湾可以获得防御性的军事装备。卡特要求布热津斯基进一步与中国人探讨,看能否搞“一种美国方式”,使美国可以同台湾继续保持非外交关系。此外,布热津斯基可以非正式地向中国人表示:美国打算今年进一步减少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存在;在商业上放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增加直接来往,使之经常化和定期化;邀请中国派贸易和军事代表团来美国访问等。

三、美中两国应在对抗苏联方面确立共同看法、发展政治合作并采取相应行动,以捍卫两国的共同利益。

卡特还要求布热津斯基向中国方面说明,美国决心与苏联人谋求和平,同苏联人积极地进行竞争,制止苏联的军事挑战,保护美国自己的以及我们的朋友和同盟者的利益。卡特还要求布热津斯基探明中国人的观点,设法确立共同的想法,并在合适时发展政治合作。同时,强调互惠原则,强调需要双方一起努力争取实现共同



的目标。^①

这份指示,充分地体现了布热津斯基的对华战略思想,而它的成功出笼,也表明了卡特总统已经完全接受了布热津斯基的想法,从此,卡特—布热津斯基的对华外交思想就基本主导了卡特政府的对华外交政策。

1978年5月20日,布热津斯基一行到达北京。同行的有: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塞缪尔·亨廷顿,负责介绍有关美苏力量对比的战略问题;国防部的莫顿·阿布拉莫维茨,负责介绍总的军事情报;国务院的理查德·霍尔布鲁克,负责谈扩大双方文化与经济合作问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本·修伯曼,负责谈扩大科学方面的合作问题。

5月21日,邓小平会见了来访的布热津斯基。布热津斯基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写下了对邓小平的初始印象:“虽然邓小平身材矮小,但气魄很大,一上来就把我吸引住了。他生气勃勃,机智老练,思维敏捷,谈笑风生,开门见山,很有气派。一席话使我明白了他在政治生涯中屡经沉浮而不倒的道理。更重要的是,他的胸怀和魄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真正够得上是一位老谋深算、可以放心与之打交道的政治家。”^②

在交谈中,布热津斯基按照指示把卡特总统准备同中国积极讨论关系正常化问题的意思向邓小平作了转告,邓小平听后说:

“很高兴听到卡特总统的这个口信。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观点都是明确的,问题就是下决心。如果卡特总统是下了这个决心,事情就好办。我们双方随时可以签订关系正常化的文件。过去我们也说过,对自己国家统一的问题我们怎么能够不关心,不急于解决呢?我们很希望能早日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历来阐明的就是

① 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第615~618页,详见本文附录[1]。

② 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第246页。



三项条件,即断交、撤军、废约。这三项条件都涉及台湾问题。我们不能有别的考虑,因为这涉及到主权问题。关系正常化问题对两国来说,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当然我们历来说,我们之间还有其他方面,主要是国际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合作的余地。有许多问题我们可以共同探讨,不少问题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你们要表示你们的希望,这可以;但我们也要表示我们的立场,即中国人民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人自己的事。”^①

从邓小平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有这么几个意思:

一、中国方面“很高兴”美国方面在建交问题上下了决心,中国将“随时可以签订关系正常化的文件”。

二、建交的三项条件,即美国与台湾“断交、撤军、废约”不变。

三、中美之间还可以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四、非常重要和非常策略的一点是邓小平表示,美国可以发表他们对中国人民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关心和有兴趣的声明,而中国方面不反对他们发表类似这样的声明。

五、在会谈中,布热津斯基提出,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美国将保留他们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权利,据布热津斯基说,邓小平听了以后没有作出反应。^②对于布热津斯基这一说法,上面引用的中国官方公布的邓小平的讲话应该可以作为佐证。这是非常巧妙和重要的一点。邓小平极富谋略的这一表现,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走上了正式的轨道。

1978年7月,中美双方在北京开始进行建交谈判。从这个时候开始,邓小平就直接地主持确定了中方谈判的立场和方针,并亲自参与

^① 《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共中央文献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

^② 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第248页。



了一些重要问题的当场拍板。^①

对于布热津斯基的中国之行，美国朝野各界的反应是热烈而积极的。6月20日，卡特总统召集了万斯、布热津斯基、布朗和乔丹研究并最后确定了美国的对华政策方略。布热津斯基亲笔手写的记载如下：

美中关系：

1. 必须严格保密。
2. 中国方面很希望改善关系。在布热津斯基访华以前，他们已经做了我们所要做的一切。
3. 争取12月15日建交。但只限于最少数人知道。对外只表示我们愿意改善关系和实现双方关系的正常化。
4. 在国会先解决美中关系，然后才解决批准限制战略武器协定问题。
5. 残存的关系：希望除私人机构外能有更广泛的选择余地。派驻贸易使团如何？派驻军事销售使团如何？请万斯提出法律方面的估计。
6. 由伍德科克主持谈判。奥克森伯格和霍尔布鲁克进行准备工作。由伍德科克约见对方开始谈判。随后发去指示。
7. 伍德科克进入谈判时，建议每十天谈一次，建议以下议程：（一）代表方式；（二）和平解决；（三）美国与台湾的贸易关系；（四）公报以及发表的方式。
8. 下周初拟出关于代表方式的指示电稿。
9. 请伍德科克试探对方能否同意在通知“中华民国”后给一年的善后时间。

①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02页。

② 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第258～259页。



根据双方约定的程序,从7月到9月,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与中国外交部长黄华进行了五轮会谈,双方继续阐明各自的观点和立场,双方可“各讲各的,相互都没有约束力”。在会谈中,台湾问题成为焦点。

在谈判时,伍德科克代表美国政府提出,美国希望在关系正常化以后继续与台湾保持全面的文化、经济和其他联系,美国国会将参与制定一些相关的替代性法案,并以此代替美台之间原有的一些双边协议。后来的美国与台湾关系法,即可从此看出端倪。9月16日,美国总统卡特在华盛顿会见了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卡特总统表示,美国在关系正常化以后有权继续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并强调了美国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视。鉴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这一态度,中国从7月到10月都没有对美国提出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方案作出积极的反响。到10月上旬,中国外长黄华在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外交部长会议的时候,与美国国务卿万斯会晤了四个小时,在会晤时,黄华循例尖锐地批评了美国的台湾政策。

10月22日~29日,邓小平访问日本,出席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批准书互换仪式。在25日,借与日本首相福田纠夫谈话之机,邓小平针对中美谈判中出现的台湾问题提出明确而强硬的意见,表示中国方面一定要解决台湾问题,甚至不惜花一百年、花一千年的时间去解决。邓小平说:“我们将在充分尊重台湾的现实的基础上,来解决台湾问题。采用日本方式也是尊重台湾现实的一种表现。美国总希望我们承担义务,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如果这样,反而会成为和平统一台湾的障碍,使之成为不可能。”在同一天晚上的记者招待会上,邓小平说:“现在有一个两个朝鲜的问题,有两个德国的问题,也有一个两个中国的问题。这些问题将最终得到解决。如果十年不行,那就一百年;如果一百年不行,那就一千年。这是符合人民愿



望的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①

邓小平这种“一百年”、“一千年”的说法,是表明了一种态度,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决不能让步的,而且不会承诺“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这也是中国方面的一条底线。

继访问日本后,邓小平又在11月5日至14日访问了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14日,在回国时途经缅甸。在与缅甸总统吴奈温会谈时,邓小平说:“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②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所说的“会尊重台湾的现实”、“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显示出邓小平在中美建交前,已经现实主义地考虑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方法。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可溯源至此。

在中美建交谈判时间和任务紧迫的11月底,邓小平两次与美国客人进行了谈话。

11月27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时,从世界和平的高度谈到了中美建交问题。邓小平说:“如果站得高一点看,不管中国政治家或美国政治家,都认为两国关系早点实现正常化好,越早越好。如果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首先是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安全和稳定的话,我想中美关系正常化,对全球的和平、安全和稳定比中日条约的意义更大。”^③

11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蒂尔时,更进一步地表示将尊重台湾的现实来解决台湾问题,邓小平说:“现在,中美关系的焦点恐怕不是三个条件问题。美国方面要中国承担不使用武力解

①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90页。

②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91页。

③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95页。



放台湾的义务,这不行。在实现正常化上,我们重大的让步就是允许采取日本方式,美国可在台湾继续投资,继续保持它的经济利益。我们多次讲过,台湾归还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将尊重台湾的现实来解决台湾问题。台湾的社会制度同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度当然不同,在解决台湾问题时,会照顾这个特殊问题。”^①

邓小平在 1978 年 10 月至 11 月的几次谈话中,总的来说是表达了这么几个意思:

一、解决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提,对此中国有极大的耐心。

二、中国决无可能承诺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三、在统一后,“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

四、强调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对全球的和平、安全和稳定的重大意义。

邓小平的上述表示给正在进行的建交谈判加了温。布热津斯基和奥克森伯格向卡特总统报告,邓曾对一名外国记者说:中国用“一秒钟”就同日本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要同美国恢复外交正常关系“只需要两秒钟”。邓还说他期望在其有生之年访问美国。

经过考虑,卡特总统最后提出把建交日期定在 1979 年 1 月 1 日。^②在中国方面,中国副外长韩念龙于 12 月 4 日向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提出中国方面的建交公报草案时,也把建交日期设定在 1979 年 1 月 1 日。这样,中美双方就有了一个相同的时间表。韩念龙还告知伍德科克,邓小平将在 12 月 13 日会见他并亲自参加建交谈判。卡特总统和布热津斯基得知这一信息后也感到很高兴。布热津斯基遂在 12 月 11 日,即伍德科克赴中国谈判前,会见了中国驻美

^①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 97 页。

^② 卡特:《保持信心》,第 183 页。



国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布热津斯基强调说：“现在已是我们要迅速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时刻，伍德科克大使将代表美国政府邀请华国锋或邓小平在明年访问美国，我们应该抓住这一历史时机。”而且布热津斯基还暗示，美苏军备控制谈判已接近尾声，美苏峰会亦会随即举行。布热津斯基希望，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国领导人访美能够赶在美苏峰会之前，否则，布热津斯基提出了一个忠告：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时间就可能不得不推到1979年年底了。^①

邓小平1978年11月从东南亚回国后，立即参加了持续一个多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中共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它为随即召开的、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的准备。在这次会议上，中美关系正常化也是议题之一。12月13日下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那篇著名的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而在12月13日上午，邓小平就开始参与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

12月13日上午、14日下午和晚上以及15日的下午，邓小平四次亲自出马，与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就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了会谈。在前三次会谈中，邓小平与伍德科克就中美建交的几个关键性问题达成了妥协：

一、中国同意对美国政府所谓期待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单方面声明，中国政府不公开反驳。

二、中国同意美国在建交后维持与台湾的经济、文化、商务和其他关系。

三、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默许了美国的要求：即美台安全防务条约将根据条约中的终止条款予以终止，而不是“废除”。而根据该条

^① 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第264页。



约相关条款的规定,一方终止条约,须提前一年通知对方,这就意味着,终止美台安全防务条约后的一年内,美台安全防务条约仍然是有效的。针对此,邓小平提出,在这一年内,美国不能对台湾作出任何出售武器的新的承诺。在向华盛顿请示后,伍德科克同意从12月14日开始的一年内不会对台湾承诺出售武器。但是双方都巧妙地回避了“一年”后又会有什么的问题。

四、伍德科克主任代表美国政府邀请邓小平访问美国,邓小平接受了这一邀请。

五、双方同意,把建交日期定在1979年1月1日。

本来,事情就可以这样定下来了。对于对台湾出售武器这一敏感问题,邓小平已经做了最大的让步,“一年期”的说法,就是邓小平巧妙地双方设计的下台阶。作为一个战略家,邓小平意识到,在当时中国最大的战略利益,就是迅速实现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与此相比,其他的问题都是次要的,都是可以暂时搁置或者“模糊”起来的。但是,卡特总统等美国领导人觉得,中美之间在对台军售这一敏感问题上还是没有讲清楚,美国在终止美台安全防务条约后的一年后会再向台湾出售防御性的武器,对于这一点,卡特总统恐怕中国政府不清楚,或者会产生误解。卡特总统认为,向中国政府讲清楚并确认在中美建交后美国仍可以向台湾出售防御性的武器,是一个很大的政治资本,有了这一点,美国政府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轻中美建交的政治代价,就可以向台湾的老“盟友”、向美国国会、向“美国公众”作出比较满意的交代。因此,白宫反复敦促伍德科克,要他向中国澄清:美国的意思是在终止美台安全防务条约的一年后,仍然会向台湾出售武器。但是,已经与邓小平打过几次交道的伍德科克深知此举的艰难,迫不得已,伍德科克在12月15日下午会见邓小平前(北京时间下午2点,华盛顿时间凌晨2点)打电话给布热津斯基,告诉他整个建交建



议可能由于卡特总统在对台出售武器问题上的政治考虑而濒于破产。伍德科克认为：需要在最后一分钟双方能够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共同做出让步。在通电话时，布热津斯基急忙想出了一个“双方同意存有分歧”的主意来解决这一困境，布热津斯基还叮嘱伍德科克转告邓小平：“在对台出售武器问题上，我们将尽可能地克制，但是根据美国的政治实际，要美国不重申它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那是几乎不可能的。……考虑到中国对这个问题很敏感，我们将不发表正式声明，可是新闻界以及反对关系正常化的人肯定会立即提出质问，我们将做如下回答：‘在关系正常化协议的范围内，美国已表明在共同防御条约失效后将继续与台湾进行贸易包括有控制地向它出售选定的防卫武器，但将注意避免危及该地区的和平前景。中国方面不赞成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但它不阻挡双方就关系正常化问题达成协议。’”^①

按照上述的指示，12月15日下午，伍德科克在第四次约见邓小平时表达了美国政府坚持的对台出售武器的立场。但是对于美国政府的这一举动，邓小平寸步不让。据罗伯特·罗斯采访伍德科克的描述：“邓小平认为被迫满足美方提出的这一无理要求简直就是奇耻大辱，邓小平表现得怒火冲天。他用尖刻的语言猛烈抨击美国政府坚持对台出售武器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他声称美国的政策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领导人决不同意美国干涉中国的内政，特别是美国对台湾的军售。最后，邓小平问伍德科克接下来该怎么办。伍德科克平静地建议双方果断地按最初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进行，并且于12月15日宣布自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邓小平同意了。”^②

① 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第265～266页。

② 罗伯特·罗斯著、丛凤辉等校译：《风云变幻的美中关系》，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6页。



对于这一细节，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朱启桢则有一个说明。朱启桢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道：“中美建交谈判到最后，一个问题卡住了，就是美国售台武器问题。我们是三大原则，这三大原则美国接受了，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但是在出售武器给台湾这个问题上，美国不让步。当时如果坚持要美国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话，我们就可能丧失与美国建交的时机。但是如果说我们为了求得与美国建交，对武器问题就放过去的话，这个问题将来就成为一个长期解决不了的遗留问题，所以最后邓小平同志跟美国谈判代表谈判的时候，就提到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双方同意发表建交公报，建立外交关系。这个武器问题就留待双方以后两国政府继续商谈解决。因为有了这句话，才有后来的‘八一七’公报。”^①

这样，最终在对台军售问题上，美国人是得到了他们所期待的政治资本。而邓小平软硬兼施的态度和手腕，则使中国既获取了中美建交这一巨大的战略利益，又保留了在任何时候要求美国停止对台军售的权利。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了建交的联合公报，确认双方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建立外交关系，并于3月1日互派大使和建立大使馆。在此联合公报中，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接着，双方重申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并再次强调：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

^① 中共中央文献室、中央电视台编著：《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20～221页。



国家的协议或谅解。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双方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事业。

按照约定,美国政府在发表建交联合公报的当日发表一项声明,以表达其将与台湾继续“保持商务、文化和其他非政府的关系”和“继续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的态度。中国政府也在发表建交联合公报的同时发表一项声明,特别强调“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完全是中国的内政”。^①

至此,历时七年的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长跑,经过两国三任领导人的努力,终于到达了终点。毫无疑问,中国的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以及美国的尼克松总统、基辛格博士都是目光远大的战略家和创造历史的政治家,正是有了他们的远见卓识和雄才伟略,中美两国的关系才能够打破坚冰,化敌为友,使世界的战略格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同时中美两国又都能够从这一变化中获得重大的战略利益。虽然他们的继任者,无论是中国的华国锋主席还是美国的福特总统,都想继续发展中美关系,但基本上是由于他们处于政治巅峰时期的过分局势及短暂,实际上对推进中美关系的发展都难以有所作为。到邓小平第三次奇迹般地重返并主宰中国的政治舞台和卡特当选为美国总统的时候,对于中美两国来说,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国际、国内条件都已经基本成熟。在国际上,苏联霸权主义在非洲、亚洲和欧洲的急剧扩张使它自己成为中美两国的共同敌人;在国内,邓小平和卡特的政治权力都已有了稳固的基础。邓小平正是十分准确地把握了这一历史机遇,在其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的关键时刻,迅速实现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从而把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

^① 中美建交公报及中国政府的声明详见本文附录一(2)、(3)。



段。同时,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为中国的国家安全,为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中的地位,为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行,都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环境。

二、邓小平访美

1979年1月1日,是中美建交的日子。在上午,邓小平发电报给卡特总统,热烈祝贺中美建交。邓小平在电报中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建立外交关系之时,谨致以热烈的祝贺。中美两国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两国人民都感到高兴。我期待着本月底访美期间同阁下会晤,并把中国人民的友好带给美国人民。”^①

下午,在全国政协举行的座谈讨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的会议上,邓小平作了一个讲话。他说:“今天是1979年元旦,这是个不平凡的日子。说它不平凡,不同于过去的元旦,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我们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了;第二,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第三,把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因此,今年这个元旦是值得特别高兴的日子。这三个特点,反映了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在国内工作和国际事务中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②在此,邓小平把中美建交与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和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并重,可见其对中美建交一事的重视。而且,邓小平带着兴奋的语调说出“今年这个元旦是值得特别高兴的日子”这样热情洋溢的话语,确实也是难得一见。

① 外交部编:《伟人的足迹》,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9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页。



晚上，邓小平出席了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和夫人为中美建交举行的招待会。在祝酒时，邓小平表示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建交对于发展中美两国关系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深远影响，必将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邓小平接着强调了他对中美关系的重视：“1979年元旦，对中美两国人民来说，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从这一天起，结束了中美两国关系长期不正常的状态，两国人民热切期望的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实现了。中美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这是两国关系中的历史性事件，也是国际生活中有着深远影响的大事，中国政府一向是以长远的政治和战略观点来看待中美关系的。不久以后，我将应卡特总统的邀请，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我希望通过与美国领导人和美国人民的直接接触和会谈，进一步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以及两国在科学技术、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里的友好联系与合作；在庆祝中美两国建交的时候，我们深切怀念生前为中美关系开辟了道路的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也对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作出了贡献的美国友好人士进行高度评价。”^①邓小平在这里所说的“中国政府一向是以长远的政治和战略观点来看待中美关系”的思想，正是邓小平本人在以后处理中美关系时的基本思想。

从1979年元旦到春节前这一段时间，邓小平利用会见美国众议院银行、财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访华团、美国记者代表团和美国时代出版公司总编辑多诺万等数次美国客人的机会，继续阐述了中国政府的对美外交政策和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1979年1月28日是中国的春节，这一天是中国人最为喜庆的日子，也是中国人一年里万象更新的开始。就在这一天，邓小平从北京

^① 《人民日报》1979年1月2日。



启程应邀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第一次正式访问美国。

在当时，中国的最高领袖是身兼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在邀请华国锋还是邓小平的问题上，美国方面是有过考虑的，但是最终还是确定了邀请邓小平访问。

邓小平一行在当天下午一点三十分（华盛顿时间）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按照原来的商定，美方是派国务卿到机场迎接。但是，当邓小平走出飞机舱门时，却看到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和夫人，国务卿万斯和夫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和夫人以及各界人士四百多人到机场迎接。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到机场迎接、机场上长达一公里的红地毯以及十九响礼炮的鸣放，显示美国是以重要的国家元首的礼遇来接待邓小平副总理的。

当晚，邓小平出席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为其举行的家宴。后来，布热津斯基得意地对他的同僚们说：“你只要一想起邓小平先生和夫人，就会感到惊奇，一个十亿人口的领袖，抵达华盛顿仅两个小时，就很亲切地到我家共进晚餐。由此可见，中国人永远都不会忘记自己的老朋友。”^①席间，布热津斯基向邓小平谈了美国政府对邓小平此行的安排，邓小平则提出，希望单独与卡特总统谈一下越南问题。从邓小平的语气中，布热津斯基已感到邓小平会有要事相告。^②

1月29日上午，邓小平出席了卡特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并讲了话。邓小平说：“中美关系正常化远远超过两国关系的范围。位于太平洋两岸的两个重要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对于促进太平洋地区

① 何春林：《中美建交秘辛——邓小平访美》，香港万达龙国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4年出版，第241页。

② 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第461页。



和世界的和平,无疑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指出:“世界人民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倍努力维护世界的和平、安全和稳定,世界形势也在经历着新的转折,中美两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必将对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在白宫的欢迎仪式后,邓小平继续与卡特总统会谈,这是邓小平与卡特三次正式会谈的第一次。按照原定的日程,第一次会谈是由双方各自谈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作为主人,卡特总统首先发言,他说:“我特别关切的是两件事:一件是,从东南亚、印度洋北部到非洲这一地区动荡不安的局势以及某些外来的强国企图利用这一局势;另一件是苏联军事力量的迅速增长。……我的责任是确保美国在世界事务中保持强大而有益的影响。……像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国家影响的日益扩大是积极的事态发展,相信同这些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将维护我们未来的安全。”^①邓小平则提出:“我们的看法是,世界很不安宁,存在着战争威胁。这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生前就提出的看法,并认为战争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第三和第二世界应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这一反霸统一战线,坦率的讲也包括美国。所以我们说中美之间有许多共同点。对付苏联称霸世界,美国理所当然是一主要力量。但美国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从自己所负责任的角度来说,有某些不足之处。”^②

这是中美两国领袖在关系正常化以后第一次正式谈论战略问题。邓小平强调,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意义远远超过两国双边关系的意义,这种关系的建立,将促进太平洋地区和世界的和平。邓小平还认为,对付苏联称霸世界,美国是一支理所当然的主要力量,而且美国还是第三和第二世界联合起来的反霸统一战线的一个成员。而卡特

① 卡特:《保持信心》,第189页。

② 《伟人的足迹》,第200页。



总统也相信，同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将有利于维护美国未来的安全并确保美国在世界事务中保持强大而有益的影响。可以说，通过这次会谈，中美就正式形成了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战略联盟。

1月29日下午，邓小平与卡特总统继续就国际问题交换意见，两位领导人谈到了中东问题、朝鲜问题和美苏限制战略武器协议问题。就美苏限制战略武器协议问题，邓小平说：“我们不反对美苏签这种协议，这种协议甚至是必要的。但我们认为它管不住苏联。重要的是要做扎扎实实的工作。这就是说，中、美、日、西欧和第三世界联合起来，破坏苏联的战略计划。”^①

在1月29日下午5时，卡特总统应约与邓小平进行单独会谈，中方出席的还有外长和副外长，美方则有蒙代尔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和布热津斯基博士。

经过白天的两次成功的会谈后，晚上，邓小平高兴地出席了卡特总统举行的欢迎宴会。在祝酒时，邓小平说：“我们两国曾在30年间处于隔绝和对立的状态，现在这种不正常的局面终于过去了。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但是两国政府都认识到，两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要求我们从国际形势的全局、用长远的战略眼光来看待两国关系。正是因为这样，我们顺利地达成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协议。不仅如此，还在关于建交的联合公报中庄严地作出承诺，任何一方都不应当谋求霸权，并且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一承诺既约束了我们自己，也使我们对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增添了责任感。我们相信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的发展，也必将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

^① 《伟人的足迹》，第201页。



进步的强大因素。”^①

在其后七天的访美行程中，邓小平继续与美国朝野的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交流。除了卡特总统、万斯国务卿、布热津斯基博士外，邓小平还会见了前总统尼克松、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部分参议员、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部分众议员、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总经理爱德华·卡尔森、波音飞机公司董事长桑顿·威尔逊、两批新闻界的重要人士以及美国外交政策协会、国立美术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亚洲协会、中国理事会、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全美华人协会等社会团体；参观了宇航博物馆、波音 747 装配厂、福特汽车公司和林登·约翰逊航天中心；到林肯纪念堂和马丁·路德·金的陵墓敬献了花圈；观看了歌舞表演和马术表演；并与美国签订了中美航空协定、中美海运协定、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2月5日，在登机回国前，邓小平还为《美洲华侨日报》题词：“愿你们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做出更大的努力，愿你们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统一大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邓小平的这次访美，成为中美关系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而放眼于这次访问的大背景以及邓小平的出色表现，就使“此行从原先所设想的仅是礼节性的外交访问，变成一次具有全球地缘政治意义的高峰会谈”。^②

① 《伟人的足迹》，第 201 ~ 202 页。

② 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第 458 页。



三、《与台湾关系法》的出笼

中美两国虽然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但是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某些重大利益上的对立也是根深蒂固的。实际上,从中美发表建交联合公报到邓小平访问美国期间,美国的亲台势力就已经竭尽全力在台湾问题上给中美关系制造麻烦和障碍。其结果,就是美国在1979年3月~4月出笼了《与台湾关系法》。

美国政府坚持:要在中美建交后继续保持与台湾的经济、文化和其他方面的联系。但是,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任何条约包括经济和文化条约都将是无效的。所以,从法律上讲,美国必须要有一个与台湾保持关系的立法,才能与台湾保持经济、文化和其他方面的联系。按照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内政和外交的立法权都在美国的参众两院国会里。

在美国国会里,亲台的势力非常强大,大部分的共和党议员和一些有影响的民主党议员如约翰·格兰、理查德·斯通、克莱门德·扎布洛奇、爱德华·肯尼迪等,都是强硬的亲台派。他们对卡特政府以秘密外交的方式与中国政府谈判建交已感到不满,而且他们更觉得美国政府对台湾的安全保障上是做得不够的。因而在中美宣布建交后不久,许多的国会议员便以各种手段与白宫行政当局进行斗法。首先,早在1978年12月22日,共和党参议员贝利·戈德华特向华盛顿地方法院对卡特总统提出诉讼,诉讼称卡特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是“违宪”;1979年1月15日美国第96届国会开幕,在头两天,参、众两院就出台了十几个有关台湾的提案,这些提案都是旨在保留美国与台湾的政治、军事联系;其后,在国会审议政府提出的《台湾授权法案》时,更是风波迭起,引发了好几场大辩论;到了对首任驻



华大使的确认程序时，赫尔姆斯等参议员还用此机会发泄对行政当局的不满。^①

1979年3月28日和29日，美国国会两院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4月10日，卡特总统签署了这一法案。这一法案宣称：

(一) 保持并促进美国人民同台湾人民，以及同中国大陆人民和西太平洋地区所有其他人民的广泛、密切和友好的商务、文化和其他关系；

(二) 该地区的和平和稳定符合美国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并为国际上所关注；

(三) 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是基于台湾的前途将通过和平方式决定这样的期望；

(四) 以非和平的方式包括抵制和禁运来决定台湾前途的任何努力，都是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五) 美国将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

(六) 使美国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和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②

这一法案，不仅是从法律上确认了美国继续保持同台湾的商务、文化和其他关系，而且是从法律上维持了美国与台湾的军事联系，这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并严重地损害了中美战略合作关系的基础。所以，这个法案一出笼，邓小平就毫不客气地对之进行指责。

① 美国的《台湾关系法》立法过程可参阅：金秀明等编译：《台湾关系法——过去与未来十年》，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1年版；李大维著：《台湾关系法立法过程》，台北：风云论坛出版社，1996年版；杨基铨主编：《台湾关系法二十年》，前卫出版社，1999年版等著作。

② 胡真为著：《美国对华“一个中国”政策之演变》，台湾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73～274页。



1979年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由美国国会众议院军委会主席梅尔文·普赖尔率领的访华团时表示:“我们对美国国会最近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上涉及台湾问题的行动当然有意见。希望今后逐步消除这些分歧。”^①

随后,4月19日,在会见由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弗兰克·丘奇率领的访华团时,邓小平再次指出:“中美两国关系能够正常化的政治基础,就是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现在这个政治基础受到了一些干扰。对你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中国是不满意的。这个法案最本质的问题就是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法案的许多条款还是要保护台湾,说这是美国的利益,还说要卖军火给台湾。一旦台湾有事,美国还要干预。不管措辞如何,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个法案实际上否定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基础。我奉劝美国朋友注意这个问题,这样的事情不能干了。我们注意到卡特总统在签署这个法案时说,在执行法案时他要遵守中美建交协议。我们以后要看实际行动。”^②

按照邓小平的谈话精神,中国政府于4月28日正式向美国驻华使馆提出了抗议照会,表示:中美建交协议是今后中美关系发展的基础和准则。中国政府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如果美国方面在台湾问题上不恪守建交时达成的协议,而怀有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这只会给中美关系造成损害,对中美任何一方都不会带来好处。^③

对于中国政府的抗议,美国驻华使馆在7月6日的回复中称:美国将遵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的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各项谅解。《与台湾关系法》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所表示的期望是同1978年

①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17页。

②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17~118页。

③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4页。



12月15日的声明相一致的,美国政府一直努力确保该法的措辞不损害上述的各项谅解,以及确保不采取背离上述各项谅解的行动。这一回复并重申:美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承认中国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①

可以说,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是给刚刚发展起来的中美关系投下了一道沉重的阴影,它也显示出前途光明的中美关系的发展将会走在一条崎岖而艰难的道路上。

但是,无论如何,坚冰已经打破。中美两国制度化的合作关系已顺势在军事、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迅速展开。中美两国在一年内陆续签订了领事、航空、海运、纺织品等协定。卡特政府的许多重要阁员如布卢门撒尔、克雷普斯、斯特劳斯、布朗、斯莱辛格等相继访问北京,中国政府的康世恩、耿飚副总理以及一批政府部长也相继访问了华盛顿。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1979年9月,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在访问中国期间宣布,美国决定给中国以最惠国待遇,同时还向中国领导人表示,美国认为中国是一个友好国家,从而不受通常对共产主义国家实施的某些限制,并提供特别贷款供中国发展经济。在北京大学演讲的时候,蒙代尔还宣称:一个“强大、安全和现代化的中国”符合美国利益;“任何国家试图在世界事务中削弱或孤立你们是对美国利益的一种敌对姿态”。^②蒙代尔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国方面破例地在电视和广播中向全国转播,美国方面对此也感到十分的“欣喜”。^③

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这一事件极大地影响了美苏关系以及世界的政治军事格局。卡特总统在1980年1月23日向美国国

①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第235页。

② 《人民日报》1979年9月3日。

③ 胡真为著:《美国对华“一个中国”政策之演变》,第97页。



会两院联席会议作国情咨文时,提出了他的“卡特主义”：“我们必须坚决阐明我们的立场：任何企图控制波斯湾地区的外来势力都将被认为是对美国的根本利益的侵犯,我们将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包括武装力量在内,来反击这种企图。”^①

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促使中美的政治和军事合作关系更加紧密。1980年2月,在国防部部长布朗成功访问中国后不久,美国国务院就对中国放宽了条例,允许军火管制局发放许可证向中国出口30种后勤设备,包括防空雷达、无线电对流层通讯设备、直升运输机、牵引车、电子干扰装置等。1980年4月,美国商业部把中国从与华沙条约集团归在一起的Y类调到P类,从而扩大了可对中国出口的商品范围,包括运输飞机、远距离通讯设备、军用直升飞机之类的敏感装备。1980年9月,美国国防部的一个高级代表团访问北京时,又宣布准许400多种可用于军事后勤的先进技术装备可对中国出口。^②

值得注意的是,在卡特政府的后期,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1979年,美国根据在中美建交前就同台湾达成的协议,履行了向台湾高达8亿美元的军售,其中包括装备有精确制导武器和小牛式导弹的F-5E截击机。1980年1月2日,美国国务院通知国会:美国政府决定对台有选择地出售一批价值2.8亿美元的武器,其中包括隼式(I-Hawk)防空导弹,改进型海榭树(Sea Chapparral)舰载防空导弹,陶式(TOW)反坦克导弹,76毫米速射火炮以及改进型的电子识别与控制系统。而在五六月间,美国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在国会就《与台湾关系法》执行情况的听证会上透露,美国政府打算考虑两家公司,即诺斯罗普公司和通用动力公司,向台湾出售新型战斗机问题。7月,美国政府还批准了对台销售50门

① 卡特:《保持信心》,第280页。

② 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第270~280页。



8 英寸自行榴弹炮。

但是,总的来说,卡特政府在其任内,虽然承受了来自国会的强大压力,在对台军售这一问题上还是保留了比较克制的态度,而且始终没有满足台湾方面对 FX 系列战斗机、鱼叉式舰对舰导弹、标准型防空导弹等先进武器的要求。^①

邓小平在处理中美关系之始,面对了从尼克松、福特到卡特这三届美国政府。在这一时期,邓小平使中美关系走向了正常化并与美国结成了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战略联盟。这一结果,使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中国的大国外交呈现了崭新的局面,同时国家安全也得到了有力的保障。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功绩。邓小平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中,没有彻底解决台湾问题,但他一直期望着尽快解决这一问题。虽然,美国出了个《与台湾关系法》,但直到卡特政府离任以前,邓小平对台湾问题的解决还是抱着乐观的态度。在这一时期,台湾问题逐渐从“小事”变成“大事”,成为中美之间矛盾的焦点和国家关系正常发展的最大障碍。

① 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年版,第 492 ~ 493 页。



第二章

冰河下的暖流

在里根政府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经历了一个“先倨而后恭”的发展过程。里根本人，是历届美国总统中最“保守”和最“亲台”的一个。在里根政府的初期，中美关系甚至到了要“爆炸”的境地。但是，在中美两国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却得到了长达六年的最为顺利的发展。其中，邓小平时刻从战略的高度来审视和处理中美关系，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一、里根对华政策的倒退

1980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向在任总统吉米·卡特挑战的是美国共和党候选人罗纳德·里根。到了1980年年中，美国的大选行情因为美国国内经济不佳、伊朗人质危机等问题而变得越来越有利于里根而不利于卡特了。

1980年8月20~23日，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乔治·布什受里根的委托来华访问。8月22日，邓小平会见了布什。在与布什会谈时，邓小平说：“我们对里根先生最近一个时期发表的一些政见和共



和党的执政纲领感到不安。不管你们哪个党执政,都涉及到中美关系是停滞、前进还是后退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历来阐述的观点是,中美关系是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其他问题不能代替。”他请布什向里根转达中国政府四点正式立场:“(一)中国政府希望中美关系发展,不应该停滞,更不应该后退。任何从中美建交公报后退的言论和行动,中国政府都坚决反对。(二)不管美国1980年大选后哪一个党执政,中国政府评价和判断美国政府的战略决策和对外政策都将把对中国的政策视为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因为这是一个全球战略的问题,不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三)如果共和党竞选纲领中对中国政策部分(其中包括对台湾的政策)和里根最近发表的有关言论,真的付诸实施的话,这只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后退,连停滞都不可能。(四)如果以为中国有求于美国,以致一旦美国共和党竞选纲领中的对华政策和里根先生发表的有关言论成为美国政府政策付诸实行,中国也只好吞下,别无选择,那完全是妄想。”邓小平向布什说明:“这不只是对共和党执政而言,即使民主党这样搞,也一样。因为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所以,我把话说清楚,把这几条写成文字交给你,请转告里根先生。”^①

邓小平与乔治·布什是老朋友,1974年布什从驻华联络处主任任上回国准备出任中央情报局长前,邓小平就在家中为其设宴饯行。里根在大选中,讲了许多亲台反华的话,激起了中国的强烈反响。1980年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如果按照里根声明的政策,美国与台湾建立“官方关系”,这就意味着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原则被彻底破坏,中美关系将倒退到两国人民都不愿意看到的状态。布什来华访问,就是为了平息中国的愤怒。邓小平对布

① 邓小平的上述三段话见《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66~167页。



什的这番话显示了中国政府希望中美关系发展的意愿，希望里根能从全球战略的高度来看待中美关系。邓小平还明确地发出警告：不要以为中国有求于美国，一旦美国共和党在竞选纲领中宣扬的对华政策真的付诸实施的话，就只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后退。“连停滞都不可能”。邓小平毫不掩饰他对里根亲台倾向的强烈不满。

罗纳德·里根一直是以最积极的反共人士而著称。早在他担任美国电影工会主席的时候，他就认为：“美国面临的最阴险最邪恶的威胁莫过于共产主义的威胁了。”^①在与中国关系的问题上，他也是一个毫不含糊的亲台派，正如黑格所观察到的：在台湾问题上，“里根在感情上陷得很深，甚至在荣誉感上也是这样。任何背弃台湾或让台湾受辱的建议都深深地触犯他的忠诚感，即老朋友和长期盟邦是要彼此报恩的。”^②里根本人曾多次访问过台湾，他称台湾是他的老朋友，而他则是“台湾的坚决支持者”。尼克松在1972年访华后，旋即派时任加州州长的里根到台湾进行安抚。1978年12月，美国政府宣布断绝同台湾的关系时，里根发表声明，指责美国政府的行为是“公开的背叛”。在1980年竞选总统期间，里根猛烈攻击卡特政府的对华政策，反对中美建交，反对美国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认为卡特政府在中美建交时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实在没有必要，也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他还在道恩发表的关于台湾问题的竞选声明《严重的关注》中公然宣称，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是他当选总统后“最渴望做的事情之一”。里根还引用美国同时承认东、西德的例子，鼓吹“两个中国”和“一国两府”。^③里根的这些言论，既是他内心真意的流露，也有竞选的需要。这些不合时宜的言论，在美国就受到许多有识

① 罗纳德·里根著，张宁等译：《里根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页。

② 阿尔·黑格著，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译：《黑格回忆录》，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第90页。

③ 袁文靖：《里根政府对华政策》，台北：国际现势周刊社，1984年版，第12～13页。



之士包括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的抨击。1980年6月11日,霍尔布鲁克表示:如果美国按照里根的主张,同台湾恢复“官方关系”,那将破坏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基础,从而危害美国的利益。^①

布什回国后,马上把中国之行的情况向里根作了报告。8月25日,里根和布什即以共和党正副候选人的身份举行记者招待会,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里根宣布了他的对华政策的要点是:第一,“美中关系无论对中国的利益还是对美国的利益来说,都是重要的。我们的合作关系应该是全球性的和战略性的”。第二,“保证同日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和台湾合作,为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稳定 and 经济发展而努力”。第三,“同该地区的所有国家合作和磋商,共同坚决对付威胁该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侵略和谋求霸权的行径”。第四,“使美国同台湾的关系依照我国的法律,即《与台湾关系法》得到发展”。第五,“不允许任何外国在我们保护美国利益和执行我国法律时进行干预”。^②对于里根的这一政策纲领,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地要对其进行强烈的批评。中国《人民日报》于8月28日发表了题为《里根想把中美关系引向哪里?》的评论员文章,文章指出,里根主张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完全违背了中美两国达成的建交协议。里根对中美建交公报闭口不谈,却死抓住美国的所谓《与台湾关系法》作为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的依据,这完全是站不住脚的。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只是美国的一个国内法,决不能作为处理中美关系的法律基础。企图把一个损害中美建交政治基础的美国国内法强加给中国,使中美关系倒退,这才是真正不能允许的。

1980年11月,里根在大选中获胜。鉴于里根在大选中的言行,邓小平对中美关系的走向做了一个更坏的打算。11月15日,邓小平在

^① 《人民日报》1980年6月14日。

^② 梅孜主编:《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第193~197页。



会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时说：“中国政府欢迎里根访华。发展中美关系是美国两党的政策。希望里根执政后不要使这种关系停滞，更不要倒退。继续发展两国的关系这是全球战略所要求的。这是一个最富和一个最穷的国家打交道。中国虽仍然是个穷国，但从战略上讲，还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国家。中国政府对《与台湾关系法》是不满意的，真正造成中美关系危机的是《与台湾关系法》，一句话，我们希望中美关系要发展，不要停滞倒退。中美双方领导人进行接触总是有益的。”^①

1981年1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副领袖史蒂文斯和美国总统出口委员会副主席陈香梅时，又详细地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邓小平说：

我们希望里根先生就任总统后能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中美关系打开新的一页是从共和党开始的，那是尼克松先生、基辛格先生执政的时候。我们总是记住，是尼克松先生在任总统期间下决心改善中美关系的。在卡特总统任内，中美关系有了新的发展，但在他任期的后一阶段，有一个《与台湾关系法》。就中国方面来说，我们希望中美关系继续发展。坦率地说，里根先生在竞选纲领中说的有些话确实使我们有所不安。布什先生来的时候，我们说了，我们理解在你们国家竞选中的语言执政后不一定付诸实施，我们重视的是里根先生就任后将采取什么行动。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主要是解决了台湾问题，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才取得了中美新关系的建立，并使之继续得到发展。台湾问题本来是过去的问题，现在又重新提起来了。我们请布什先生向里根先生转达我们在

^① 《人民日报》1980年11月24日。



这个问题上的很清楚的立场。

随后,邓小平针对美国舆论的四种观点,进行了逐一批驳。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很弱很穷,装备又落后,所以中国是无足轻重的,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国家。”对此,邓小平认为,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对世界力量对比的判断问题。中国历来不回避自己的“穷”和装备落后。但是中国有它的长处,就是地方大、人多,“块头大”。还有就是“不信邪”,中国人向来是根据自己的见解行事,敢于正视现实,用弱小的力量去面对强大的力量。所以,邓小平用教训的口吻说:“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发生错误判断的人,起码不会有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

“第二种观点,说中国现在有求于美国,美国无求于中国。”对此,邓小平表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一定会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原则。邓小平以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例说明:中国是很穷,但有一个长处,就是中国本身的生存能力比较强,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也能够生存。就算一切国际通道都切断了,或者世界发生大的动乱和各种难测的变化,中国自己也能够活下去。邓小平以不屑的口吻斥责这种观点说:“以为中国有求于人的判断,会产生错误的决策。”

“第三种观点,认为如果美国政府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像台湾这样的问题,中国可以吞下去。”对此,邓小平态度强硬地表示:如果真的由于台湾问题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只能面对现实。“不会像美国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中国出于反对苏联的战略会把台湾问题吞下去,这不可能。”邓小平还直截了当地指出:如果里根采取向台湾派总统私人代表的形式,中国肯定会认为美国政府的决策已经改变了中美建交公报和上海公报的原则。这样“不仅是使中美关系停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75页。



顿,而且是使它倒退。”

“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对此,邓小平用嘲笑的口吻说:“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的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以前的观点。”

在批驳了上述四种观点后,邓小平再次表示:“我们真诚地希望中美关系不但不要停滞,而且要发展。我们对竞选期间和总统就任以前的言论是很注意的,但我们可以对这些言论作某种理解。我们重视的是美国新政府上任后采取的行动。我刚才说的都是中国政府的正式立场。我认为,使美国朋友们清楚地了解中国政府的正式立场,这是很重要和很必要的。”^①

此时,里根政府上台在即,中美关系因为里根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而乌云笼罩。邓小平所会见的史蒂文斯和陈香梅,是美国共和党内对里根的对华政策有重要影响的人物,邓小平的这番话,基本上就是通过他们向即将上任的里根总统转达一个“中国政府的正式立场”。这一立场,是理性的同时是强硬的。邓小平的这一举动,对清醒里根政府的头脑是有作用的。正如邓小平所点明的那样:“竞选期间和总统就任以前的言论”与“新政府上任后采取的行动”是有所不同的。就在1981年1月20日,美国新总统里根举行就职仪式的典礼上,只有柴泽民大使作为受美国官方邀请的中国代表出席,而早先受到美国正式邀请并已抵达华盛顿的国民党秘书长蒋彦士则因“患重感冒住院治疗”而没有出席典礼。这一事情,是里根政府执政期间中美关系朝着现实主义方向发展的一个好的兆头。

里根上台以后,美国的外交政策作了很大的调整。从总的来看,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75~378页。



苏联全球性的扩张主义行动迫使美国对苏联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政策。里根在回忆录中这样解说他的对苏外交政策：

我们同苏联关系的基础是“缓和”，俄国人把这个法文词解释为他们在世界上随心所欲地推行颠覆、侵略和扩张政策的自由。自列宁以来的每个苏联领导人，直至包括目前的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都说苏联的目标是要使世界共产主义化。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暂停以外，在长达 65 年的时间里，俄国人实际上一直是我们的敌人；在这整个期间，他们的政策一贯狂热地致力于摧毁民主和强制推行共产主义这个单一目的。

在战后的岁月里，美国一再挺身抵抗苏联扩张主义的威胁以捍卫自由，因为苏联扩张主义的触角伸向了世界上遥远的角落——土耳其、希腊、朝鲜、东南亚等等。我们的政策就在于，作为一个伟大的民主国家，我们有义务帮助其它国家实现自由，就像我们在二战后帮助那些刚摆脱殖民地历史的新生国家时所做的那样。我们花数十亿巨资用以帮助在战争中遭到破坏的国家——包括我们以前的敌人——进行重建。我们花数十亿美元用以供养驻扎在西欧和南朝鲜的美军，以图遏止共产主义。有时捍卫自由的代价是相当昂贵的：许多英勇的美国人做出了最后的牺牲。美国一直在为捍卫人类自由而付出代价。

70 年代初，我感到我们的国家已开始放弃作为自由世界的精神领袖以及民主的首要捍卫者的历史作用。我们的一些信心已经丧失，我们维护我们所珍惜的价值的部分承诺也已丢掉。

上届政府认可了美国已走过其经济鼎盛时期的看法，并说我们的人民将只能满足于并不怎么乐观的未来；同时，由于某种原因，它也接受了这样一种看法，即美国不再是昔日的世界强国，它已无力驾驭世界局势。我们有意无意地告诉世界，华盛顿



已丧失了自信心，不再坚定不移地坚持它的理想及对我们的盟友所做的承诺，并且它似乎承认苏联扩张主义的胜利不可避免，尤其是在贫困和不发达的国家。

我不敢肯定这种撤退的感觉根源何在；或许它同越战、能源危机以及卡特政府当政时期的通货膨胀和其它经济问题有关，或许也同卡特政府因其伊朗政策的失败所遭受的挫折有关。不管原因何在，我相信美国从其作为超级大国和自由世界领袖的地位上退缩下来是不明智的、没有道理的和危险的。

可以断言，苏联已把我们行动的犹豫和勉强以及我们国家自信心的衰退感看成是一种软弱，并企图最充分地利用这种软弱，以加快实现一个共产主义统治的世界。由于近来东欧发生的惊人剧变，人们很容易忘却 1981 年春的局势；苏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致力于实现列宁的共产主义世界的目标。在所谓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指导下，他们声称有权支持“民族解放战争”，有权以武装干涉来镇压对世界上任何共产主义政府的任何挑战。

我们看到了勃列日涅夫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实践。在萨尔瓦多、安哥拉、埃塞俄比亚、柬埔寨及其它地方，苏联及其代理人古巴、尼加拉瓜、利比亚和叙利亚，正在企图通过颠覆和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来推翻和摧毁非共产主义政府。在阿富汗，他们正残忍地试图用坦克和火箭镇压对共产主义统治的反抗；在波兰，他们正以入侵这种明显的暗示，对一场试探性的民主运动做出反应，并用同样的办法压迫那些试图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实现民主的自由战士。

作为我的对外政策的基础，我决定我们必须给俄国人送去一个尽可能强有力的信息，让他们知道，当他们为恐怖分子提供军事和财政支持以颠覆民主政府的时候，我们决不再袖手旁



观。我们的政策应奠定在实力和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我需要的是通过实力实现的和平,而不是一纸空文的和平。

里根在其上台之日就已经确信,对付苏联在全球的军事扩张是他外交政策的核心。苏联的军费开支自1970年以来已经大大超过美国,苏联在战略核武器运载系统、战术飞机、潜艇、大炮和防空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数量优势,这无疑是削弱了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的防卫能力、威慑能力和打击能力。除此以外,苏联在东欧打击波兰团结工会、在尼加拉瓜支持桑地诺政府、在萨尔瓦多支持反政府武装等实际行动,也使里根政府相信苏联正在发动全球范围的颠覆行动。因此,里根意识到,美国再也不能面对苏联无情的挑战而没有还手之力了。

此外,美国新政府继承的是一个经济的烂摊子。当时的年通货膨胀率高达10%以上,利息率则在20%以上,经济几乎没有增长,失业人数却日益增长,美国经济正在经历着“滞胀”的痛苦折磨。美国疲软的经济制约了美国的实力和扭转世界战略平衡的能力。所以,里根政府并不满足于简单地抛弃缓和,而是要借助于对抗苏联的扩张威胁来重振美国的国威。

在总的对外政策上,里根政府较之卡特政府有三点明显的不同,一是对苏联采取了异常强硬的政策;二是重整军备,以实力求和平;三是强化反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斗争。

在里根政府执政的初期,在总体的外交政策上,里根总统的决策圈子内的意见是比较一致的。但在与中国的关系问题上,则存在着两派的意见。

里根总统本人以及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理查德·艾

① 罗纳德·里根:《里根自传》,第232~235页。



伦、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总统法律顾问埃德温·米斯、白宫办公厅副主任迪弗等，本质上是低估中国的战略重要性并倾向于加强与台湾的关系。艾伦就赞成美国向台湾出售先进的军用飞机，给予美台关系以更大的外交重视；里甘认为，台湾应当作为“特别国家”被重新接纳进世界银行；米斯则多次重申要在白宫接待台湾的政府代表。

而里根总统的首席外交顾问、国务卿亚力山大·黑格、助理国务卿霍尔德里奇以及副总统乔治·布什却是重视并强调发展与中国的关系。黑格认为：就美国与西方在 20 世纪最后 25 年的战略利益而言，中国也许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中国的战略思想是联合世界上的大、小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来共同遏制苏联霸权主义，这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随着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后缓和的崩溃，美国与苏联之间的新冷战已经全面出现，美国应动员一切国内和国际的力量来对付苏联的挑战以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中国是全球反苏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沟通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桥梁。因而向中国妥协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迫切。黑格还认识到，在里根竞选之时，中美关系处于脆弱不稳的状态，是中国对美国产生“三大失望”而造成的。黑格所谓的这“三大失望”是：中国对美国在越南战争之后的消极状态感到失望；中国对中美关系的成果感到失望；中国对中美关系并未产生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感到失望，而这最后一点正是中美关系中“关键而基本的问题”。黑格认为：中国人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没有什么妥协余地的，因而美台关系就成为巩固美中战略合作关系的一个障碍和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①

在上述的两派意见中，“亲中”派占据了外交行政的实职，所以在

^① 黑格：《黑格回忆录》，第 86～89 页。



里根政府上台后,美国国务院的实际行动是理性的和友善的。如前所述,在新政府上任前一天,为回应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黑格指示国务院将台湾代表以官方身份出席里根总统就职仪式典礼的邀请全部撤回。黑格后来承认,“这段插曲既做到了刺激北京和台北,也暴露了美国人的笨拙死板和反应迟钝”^①;此外,黑格还采取了一些行动使北京确信里根政府将坚持卡特政府承担的义务。1981年1月,黑格宣布美国正在考虑向中国出售武器以及搜索和救援直升机。2月,美国国务院在一个场合宣布美国仍将坚守中美建交公报的原则。3月,黑格安排里根与柴泽民大使会见。在这次会见中,里根表达了他对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兴趣,并直率地表示,尽管他承诺维持与台湾的长期友谊,他本人仍愿意遵守中美建交公报的原则。^②3月23日,在美国政府的安排下,前总统杰拉尔德·福特专程前往北京,向邓小平转达了里根对中美关系重要性的理解和继续发展关系的承诺。5月,美国政府宣布,黑格国务卿将在6月接受中国的邀请前往北京进行访问。在黑格出访前,美国政府把中国划为“友好而非盟国”的国家,从而放宽了对中国获取美国技术的限制。^③

在黑格启行前,里根请黑格向中国转达:第一、美国正遵循一项全面的政策以对抗苏联及其代理人的扩张主义,并强调美国在亚洲存在的永久性。第二、把中国视为友好的非盟国的决定强调了中美关系的新概念基础,这种关系是以美中两国的战略联盟以及在亚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共同目标为基础的。黑格还受命探讨在台湾问题上谋求暂时解决的方案,包括非官方关系和武器销售的限度。^④

① 黑格:《黑格回忆录》,第91页。

② 黑格:《黑格回忆录》,第95页。

③ 黑格:《黑格回忆录》,第96页。

④ 黑格:《黑格回忆录》,第97页。



1981年6月16日,邓小平会见了美国国务卿黑格及其一行。在会见时的谈话中,邓小平还是希望美国政府能够“从全球战略的角度来对待两国关系”。邓小平对建交以来的中美关系有满意的地方,如贸易关系有发展,两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协调行动。但是,邓小平也毫不客气地指出“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美国仍采取敌对国的态度来处理同中国的贸易、商业、技术转让等问题。”邓小平反问:“现在台湾海峡形势很平静,有什么必要不断向台湾出售武器?”而“中国最大的政策之一,就是要统一祖国,使台湾回归祖国”。邓小平指出:美国对台湾的军售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最敏感的问题”。邓小平明确表示,思想上已经有了准备,就是不惜“中美关系停滞,甚至后退”。^①

在中美建交之前,中美双方为了共同的战略目标,是有意无意地按下不提售台武器这一敏感话题。虽然邓小平和中国政府从未在这一问题上有过软弱的表现,并一直保留着要求美国方面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权利,但是,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问题在中美建交时未能解决,始终是邓小平以及中国领导人的一块心病。到了里根总统上台的时候,邓小平在国内的领导地位已经非常稳固,中国在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也有了明显的改善,而里根总统强烈的亲台倾向也使中美之间频频拉响警报,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最为敏感的问题,就理所当然成为中美之间不得不着手解决的问题。

黑格从中国访问回国后,对中国政府在售台武器问题上的立场是有了一个更加清醒的认识,也认为把对台售武的水平限制下来是明智的。因此,他请国防部组织军事情报局的军事专家们专门就台湾的安全与购买美国先进的战斗机之间的联系和必要性进行了研究。

^①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91~192页。



最后,这一研究报告的结论是:台湾不需要 FX 战斗机,但美国仍可以以现在的技术水平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①

当时面临的另一个较为急迫的问题是 F-5E 截击机的联合生产问题。早在 70 年代中期,美国的一家飞机制造公司诺斯罗普公司就获得了美国政府的批准与台湾联合生产 F-5E 截击机,到 1980 年合同期满,卡特政府同意延期三年。此时,三年期限又将满了,F-5E 截击机的生产是否延续以及相关的对台飞机销售问题,又摆到中美关系最显要的位置上了。此事紧接着在美国国会也引起风波。在美国国会里,一直就有一股支持台湾的强大力量,里根上台后不得不采取的现实主义态度也使美国国会里的许多“亲台”分子感到不满。此时,美国国会的大多数议员都表示支持向台湾出售战斗机。当时有一个调查显示,在美国参议院中,对向台湾出售战斗机持赞成意见的有 59 人,持反对意见的则只有 6 人。在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也有相当一部分议员支持向台湾出售先进的 FX 战斗机。^②

在这一敏感的时期,邓小平会见了三批美国客人,1981 年 7 月 19 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8 月 27 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卡特。9 月 4 日上午,会见了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和夫人一行,以及由查尔斯·威克署长率领的美国国际交流署代表团、由泰莱夫人率领的美国绘画展览代表团全体成员。在交谈中,邓小平真诚地表示了希望中美关系继续发展,重申了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并指出中美关系是全球战略的需要,也是中美两国的共同需要。中美两国的关系应当进一步发展,而且,两国各方面的人士应增加来往,以促进彼此之

① 罗伯特·罗斯著,丛凤辉等译:《风云变幻的美中关系》,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版,第 244 页。

② 罗斯:《风云变幻的美中关系》,第 248 页。



间的了解。与此同时,邓小平也对美国坚持对台出售武器所可能造成中美关系的倒退发出了警告。^①1981年8月25日香港《明报》发表了一篇在7月18日对邓小平所作的专访,邓小平表示,尽管中国希望与美国发展战略合作关系,但是如果华盛顿强迫北京按美国的意志行事,北京已经做好了迎接关系倒退的准备。

1981年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前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就台湾问题向台湾当局提出了九点建议。这九点建议是:(1)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2)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3)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以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4)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5)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6)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7)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8)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9)统一祖国,人人有责。我们热诚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是。^②

1981年10月18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美国前国防部长布朗和夫人一行,在谈话中邓小平指出:对台湾的局势,蒋经国能够控制。在

① 《伟人的足迹》,第247页。

② 《人民日报》1982年10月1日。



叶剑英委员长的九点声明发表以后,美国没有理由向台湾提供武器。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处理得不好,的确存在着中美关系停滞或倒退的问题。^①

正是由于美国总统里根在台湾问题上的顽固立场,中美关系仅建交两年,即面临一个倒退的现实危险。

二、“八一七”公报的诞生

1981年10月22日,在墨西哥的坎昆举行了一次世界南北最高级会议。包括美国在内的8个发达国家和包括中国在内的14个发展中国家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结束后,中国外交部长黄华随即到美国访问并与美国方面继续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进行交涉。根据黄华与黑格在华盛顿的协议,从1981年12月4日起,中美双方开始就美国向台出售武器问题正式进行谈判。美方谈判代表是驻华大使恒安石,中方谈判代表是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和韩叙。

谈判一开始,双方就表现出巨大的立场分歧。中方要求:美国要承诺对台售武在性能上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以来的水平,并采取措施逐步减少直至在一定时期内完全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中方反复强调的几点是:1. 中美双方争论的问题实际上是要不要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问题。美国对台湾的军售已经构成对中美关系的严重威胁。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美国是否有决心尊重中国主权,逐步减少以致最后停止售台武器;2.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中国向美国提出的要求一点都不过分。而且在中国主权允许的范围内,已经对美国作了极大的照顾。考虑到售台武器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

^① 《伟人的足迹》,第250~251页。



的问题,如果美国政府确有尊重中国主权的决心,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还可以给美国更多的时间以使问题彻底解决;3. 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而美国对台湾军售是美国对中国的干涉。两个问题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美国硬要把前者作为解决后者的前提条件,是毫无道理的。这只能导致一方面美国继续对台出售武器,对中国的和平统一构成障碍;另一方面,又反过来把台湾问题尚未解决当作继续对台军售的借口。^①

对于中国方面的意见,美方根本不为所动,只是同意今后对台售武在性能上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以来的水平,但不肯承诺在一定时期内完全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美方还坚持过去的老调,即中国必须承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美国才肯同意“逐步减少”和“最终解决”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② 1982年1月,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霍尔德里奇专程到北京向中国政府解释美国政府关于对台出售武器问题的考虑,霍尔德里奇首先向中方通报,美国政府已决定不向台湾出售先进的FX战斗机,但将在1983年合同期满后,延长与台湾合作生产F-5E截击机。美国政府方面认为,此举就已经把中美关系头上的阴霾一把扫清了。他们认为,中国政府会高兴地接受他们的这一“巨大的礼物”,从而使双方的关系得到改善。因此,他们还向中国方面提交了一份包含许多原则的声明草案,美国方面希望,这份声明能够以庆祝上海公报签定十周年的名义发表并解决军售问题。但是,这份声明草案只是表示了美国向台湾出售防御性的武器不超过卡特政府时期的水平,而延长与台湾合作生产F-5E截击机一事,实际上是再一次向中国关于在谈判期间不要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警告的挑战。因此美方的这份声明草案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方的严

① 田曾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388页。

② 田曾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第388~389页。



辞拒绝。^①

由于立场的严重对立，致使中美双方关于美国对台出售武器问题的谈判至此实际上已陷入了僵局。

在中美关系处于低潮的这段时期，邓小平在多个外交场合引人注目地强调中美关系的“全球战略”意义，同时，也对中美关系可能出现的倒退发出了警告。

1981年11月22日上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副总统蒙代尔时说：“中美关系不只是同中美两国利益有关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全球战略的问题。只有把这个问题放在全球战略角度，也就是政治角度来考虑，才能处理好。台湾问题只有从战略角度、政治角度来考虑，才能作出正确的答案，才能处理得比较好。在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上，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这是十亿中国人民的感情问题。如果违背人民的意志，即使不打倒，也应当引咎辞职。”^②

1982年2月中旬，邓小平接受了《瞭望》周刊的采访，邓小平表示：如果美国坚持其对台售武的立场，中国“没有回旋的余地”；“实在不行，关系就倒退吧”；“那有什么了不起”；“我看中华民族还是存在的”。

1982年2月25日，邓小平会见了摩洛哥首相马蒂·布阿比德。在谈到中美关系时，邓小平说：“从全球战略考虑，中美关系应该好起来，现在中美之间存在着一个台湾问题，美国人自己也说是个严重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可能导致中美关系倒退。”^③

鉴于中美关系这一僵持的局面确实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在太平洋的彼岸，美国总统里根也采取了一些积极的行动。1982年2月

① 罗斯：《风云变幻的美中关系》，第258页。

② 《伟人的足迹》，第253～254页。

③ 《伟人的足迹》，第257页。



28日,为纪念上海公报发表十周年,里根与中国总理相互致函,表示了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期望;4月5日,里根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亲笔信,表示美国将坚决遵守两国在建交公报中所商定的立场,确认只有一个中国,承诺不会因美国与台湾之间的非官方关系而削弱美国政府对一个中国原则所承担的义务。里根还对叶剑英委员长就台湾问题向台湾当局提出的九点建议“所开创的新局面”表示“赞赏”。在此函中,里根还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设性意见,那就是建议让副总统布什在四五月间访问中国,以解决分歧,“创造一个合作的、持久的双边与战略关系”。^①

1982年5月7日,美国副总统布什如约到达北京。在与邓小平的会面中,布什表示:美国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恪守两国建交公报所确立的原则。布什还表示说:“我们承认我们之间有些问题还存在着分歧,需要进行讨论并交换意见。我们怀着诚意来寻求克服分歧的办法,我的这次访问就是这种诚意的象征。”关于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布什解释说:“美国不同意承诺一个停售的日期,并不意味着它今后要求无限期地向台湾继续出售武器。”^②

1982年5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布什时首先表示:“1980年你访华时,我们在交谈中主要谈了中美关系的一些原则,即中美关系不管你们哪个党执政,都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就是要发展,而不要停滞,更不应该倒退。”接着,邓小平指出:“中美之间的中心问题是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它是检验中美关系稳固性的准则。这个问题解决了,才可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邓小平还感慨地说:“两国关系只有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才能发展。《与台湾关系法》是发展中美关

① 梅孜主编:《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218~220页。

②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7~238页。



系中的一个关键问题。里根政府多次声称,只有一个中国,美国尊重中国的主权,但这要在实际行动上表现出来,首先是在售台武器问题上表现出来,因为这不仅牵涉十亿人民感情,而且是侵犯中国主权、阻挠中国和平统一的问题。”邓小平向布什提出一个希望:“美国领导人要承诺,在一定时期内逐步减少,直到完全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至于承诺的方式,可以商量,公报的措辞可以研究。但我们一定要达成谅解或协议,内部一定要肯定这一点。在讨论中,你们要求把售台武器问题与台湾海峡局势联系起来,我在访美时曾对参众议员和卡特总统讲过,虽然我们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方针,力争用和平方式实现台湾回归祖国,但我们不能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如果美国政府无限期地、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实际上是给台湾提供保护伞。”^①

邓小平对布什的这次访问是非常重视的,他称布什是“中国的老朋友”,希望布什的这次访问能够“把两国之间存在的一些阴影、一些云雾一扫而光”。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明确表示:“中美之间的中心问题是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它是检验中美关系稳固性的准则。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才可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邓小平要求:“美国领导人要承诺,在一定时期内逐步减少,直到完全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但是“承诺的方式,可以商量,公报的措辞可以研究”。邓小平并在此再一次说明了中国政府的底线,那就是“我们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方针,力争用和平方式实现台湾回归祖国,但我们不能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邓小平的这次谈话的内容,为后来的“八一七”公报奠定了基调。这次会见,原计划是一次十分钟的私人会见,但结果却持续了两个小时,为此还取消了一次大的活动。

布什访华后,中美之间僵持的局面开始有了缓和。5月28日,中

^①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20~221页。



国有关部门决定，将因涉嫌窃取中国机密而被北京市公安机关拘留的美国公民莉莎·威克瑟依法予以宽大处理。5月30日，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小霍华德·贝克一行应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邀请访问中国。6月1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小霍华德·贝克。在会谈时，邓小平指出：只有中美双方本着既维护自身国家的利益，又尊重对方的国家利益的精神来处理所面临的问题，两国才能建立良好的关系，并使这种关系继续得到发展，而不受到损害。邓小平向贝克重申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希望里根政府能够采取明智的立场，尽早处理好这个问题。^①

而在美国方面，里根总统也经受着左右两面的劝说和压力。里根总统在上台后，实际上已经放弃了他在竞选总统时关于让美台关系升级的许诺。对此，美国政坛的保守势力是十分不满的。布什访华后，以斯特罗姆·瑟蒙德为首的26名参议员准备联名向里根总统致函，以敦促里根在向台湾出售“高质量的战斗机”问题上立即做出决定。资深的亲台参议员戈德华特也表示，他对“日趋增加的表明美国无意信守对台湾许诺的证据深感不安”。并要把他掌握的“证据”“公诸于众”。^②这些压力，实际上也是迎合了里根的想法并成为里根对付“自由派”可以利用的筹码。

在里根政府内部，一直坚持要坚决改善美台关系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艾伦在1982年初由总统的密友威廉·克拉克取而代之。克拉克在外交政策方面基本上是一个门外汉，有评论认为，这一环境，也有利于黑格等人在这一段时间里努力引导里根总统走重视和稳定与中国的战略关系的路子。^③但是黑格自己认为，其时，他与里

① 《伟人的足迹》，第261页。

② 黑格：《黑格回忆录》，第104页。

③ 罗斯：《风云变幻的美中关系》，第255页。



根总统的关系已经很低落了,剩下的本钱已经微乎其微,他在政府呆的日子也不会很长了。实际上,在解决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之前,黑格已于1982年6月25日辞去了国务卿的职务。黑格在离职前,向里根递交了他最后一次的政策建议。黑格建议:美国应顺应中国的立场,保证美国是期望终止对台湾所有武器出售的。否则,美国维持目前的不妥协立场,将要冒中国报复的危险并可能导致关系的破裂。但是,里根不理睬黑格的建议和警告,他宁愿冒中美关系破裂的风险,也不愿意从根本上改变他对台湾问题的一贯主张。继任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也赞成里根的观点。

关于黑格辞职的原因,原本与中国问题无关。黑格的辞职表面上是因为他未能成功地调停福克兰群岛危机以及避免战争。但在实际上,里根之所以接受黑格的辞职还有着其他更深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里根回忆道:“我认为台湾是我们应无条件予以支持的忠诚、民主和久经考验的盟友。黑格及国务院其他人则热衷于改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以至于他们压我收回这一支持台湾的诺言。我感到我们对台湾人民负有义务,而且谁也不能阻止我们坚持这一义务。”^①

1982年7月13日,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向邓小平提交了里根总统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的“最后提议”。实际上还是在黑格任期的最后,美国国务院就已经准备了两份草案,一份是按照黑格的意图起草的,另一份则是按照里根总统的意图起草的。最后采纳的这份提议当然就是按照里根总统的意图起草的那份提议。在这一最后提议中,美国方面表示:一、美国并没有“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二、美国重申北京应当做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承诺;三、美国没有在限

^① 里根:《里根自传》,第320~321页。



定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日期问题上让步,这份提议的关键措辞是:“美国并不谋求执行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长期政策,确认停止售台武器的最终目标。与此同时,美国希望逐渐削减武器销售,直至最终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①

在里根的方案中,虽然在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日期问题上没有一个具体的日程,但还是做出了美国“逐渐削减其向台湾的武器出售,经过一个阶段后,导致最终解决”这么一个模棱两可的承诺。这就给中国方面留下了回旋和妥协的余地。7月17日,中国方面同意在美方方案的基础上继续进行谈判,但是不会按照美国方面的意见,做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承诺。

对台售武问题,虽然中美双方都难以放弃原有的根本立场,但是为了这一象征意义多于实际意义的事情而长期龃龉,实在是不符合双方的长远利益,所以,双方都着力地寻求一种妥协的办法来飞越这一障碍。

1982年8月15日,中美双方就公报的最后文本达成协议。1982年8月17日中美两国政府共同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简称为“八一七”公报,其关键性的内容是:

——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在两国谈判建交的过程中没有得到解决。双方的立场不一致,中方声明在正常化以后将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双方认识到这一问题将会妨碍中美关系的发展。

——美国政府非常重视它与中国的关系,并重申,它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美国政府理解并欣赏1979年1月1日中国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和1981年9月30日中国提出的九点方针中所表

^① 黑格:《黑格回忆录》,第105~106页。



明的中国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台湾问题上出现的新形势也为解决中美两国在售台武器问题上的分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考虑到双方的上述声明,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的供应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在作这样的声明时,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一贯立场。

——为了使美国售台武器这个历史遗留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最终得到解决,两国政府将尽一切努力,采取措施,创造条件,以利于彻底解决这个问题。^①

“八一七”公报发表后,中国政府就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了声明,表明了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一贯立场。美国总统里根也在同日代表美国政府发表了一个声明。特别表示了他将继续美国政府“对台湾人民承担的义务”,“决心保持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之间的非官方关系”,以及对中国人自己对台湾问题采取“和平的解决办法”这一点怀着“不变的兴趣和关心”^②。

1982年8月17日,在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前,邓小平会见了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对中美联合公报的即将发表表示祝贺。他说:“我们很高兴公报的发表。有人把它称为第二个‘上海公报’,这说明它是一个重要的声明,有极大的可能带来中美关系的继续发展。但在执行这一公报中如果出现新的阴影,就会旧话重提。双方都已确定发表这个声明,在声明即将发表时,有些话说一说有好处。希望双方都珍视经过十年积累来之不易的中美关系。”他宣读了致里根总统的口信,并说:“我这个人讲话从来不用稿子,但为了郑重其事,这次外交部还是

① “八一七”公报的全文见附录一(3)。

② 中美两国政府分别就中美联合公报发表的声明见附录一(4)和(5)。



给我写了这么一个稿子,是我的意思就是了。我想讲三点:一、公报只是一个良好的新的开端,但重要的还要看今后美国的实际行动。根据中美建交公报规定的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美国本来早就应该完全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由于考虑到这是历史遗留问题,中方才同意逐步予以解决。希望售台武器能够逐步但是明显地减少,能够尽早地停止,这对保持和发展中美关系,都将有直接关系。二、关于台湾问题,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在公报里,中国重申了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决不意味中国向美国或任何人作出什么承诺,也决不允许曲解为美国停止售台武器要以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为前提。三、中国重视中美关系,愿为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与美方一起作出努力;但在两国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一片乌云,这就是《与台湾关系法》,希望美国能正视这个问题。”^①

从邓小平的谈话中,我们可以体验出邓小平在中美关系出现危机时,内心所把握的几点原则。首先一点是,邓小平是“从全球战略出发”,非常“珍视经过十年积累来之不易的中美关系”;第二,为了维护这“来之不易的中美关系”,中国方面可以作适当的、策略性的妥协,从美国和当时国际政治环境的现实来考虑,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确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中国可以同意逐步予以解决。但是一定要能够逐步和明显地减少,并且能够尽早地停止;第三,要表明,中国重申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决不意味着中国作出了放弃使用武力的承诺,也不是同意美国要求的将停止售台武器以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为前提;第四,指出《与台湾关系法》是中美关系中的最大的障碍。

当时全球战略格局的势态是美苏争霸的局面发生了变化,对此,邓小平是心中有数的。美苏两霸争霸世界的局面,在1982年年中之

^①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28~229页。



际,较之 1978 年底中美建交之时,已有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是,美国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增强。到 1982 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已从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两位数降至 3.9%,到 1982 年第四季,还降到了 1.1%。同时,失业率也跟着下降,经济增长也由降转升。在与苏联开展的军备竞赛中,美国在技术领域的优势也日益显露。在美国国内,有关外交政策的争论和摩擦也已趋于缓和:美国国会已同意生产 B-1 战略轰炸机和 MX 导弹;太空导弹防御系统(即所谓的星球大战计划)也呼之欲出;通过在西欧部署潘兴 II 式导弹,美国加强了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关系的协调。这些都表明了,美国的战略地位在 1982 年有了一个很大的好转。而在另一方面,苏联的战略困境日益显露。在苏联国内,经济明显恶化,领导层老化严重;在阿富汗,苏联的军队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美苏两霸力量的此长彼消,实际上是削弱了中国在“大三角”中的战略地位。换言之,对于美国而言,与中国的战略关系的价值降低了;对于中国而言,制约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胡作非为的能力相对减弱了。从美国国内政治这方面来看,随着黑格的去职和舒尔茨的上台,美国政府决策层里重视中国战略力量的观点也迅速弱化。所以,在这种不太有利的谈判地位上,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中美关系”,作适当的、策略性的妥协,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来说都是一个利益最大化的明智选择。

可以说,中美“八一七”公报是把中美关系相对地稳定了下来。但经过了这一时期的斗争和磨合,邓小平是调整了关于中美关系的考虑的。中美“八一七”公报公布后仅四天,邓小平就重申:中国一贯的对外政策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和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

1982 年 8 月 21 日,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就中国的整个对外政策有一次重要的说明。邓小平说:



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理解自己的责任。有两条大家是信得过的，一条是坚持原则，一条是讲话算数。我们不搞政治游戏，不搞语言游戏。我个人爱好打桥牌，但中国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不仅今天如此，建国以后，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领导我们国家的时候就是如此。所以，国际上许多朋友都信任我们。我们对许多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境遇也是理解的。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为什么现在我特别强调第三世界这一点，因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对第三世界有特殊的意义。霸权主义的受害者是谁？难道是美国、苏联？美国和苏联是搞霸权主义的，他们不是受害者。欧洲、日本、大洋洲、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也不是受害者。东欧有一点受害。如果世界和平被破坏，首先受害的是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实际上没有什么和平，大战没有打，但小战不断。小战在哪里打？在第三世界。根源还不是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在那里挑拨，在那里插手！长期以来，超级大国就是利用第三世界的冲突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所以，尽管第三世界本身也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直接受害的还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这就决定了有切身利益的第三世界是真正的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这不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由第三世界所处的地位和切身利益关系决定的。

我们不是悲观主义者，我们只是提出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说，战争的因素在增长，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从联合国的角度可以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政治中积极的因素是第三世界的兴起。在联合国中，第三世界的成员增加了。对这



个变化的价值要给予充分的估量。霸权主义还要继续横行下去。但是,他们像过去那样随意主宰世界人民命运的时代已经过去。第三世界国家尽管穷,但在国际政治中的分量已经大大增加,这是任何人不能忽视的。当然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目前协调得不理想,这个问题复杂得很,在这方面要做工作。至于中国,我们的力量有限,作用也有限。人们说,中国在第三世界处于特殊的地位。我们说,中国只是第三世界的一员,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员,要尽到我们自己的责任。很多朋友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我们说,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

邓小平与德奎利亚尔的这次谈话,是中国从毛泽东时代与美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到奉行独立自主外交的转折点。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明确指出“美国和苏联是搞霸权主义的”、“霸权主义还要继续横行下去”、“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从此,邓小平在提到反对霸权主义的时候,意思就不再是只反苏联这一“霸”,而是反对“美苏两霸”。

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中共十二大上,中国再次确立了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邓小平在当天的开幕式上致开幕词时就有针对性地指出:“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②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15~41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页。



可以说,美国在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上的顽固立场,是邓小平决心放弃与美国共同遏制苏联的战略联盟,决心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的直接动因。

三、在摩擦中前进

从“八一七”公报发表到里根总统第二任期结束的这六年时间里,是中美关系从不断争执到稳定发展的时期。在这段时期里,邓小平从战略的高度把握着中美关系发展的大局,在不同的场合阐述中国在新格局下对于中美关系的立场,并努力使中美关系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在1982年的下半年,邓小平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美国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等一批前共和党的政界要人。邓小平在与他们的谈话中,表示了他对十年来中美之间建立的这种关系的重视,表示了中国继续要同美国人交朋友的好意。邓小平指出,中美之间最大的障碍是《与台湾关系法》和美国对台售武问题,他希望中美之间要建立起互相信任关系来堵塞这些漏洞。邓小平重申:中美关系具有全球战略的意义,中美之间应该大力发展经济、贸易以及文化、科技合作的关系。

1982年9月8日,邓小平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谈到不久前发表的中美“八一七”公报时,邓小平坦言道:“当然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在这个问题上,要看今后美国政府的实际行动。”邓小平还觉得“应该冷静地承认”:“发展两国关系并不是没有障碍,障碍还很多。最大的障碍还不是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比这更具有长期影响的还是《与台湾关系法》。”邓小平建议说:“中美关系还有漏洞。应该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来堵塞这些漏洞。真正从全球战略出发,维护和发



展中美关系要做许多事情。中美关系发展,不只是在台湾问题上,还有全球战略关系,两国间的经济、贸易方面以及文化、科技合作方面,领域宽得很。关心中美战略关系,热心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人,还要做许多工作。十年来建立的这种关系来之不易。我们党的十二大肯定了我们的对外关系,包括对美国的关系。但问题是还要走着看。”^①

1982年9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说:“中美关系十年来的发展不尽人意,但总的是好的。美国现政府执政后,中美关系有些波折,但不管出现什么波折,就中方来说,将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中美关系建立以来已有十年,这是来之不易的,应该珍惜。”^②

1982年12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莱曼兄弟公司高级顾问、美国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时说:“我是主张中美交朋友的,这是从战略观点出发的。尽管美方搞了许多小动作,但我们的这个方针和立场没有改变。两国关系正如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时所说的,合乎两国自身利益。这是一个基本的观点。维护和发展这种用十年时间建立的关系,关键是要互相信任。如果出现一些造成彼此不信任的事情,那就很难了。”他说:“中国同任何国家的关系都是从战略观点出发的。中国的战略概括起来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③

1982年12月中旬,美国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访问中国,谋求进一步扩大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这是“八一七”公报后第一个美国官方代表团访问中国。邓小平没有会见里甘。

不久,在1983年2月,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访问中国。舒尔茨对中

①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32页。

② 《伟人的足迹》,第266页。

③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42页。



国的这次访问,是他就任国务卿后第一次对华访问,深得里根总统信赖的舒尔茨,有“经济领域的基辛格”之称。与黑格将军的“联中抗苏”的战略观点不同,舒尔茨教授更注重从经济的角度观察世界局势,并以美国在全球的经济利益作为美国制定其全球战略的基础。舒尔茨上任后,与里根总统在对中国外交的思想和行动上,是协调一致的。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内容上,也有了调整,主要是:美国不再强调同中国对付苏联的“战略”联盟关系,打消了将中国作为东方的“北约盟国”的念头,并将中国大致地定位为“友好的非盟国”;中国在美国的世界战略中的地位也进一步下降,美国不再将中国视为世界大国,而是降格为地区性的区域大国;在亚太地区安全问题的处置上,美国则更注重日本等盟国的作用;但是,在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关系方面,美国仍然重视与中国的关系。^①

舒尔茨在访问中国前宣称,他这次访问中国的目的在于“重新恢复对两国人民极为有利的对话”。在北京访问期间,舒尔茨与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就中美关系的大局和一些突出问题交换了意见。在会谈中,舒尔茨表示希望中美两国建立“牢固而持久”的关系,但已不提美中联合抗苏的问题了;而在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上,舒尔茨则坚持美国要同时兼顾“八一七”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而且,他还想说服中国方面要适应美国方面的灵活性的限度。这一点,是与中国的原则立场有巨大分歧的。

1983年2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舒尔茨时首先就谈到了两国之间信任问题,邓小平说:“我们深感美国的政治制度和人事变迁对美国政策的连贯性有很大影响。我们两国之间现在的问题是重新认识,是怎样才能建立相互信任关系的问题。中美关系要在实际行动中体

^① 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923~924页。



现出相互信任。”接着,邓小平着重提出了中美在台湾和技术转让上的信任问题:“中美之间存在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台湾问题,一是技术转让问题。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美国对台政策是否还存在杜勒斯的影子?中美关系一谈互相信任就要接触这个问题。关于技术转让,中国希望彼此把对方放在适当的地位,中国不乞求任何东西。但中国人懂得,这样的问题是从政治角度来衡量相互关系的标准。现在看来并未建立起这种相互信任。”在谈到中国政府不接受美国法律管辖问题时,邓小平则指出:“湖广铁路债券问题,我们外长已交一份备忘录给你,这是我们的最后态度,不会有什么改变了。如果中国承认了这件事,就等于承认了你们的治外法权,你们的法庭就要管着我们。中国不受任何外国政府、法庭、议会的干涉,不管后果如何,我们都不能接受。这些问题还是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为好。还有胡娜问题,为什么我们这么重视?这是个危险的先例,此例一开,就会有连锁反映,最终会形成影响两国关系的重大问题。如果跟你们一样利用法庭,我们可以举出一百多年来中国被侵略、被奴役的历史,那不是什么都谈不成了?”最后,邓小平还对舒尔茨再次提出《与台湾关系法》问题,邓小平说:“我正式告诉阁下,美国法庭对中国没有用处。你们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对中国没有用处。《与台湾关系法》是中美关系中最大的问题,如不改变此法,中美关系恐怕很难有明显的、满意的发展。我们希望美国以实际行动证明我们能够做朋友,建立比较长期相互信任的关系。”^①

舒尔茨走后,邓小平在1983年3月30日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奥尼尔时,还非常不客气地批评美国外交政策的不连续,邓小平说:“随着美国政府的更迭,提出新的问题,就是存在着中美是否能建立

^①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47~248页。



一个相互信任的关系问题。从全球战略角度来说,中美有广泛的相似的地方,当然这不是说全部。我们两国都需要有一种政策的连续性。希望美国朋友充分理解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充分理解中国人民的感情。坦率地说,《与台湾关系法》还是杜勒斯主义的产物。美国人可能感到这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中国人的看法就不同了。在中国人看来,这不是在干涉中国的内政吗?美国的议会通过一个什么法来强加给中国人民,这是什么主义?”^①

邓小平在与尼克松、基辛格、施莱辛格等前共和党的政界要人谈话时,他强调的重点是要珍惜、维护和发展这种用十年时间建立起来的中美之间的全球战略关系。但是,与在任的舒尔茨国务卿及奥尼尔议长谈话时,就对美国政治制度和人事变迁对美国政策连贯性的影响表示遗憾,并强调里根政府上台后中美之间并未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因此,中美关系就很难有明显的、满意的发展。此外,邓小平希望美国把对中国的技术转让问题“放在适当的地位”,并把这一问题视作“从政治角度来衡量相互关系的标准”,显示出经贸关系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已日趋重要。邓小平对舒尔茨所言的两个问题——台湾问题和技术转让问题,美国方面的态度基本上是一硬一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已不准备作什么让步了,实际上,从“八一七”公报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始终没有再作出任何的让步。但是,在美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问题上,美国却是抱着一种比较积极的态度,在往后的几年,美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的限制确实是越来越宽松了,这大大有利于中美经贸及军事关系的健康发展。

舒尔茨访问中国结束时,对未来美中关系的框架发表了他的意见。他认为,美中两国今后关系的基础是两国间的直接接触和利益,

^①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 251 页。



即“不仅仅在苏联可能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问题上的利益,而是许多两国及国际上都关心的问题上的利益”。^①舒尔茨回国后不久在旧金山的一次演说中,还把中国贬低为一个地区性大国。

1983年8月27日,邓小平会见了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逊。在谈到中美关系问题时,邓小平就针对舒尔茨轻视中国的战略地位的观点指出:“从全球战略角度来看,美国究竟把中国摆在什么位置还没有搞清楚。美国决策人曾一度说,中国只能起地区性的作用,对全球无足轻重。我们对这样的判断并不在意,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把中国看成是了不起的力量,但是我们也不认为中国对国际安全和稳定是无足轻重的。美国要真正同中国改善关系,必须从全球战略来认识这个问题。如果始终抱着杜勒斯主义不放,把台湾当作美国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中美关系迟早要破裂。希望美国在决策的时候要考虑到这个战略利益,不仅是台湾问题,而且在处理其他问题上都要从战略角度来考虑。”邓小平还在这次谈话中重申:“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根本的问题。多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始终着眼于用和平方式。最近我出面谈了一篇和平统一的方案,实际还是过去的九条,内容是一致的,只是更具体、更明确一点。我们的底全部亮出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不要做损害中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事。现在美国继续售台武器,卖得那么多,这就是损害中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一种动作。美国作出的决定,实际上是不希望中国统一。现在大陆和台湾统一的条件是有的。中国统一了,对世界和平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至少太平洋会比较太平。”^②

1983年9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希思时,再一次提到中美关系可能要“破裂”的问题。邓小平说:“中美关系的主要问题是

^① 《人民日报》1983年2月5日。

^②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65页。



台湾问题。这里的根本问题不是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是《与台湾关系法》,只要这个东西存在,中美关系就不知在哪一天有破裂的危险。美国政府要修改这个法不容易,但美国总统有权选择对这个法执行到什么程度,如果像前一时期那样执行,两国关系就有破裂的危险。”^①

在 1983 年,中美关系还有一些可能会导致关系破裂的问题,其中邓小平和舒尔茨谈到的湖广铁路债券问题和胡娜问题就是当时的两个突出问题。

所谓的湖广铁路债券,是 1911 年清朝政府发行的。1979 年 11 月,一个代表债券持有者的集体诉讼被提了出来。该诉讼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被告,要求中国政府向原告支付债券的本息。1983 年 2 月初,美国亚拉巴马州地方法庭对中国进行缺席审判,裁定中国政府向原告支付 4130 万美元。此事邓小平亲自向舒尔茨表明了中国政府的强硬态度,使美国政府支持了中国政府的要求。同时,中国方面也富于策略地雇用了美国律师代表中国向美国法庭交涉,最后,到 1986 年 7 月 25 日,美国联邦上诉法院裁定,美国债权人无权迫使中国政府偿还 1911 年由清政府在美国发行的湖广铁路债券,并撤销了该项诉讼。

但是另一个问题,即所谓的胡娜问题,虽然经邓小平的出面要求,美国政府还是没有同意将这名中国网球运动员遣返中国,而是答应了让其在美国取得政治庇护。胡娜事件,是中美之间在人权上的第一次重要冲突。中国方面就此向美国提出异常强烈的抗议。并立刻停止了中美之间的其他文化交流活动。

中美之间的种种紧张关系一直持续到 1983 年的秋天。1983 年

^①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 266 页。



9月底,美国国防部长卡斯伯·温伯格访问中国,在温伯格访问中国期间,邓小平同意里根提出的在华盛顿举行首脑会谈的建议,中国总理也同意了在1984年1月访问美国。

此后,中美之间就台湾在亚洲开发银行的成员资格问题达成了协议。1983年3月,中国宣布准备申请加入亚洲开发银行,接着,台湾在亚洲开发银行中的名分和地位问题成了中美之间又一个发生争执的问题。12月初,中国同意了台湾仍然作为亚洲开发银行的成员,但是,台湾必须以“中国台湾”的名义参加,同时亚洲开发银行的总部也不悬挂“中华民国”的国旗。中国在台湾与亚洲开发银行问题上的这一开明立场,为中国对美国的访问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气氛。

1984年1月,中国总理对美国进行了访问。中方在美国访问期间,抱着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在谈话和声明中都没有公开提到美国售台武器和里根政府政策中其他有争议的问题。^①这次对美国的访问是成功的,使中美关系从不断的摩擦和冲突中变得和顺了。

1984年4月,美国总统里根来访,显示出中美关系的发展仍然是主流。但是,气氛仍然是不太亲密的。后来里根在其回忆录中也用着一种显然是不太友善的笔调来描述他的北京之行。在一番中国菜如何难吃的描写后,里根写道:“第一次的官方会谈是在我与中国总理之间进行的,这次会谈长达90分钟。会谈中我强调我们并非来寻求与中国结盟,并且我们赞同中国的不结盟立场。但是,作为朋友和太平洋地区的邻居,我们能够共同促进该地区的和平和稳定。”^②

1984年4月28日,邓小平会见了美国总统里根并进行了详细的

① 罗斯:《风云变幻的美中关系》,第297页。

② 里根:《里根自传》,第328页。



交谈,谈话时间长达1小时40分钟。在谈及台湾问题时,邓小平坦率地说:中美之间的主要障碍还是台湾问题,如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更明智的政策,中美之间的疙瘩一下子就能解开。邓小平诚恳地希望美国政府和里根总统认真考虑中国人民的感情。邓小平还用商量的口吻向里根总统提出,《与台湾关系法》一下子要国会取消有困难,但如何执行这个法,总统是有权的。关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邓小平说:“中国准备在不放弃主权原则的前提下,允许一个国家有两种制度。中国有两个问题:一是台湾问题,二是香港问题。香港问题可以说已经解决,办法也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中国收回香港主权,香港高度自治。台湾也一样,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台湾可以继续搞资本主义。这样既解决了中国的统一,又对台湾采取现实的政策。”关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作为,邓小平建议说:“在这方面美国有许多事情可做,并非无所作为,希望美国不要做使蒋经国翘尾巴的事情,这样海峡两岸可以从逐步增加接触到谈判和平统一。和平统一后,台湾制度不变,台湾人民的利益不会受到任何损害,台湾可以继续维持其对外关系,主要是对美国、日本的关系不变。我们相信这个办法行得通,更重要的是中美之间的疙瘩就解开了。如果美国按照杜勒斯的政策对待台湾问题,疙瘩就很难解开,不知哪一天台湾又成为爆炸性问题。这对两国都不利。美国应从南朝鲜、台湾、以色列、南非这四个‘航空母舰’的政策中走出来,更多考虑大多数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和愿望,否则美国将同世界上十几亿人口结成疙瘩,美国不可能在全球战略上取得主动。”^①

里根总统则表示,美国愿意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台湾问题是一个需要中国自己解决的问题。美国政府不认为美国应该卷入中国

^①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81~282页。



事务,美国也不认为应该为结识新朋友而抛弃老朋友。美国将尽一切努力促进中国人民自己和平地解决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之间的裂缝是个由中国人来解决的问题,只是美国想让它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而已。里根总统强调,他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深表乐观。^①4月30日,里根总统在上海复旦大学演讲时,还再次强调中美合作的重要性,并声明美国在对华政策上将采取现实主义立场。他表示:“只要我们通力合作,什么样的奇迹都能创造出来”、“我们已经作出了选择。我们将继续我们的新的旅程,但愿我们一帆风顺,永远生活在友谊和和平之中。”^②

里根总统的对华访问总的来说是成功的,它对中美关系在各个领域的推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84年12月19日,中国与英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签署。邓小平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出席了签字仪式。撒切尔夫人出席完签字仪式后将赴美国访问,邓小平请她向里根总统捎去口信:希望美国政府支持中国政府提出的通过“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构想。但是,里根总统对此没有作出积极回应。不久,美国政府出台了一个所谓的“三不主张”,即:美国将不会在北京和台北之间充当调停人;美国将不会对台湾施加任何压力,使之同北京建立接触或开始谈判,或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张;美国对中国统一问题不提出或支持任何特别方案,但是可能采取行动以确保台湾问题由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和平解决。这一“三不主张”出台后,基本上就成为了里根总统任期内美国政府处理台湾问题的基本框架。

鉴于此,邓小平对于中美之间的关系究竟能够走多远心中已经

① 《人民日报》1984年4月29日。

② 《人民日报》1984年5月1日。



有了底。不久,邓小平就公开宣布,中国已调整并改变了过去的“一条线”的战略。

1985年5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主席吴奈温时说:

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符合世界人民的愿望,也是我们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根据这一方针,解决国际间的问题,解决我们同国际间的问题,也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如香港问题、台湾问题。我们的对外政策有了一个调整。我们过去曾说过建立“一条线”的反霸统一战线,现在不搞那些,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国际上一切和平力量都是我们的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也不搞团体政治,不依附于任何集团。这一政策对于维护和平比较有利。

1985年9月14日,邓小平在会见奥地利总统基希施莱格的时候,进一步解释了这一调整:

毛主席当时提出的国际战略有当时的历史条件。那时苏联在各方面都占有优势,美国加上西欧都处于劣势。我们当时面临的形势是,从美苏力量对比来看,苏占优势,而且张牙舞爪,威胁中国。我们的判断是苏联处于进攻性态势,而且是全球性进攻,战争的危險主要来自苏联。为了避免战争,毛主席提出了建立从日本经欧洲到美国的“一条线”战略,以对付苏联的挑战。美国同中国的关系改善了,日本和欧洲同中国的关系也改善了。那时我们的判断也有缺陷,所以现在改变了。更大的原因是情况变了,如果现在发生战争,就不只是来自一家了。我们现在的判断是战争是可以避免的。所以,我们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

①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318页。

②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334页。



1985年10月13日~18日,美国副总统布什来华访问,再次向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转达了美国政府在处理中国和台湾问题上的“三不主张”政策。在10月15日的会谈中,邓小平向布什表示:“中美之间总的看来关系是正常的。中间曾经有过一些风波,通过协商,彼此取得一些谅解,问题得到一定的解决,但还没有完全解决。两国关系中主要的问题还是台湾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中美关系就可以在各个领域顺利地发展。”^①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接受了著名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的采访。华莱士是美国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曾经采访过世界上许多叱咤风云的政坛人物,以提问尖刻著称,在美国的传播媒介中的影响也很大,他自己说,连里根总统都差不多每周收看他的节目。在与华莱士的对话中,邓小平谈到了“三不主张”与杜勒斯主义、《与台湾关系法》、“三通”、台湾同大陆统一的必要性、两岸经济发展的比较等中美关系中的关键问题。

邓小平说:“中美关系也有个障碍,就是台湾问题,就是中国的海峡两岸统一的问题。美国有一种议论说,对中国的统一问题,即台湾问题,美国采取‘不介入’的态度。这个话不真实。因为美国历来是介入的。在50年代,麦克阿瑟、杜勒斯就把台湾看作是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所以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建交谈判中最重要的问题。”邓小平表示:“在卡特执政的后期,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这就变成了中美关系的一个很大的障碍。刚才我说,希望里根总统执政期间,能够使中美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就包括美国在中国统一问题上能有所作为。我相信,美国特别是里根总统,在这个问题上是能有所作为的。”他“可以鼓励、劝说台湾首先

^① 《伟人的足迹》,第313页。



跟我们搞‘三通’——通商、通航、通邮。通过这种接触,能增进海峡两岸的相互了解,为双方进一步商谈统一问题创造条件。”邓小平还在回答华莱士“台湾有什么必要同大陆统一”的问题时阐述了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邓小平说:“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其次,只要台湾不同大陆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别人拿去了。第三点理由是,我们采取‘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统一问题。大陆搞社会主义,台湾搞它的资本主义。这对台湾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不会改变,台湾人民没有损失。至于比较台湾和大陆的发展程度,这个问题要客观地看。差距是暂时的。拿大陆来说,我们建国三十七年来,有些失误,耽误了,但根据大陆的现行政策,发展速度不会慢,距离正在缩小。我相信大陆在若干年内至少不会低于台湾的发展速度。道理很简单,台湾资源很缺乏,大陆有丰富的资源。如果说台湾已发挥了自己的潜力,大陆的潜力还没有发挥,肯定会很快发挥出来的。而且就整体力量来说,现在大陆比台湾强得多。所以单就台湾国民平均收入比大陆现在高一些这一点来比较,是不全面的。”^①

邓小平与华莱士的谈话,把中美关系在这一时期的主要问题都点明了。邓小平认为,美国的所谓“三不”政策,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美国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对台湾的“介入”,杜勒斯主义的阴魂始终未散。邓小平是希望里根总统在执政期间,能够使中美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中国统一问题上能有所作为,邓小平希望美国政府做这样的“介入”。邓小平强调,大陆与台湾的统一是民族的感情问题,“一国两制”是最好的解决办法。邓小平还充满信心地认为,中国大陆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9~171页。



与台湾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是暂时的,长远来看,大陆的发展速度将高于台湾,而就整体力量来说,现在大陆就比台湾强得多了。

在 1986 年秋前后,中国的内政外交都处在一个比较顺利的时期。国内的改革开放进展顺利,政局稳定,国民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国际上,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日益友好,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也不断增强。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美中苏三角的关系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1986 年 7 月 28 日,上台有一年多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就苏联的亚洲政策和中苏关系发表了讲话。关于中苏关系,戈尔巴乔夫表示:苏联准备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同中国最认真地讨论关于创造睦邻气氛的补充措施问题、边界问题以及从蒙古和阿富汗撤军问题,苏联理解和尊重中国的现代化目标。^①邓小平在与华莱士的谈话中就表示了对戈尔巴乔夫提议的“谨慎的欢迎”。随后,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也逐步地走向了正常化。在此同时,中美关系虽然在台湾问题上仍有摩擦,但总体的关系还是得到了顺利发展的,在经济、文化、科学等各个方面都开始进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中国向美国出口了大量的纺织品和玩具,美国则向中国出口小麦、化肥、木材和飞机。美国到 1988 年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外来投资者,投资的领域遍布石油勘探、酒店和制造业等各个方面。在科学文化的交流方面,到 1988 年时,中国已有约三万六千名学者访问过美国,而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则占了中国历年出国留学人数的三分之二。

在里根总统时期,中美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僵持、斗争到逐步正常发展的过程。里根总统的“亲台”言行,使中美关系在 80 年代初面临着一个严峻的局面。而美国政府对台售武问题上的顽固立场,几乎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402 页,注释第 67 条。



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成果毁于一旦。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来维护中美关系的发展,使中美关系跨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险滩,终于使中美两国政府签定“八一七”公报,为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局面。随后,中美两国的经济交往日益顺畅,六年的顺利发展,为中美关系打造出了一个经受得起风浪考验的坚实基础。



第三章

阳光与风暴

在布什政府时期，中美关系经历了一次最严峻的考验。布什总统是历届美国总统中对中国了解最深切，感情也是最深厚的一位。在他上任之初，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是一片光明。但是，1989年在中国国内发生的政治风波，却一下子把中美关系推到破裂的悬崖。在中美关系的紧要时刻，邓小平和布什总统都能从大局出发，在事件过后尽量淡化矛盾，各自理顺自己内部的问题，使中美关系重新恢复并得到发展。

一、短暂的蜜月

1988年11月，在任的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当选为美国第41任总统。

布什总统是邓小平的老朋友，也十分重视与中国的战略关系。作为一个美国的政治家，布什总统对中国的战略观点也经历了一个转变和发展的过程。布什与中国打交道的第一件大事，是在布什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的时候。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以绝对多数的票数



驱逐台湾并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正式会员国。这是美国在联合国有史以来所遭到的最大的失败。布什后来回忆说：“坐在美国大使的座位上，对现场所发生的一切，我的感觉不仅仅是悲哀已极，简直可以说是厌恶之至。”布什认为：“这是联合国历史的转折点，是反西方国家（包括共产党国家）首次击败美国。美国的威望摇摇欲坠。”但是，布什也知道，“职业外交官的标志是决不让个人感情来影响其对工作的看法。”“无论我个人对驱逐台湾持有何种情感，从长远的观点看，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和与之进行外交接触都是显而易见的明智之举。”^①三年后，福特接替尼克松担任美国总统时，原本打算让时任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布什出任美国驻英国或法国的大使，但布什却主动提出要去接替即将卸任的戴维·布鲁斯出任驻华联络处主任。布什认为：“尽管能在伦敦或巴黎担任一个令人垂涎的要职会对个人经历大有裨益，但去北京确是一个挑战，这是通向未知之地的旅程。一个新中国正在出现。美国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在未来的岁月中将是至关重要的。无论对美国的亚洲政策还是全球政策都是如此。”^②布什在北京任职期间，对中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布什夫妇一起学中文、逛商店、到各地游历，还买了两辆“飞鸽”牌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转，并以“像中国人一样骑自行车的两口子”而闻名。在与邓小平的多次接触中，布什还和邓小平成了朋友。布什在与邓小平的接触中，已感到邓小平会在未来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出演重要的角色。在布什要离开驻华联络处主任的职位，准备回国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邓小平还设私人午宴为其饯行。邓小平向布什保证说，布什在中国将是永远受欢迎的，“甚至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邓小平的这些真诚而富有远见的友善行为，给布什留下了深刻的印

① 乔治·布什著，郭争平等译：《布什自传》，中外文化出版社，1988年版，第104页。

② 布什：《布什自传》，第116页。



象。^①后来,布什在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和美国副总统期间,都十分重视与中国的关系。在与里根结成竞选伙伴后,布什也毫不忌讳他与里根在中国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布什是这样正式地公开他关于美中关系看法的:“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对于中国自身也是重要的。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美苏关系中一张‘牌’。对于台湾问题只能和平解决。当然,现在那一地区的局势已不像过去那些年中那么紧张。从长远看,有充分的理由表明,应该在未来的年月里大力发展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从战略上、文化上及经济等各方面看,这对于两国都是重要的。”^②对于里根政府前期黑格国务卿的对华政策,身为副总统的布什是起到积极的支持作用的。每当中美关系出现危机时,又往往都是由布什亲往北京进行斡旋。在里根政府期间中美关系能得到稳定的发展,布什作为副总统起了很大的作用。

1988年11月,布什以四比一的大比数战胜了民主党候选人杜卡斯而赢得了总统选举。12月22日,时任总统的布什一家应邀到中国驻美国大使韩叙的官邸庆祝圣诞,这一十分友好的活动无疑使华盛顿的外交界人士感到,中美关系在布什总统任期将会有良好的发展。

1989年1月7日,日本天皇裕仁逝世,葬礼定在2月24日。布什总统决定参加葬礼。对此,布什总统的亲密盟友、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在其与布什总统合写的回忆录中写道:

在总统换届期间,我们是认真考虑过在新一届政府开始的头几周内访华的可能性。尤其是在戈尔巴乔夫宣布访华以后,我们非常想在戈尔巴乔夫与中国领导人会谈以前就同他们见面,以回顾并巩固中美关系。然而我们始终没有办法证明在总统任期头一年的头一个季度访华的合理性,尽管这种会面将非常重

① 布什:《布什自传》,第137页。

② 布什:《布什自传》,第226页。



要,我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就在这时,1989年1月7日,日本天皇裕仁逝世,这纯系外交上的缘故,提供了我们需要的通道。葬礼定在2月24日。

对于日本人而言,总统的出席是件十分重大的事情。总统不顾那些针对天皇在二战中的角色提出的反对意见所作出的这一决定,也促成了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参加。这一旅行额外的收获就是给我们提供了在北京停留的机会以商讨战略问题,而这正好走在了戈尔巴乔夫的前面。若把此行当作是一次完整的国事访问,那时间是太短了,而且还需要全部的准备程序和外交礼节,所以我们迅速地安排了一次“工作访问”,与最高级别的领导层会谈,包括邓小平、李鹏……这次旅行使得布什总统成为美国总统中在访问欧洲之前访问亚洲的第一人——这是在新的时代什么是我们优先考虑的问题的一个征兆。

1989年2月,布什总统宣誓就职后不久,就借参加日本天皇的葬礼之机“顺道”访问中国。布什总统在2月25日-26日对中国的两天工作访问中,与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谈。2月26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布什总统。关于这次谈话的内容,《邓小平文选》《伟人的足迹》和《邓小平思想年谱》均有一些收录,布什总统在其回忆录中也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首先,在正式会谈前,有五分钟的时间让记者照相,在这段时间里,布什总统和邓小平之间的非正式谈话就让人感到他们之间的“朋友”之情。

邓小平:我衷心地欢迎你。

布什总统:你非常健康。

① George Bush and Brent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New York: Knopf, 1998, p91.



邓小平：你相当辛苦啊。

布什总统：我们长途跋涉，但是不感到疲劳。

邓小平：你是一名运动员，所以身体好得很。

布什总统：我每天都想骑自行车活动活动。

邓小平：是啊，你这个喜好好得很。我们还有个同好，就是打桥牌，我们可以当个搭档。即使我们在桥牌上是对手，也是好朋友。

布什总统：我很久以前就放弃打桥牌了，因为太难，太复杂了。

邓小平：现在你打桥牌就更困难了。我知道美国总统不好当。每天的事情多得很，恐怕是世界上最忙的冠军。

布什总统：是比较忙，但是非常有意思。这次访问中国虽然时间很短，但是进行得很好。刚才同李鹏总理进行了会谈，非常有益。

邓小平：工作访问，礼仪方面就从简了。希望以后适当的时候，你认为适当的时候，到中国正式访问。

布什总统：非常感谢您对我提出这个邀请。下次来，我一定找机会到外地走走。

邓小平：但是我认为你这次工作访问，虽然只有两天，比正式访问还重要。

经过这一番十分友好的寒暄后，双方开始正式会谈。布什总统在其回忆录中对这次他认为是极其重要的谈话有一个详细的记录。布什总统在书中写道：

在我们 1989 年的会面中，邓小平最想谈的是中苏关系问

① 魏赤娅：《我在采访中见到的邓小平同志》，载《大地》杂志，1997 年第 6 期。



题。他同样向我保证了戈尔巴乔夫的访问决不意味着中苏会重新结成过去的那种反美联盟。“迄今为止,我还不知道他能带来多少好处,”他边说边摇着头,“我甚至也不知道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会发生些什么事。”邓小平使我想起了我过去对中国怀着极大兴趣的那些时光。邓小平说我的访问是未来良好前景的预兆。我们可能不会在每件事上观点都一致,但他希望美中能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他承认,不可能是战略合作关系,但可以彼此信任以使我们之间的问题最小化。邓小平然后非常吸引人地表述了他对中苏关系的个人观点。他的思想有种罕见的洞察力,我很高兴他愿意和我们分享这些观点并希望美国理解他的意图。

“中国,也像美国一样,正在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他开始说道,然而,正如有大量的问题横在美苏之间,北京和莫斯科之间也同样如此。“事实上,中苏于1963年断绝了往来,”他提醒我,“从那以后整整25年过去了。中美是在1949年断交,在1972年恢复的……那是16年前了。我们还在不断取得进展……”如果他和戈尔巴乔夫的会谈十分成功,苏中关系正常化了,那么接下来会怎样?“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那还是个未知数。”他自问自答。“实际情况是,有许多累积起来的问题。此外,这些问题都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中国人非常看重历史。在中国方面,这个问题是中国蒙受了外国干涉其内部事物的屈辱和侵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这已经有150年了。在这一个半世纪当中,外国列强使中国人民承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总体看来,其中两个国家造成的损害最大。首先是日本,另一个就是沙皇俄国和苏联。如果说谁从这些战争中获得的实际利益最大,那是沙俄和苏联;日本造成的祸害最大。千百万人在战争中丧生,造成的经济损失难以计数。然而,日本最终没有得到一寸中国的领土。中日之间的领土问



题就只有钓鱼岛……我们打算先把这一问题搁置一段时间。

“沙俄和苏联的情况就不同，”他继续说到，“苏联在二战后获得的中国的领土超过3百万平方公里……这也是二战末期苏联、英国、美国打算瓜分中国的雅尔塔会议的结果……这主要是美国和苏联之间的问题。然而，因为蒋介石在中国打败了，美国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我只是从历史的角度谈问题，决没有冒犯你的意思。”

“你并没有冒犯我，”我说，“我也不喜欢雅尔塔协定。回过头来看，雅尔塔协定并不合适。它许诺给东欧自由选举权，可事实上没兑现。”

“雅尔塔协定不仅造成了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还使得中国东北地区划入了苏联的版图，”邓小平继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向苏联提出的头一项要求就是恢复中国对长春铁路和旅顺港的主权。直到那时中国在东北的主权才确定下来……我们也提出了外蒙古的问题，但苏联没有答复。

“目前，苏联有一种反斯大林的运动。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斯大林为中国做过一些好事。他帮助过我们发展经济。比如说，156项工业项目。苏联专家也确实想帮助我们。然而，赫鲁晓夫上台以后，一夜之间废止了几百项中苏协定。此外，赫鲁晓夫的策略，除了对抗美国等一些国家以外，还想把中国包围起来。在西部和东部，沿着整个中苏边界，苏联驻扎了一百万军队、部署的核导弹差不多占它的三分之一。

“总统先生，你是我的朋友，我希望你看一眼地图，你就会发现苏联把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以后的后果是什么，我们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战略势态之下？50多年前中国领土的形状像一片枫叶。现在你再看地图，北方领土的一大块给割走了……我提到



的这种战略势态对中国十分不利……这种包围从赫鲁晓夫开始,经过勃列日涅夫一直延续至今。

“在中国北方和西方的边境线上苏联部署了大量的军队和导弹。印度也参与进来,然后又是越南。现在苏联把他们的空军转移到北朝鲜,因为北朝鲜允许他们和金兰湾联系。他们的飞机现在可以在中国上空进行空中搜索。中国怎么能察觉不出苏联的巨大威胁呢?那正是我们提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原因。过去制造的各种各样的障碍都要排除,包围对中国构成的威胁必须排除。

“由于上述原因,在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时期中国注意发展同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关系无疑是正确的。我曾说过这一切表明中国是从自身利益考虑做出的战略决策。这不是和对方打什么牌的问题,也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我曾对历史上的这一阶段做出解释,要让人民清楚地认识到外交政策和发展经济是两回事。最近几年,中国对年轻一代的教育没有做好。他们没能理解这一点。我们开始注意这一问题,但很难立竿见影。

“刚才我说我们不清楚戈尔巴乔夫来北京后会怎样。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苏联能否解除对中国包围的这一方面。阿富汗和柬埔寨是重中之重,我们和阿富汗边界接壤,虽然很短。另一个问题就是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基础是什么?由于这样一段历史渊源,会不会有人说中国和苏联会重修旧好,就像他们在50年代那样?不,这不可能……”

邓小平对中苏关系的这一推心置腹的定性分析,对于布什总统来说,完全是耳目一新的,由此谈话中,布什总统知道了中国人最痛

① George Bush and Brent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94 ~ 96.



恨的原来是日本人和俄国人。在中国近代史上,对中国损害最大的是日本人,从中国掠走利益最多的则是俄国人,而且苏联把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对中国的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这一地缘政治因素,就使中国和苏联决不会像 50 年代那样“友好”。而为了解除苏联对中国的巨大威胁,正是中国提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原因。至于在雅尔塔会议上美国与苏联、英国打算瓜分中国的这笔历史老账,邓小平也没有追究的意思。邓小平的这一系列现实主义的态度,也使布什总统对即将到来的中苏关系正常化放了心。布什总统当即表示:这个一小时,对我和在座的美国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来说,了解这一背景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我们将就苏联问题作出重大决定。我们可以向您作出保证,我们所作的任何决定,不管是有关战略武器、常规武器或其他任何问题的决定,都不会只对西方有利,而损害中国利益。^①

邓小平与布什总统的会谈结束后,邓小平随即设午宴为布什总统送行。在午宴上,宾主交谈甚欢,邓小平在席间还就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的条件:改革开放和政治稳定、对毛泽东的评价、“文化大革命”的反思等等题目与布什总统进行交谈。在 1989 年的春天,中美两国领袖就是在这种坦诚友好的气氛中握手道别的。

二、1989 年政治风波的影响

在 1989 年春夏之交,中国国内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这场政治风波引发了中国政府与西方世界的极大冲突,中美关系也一下子跌到了冰窖。

对于在 1989 年春夏之交中国国内发生的这一场政治风波,以及

^① George Bush and Brent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96.



中国政府迅速的平息举动,邓小平后来(1990年7月11日)在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谈话中作了这样的解释:

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只要历史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够了,别国的社会制度如何我们管不了。东欧事件发生后,我跟美国人说,不要高兴得太早,问题还复杂得很。现在东欧的问题尚未解决,再捅别的乱子干不得!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动乱,那将是个什么局面?现在要是中国乱起来,就决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问题。那时还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现在就不同了,如果再乱,乱到党不起作用了,国家权力不起作用了,这一派抓一部分军队,那一带抓一部分军队,就是个内战的局面。一些所谓民主斗士只要一拿到权力,他们之间就会打起来。一打内战就是血流成河,还谈何“人权”?一打内战就是各霸一方,生产衰落,交通中断,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响的是现在世界上最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所以,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外国的负责任的政治家们也会懂得,不能让中国乱。什么人权、民权问题,都管不住这个问题。唯一的出路,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相互合作,而不是干涉别国内政、挑起别国内乱。中国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为了引起大家警惕,是为了提醒各国决定对华政策时要谨慎。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0~361页。



邓小平深知中国国情,对中国人的性格特征也有深刻了解。邓小平确认,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中国需要的不是资本主义国家所通行的那种“民主”和“自由”,中国需要的是安定,中国是“稳定压倒一切”。从邓小平偏好新加坡经验以及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私谊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邓小平感觉到,在经济上要起飞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允许在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方式上采取“自由主义”,但是在政治上不宜采用“自由主义”。而且一定要以社会安定为前提,有时甚至可以采取集权手段,如同新加坡和韩国的发展模式一样。邓小平还从毛主席、周总理去世后的实际情况出发,感到这时的中国一乱,就不是一般的乱,就可能会出现像民国初年那样的军阀割据,“各霸一方”,大打内战,“血流成河”。邓小平还以一个世界政治家的负责态度说,中国内战所造成的“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响的是现在世界上最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所以,中国不要西方的“民主”和“自由”,甚至不惜用武力来维持社会的安定,就是不能把自己搞乱。邓小平认为:“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

但是,美国舆论的引导者们却绝对没有邓小平这样的认识水平,或者,他们也绝对不会从邓小平的角度来看待和体验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在政治上的别有用心者,那就更不用说了。事有凑巧的是,为了采访戈尔巴乔夫到北京的访问,美国所有大的传播媒介都云集北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伯纳萧在其报道中说:“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大老远跑来报道中苏高峰会,没有想到一头栽进革命的旋涡。”^①结果是,从4月15日到6月5日在北京所发生的事情,都

① Patrick Tyler, A Great Wall: Six Presidents and China,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p429.



被美国的传媒有选择、有侧重、有目的地直接传送到美国人的电视机前。正如哈里·哈定所说：“新闻记者倾向于把反政府的示威者理想化，说他们是要把美国的政治制度搬到中国来。事实上，许多抗议者的动机是既有政治也有经济考虑，相对来说，只有少数人要求建立多元化的政治制度。但是在美国报纸上几乎普遍地把示威描绘成是赞成民主的运动。……美国记者知道了而不可宽恕地故意视而不见。抗议活动几乎一直是被说成是非暴力的，然而当中国军队在6月4日向天安门广场进发时，有些示威者却诉诸暴力。学生领袖要求一个更加开放和民主的政府，然而他们的运动常常具有派性和等级制度的特色，而且他们是带着相当轻视的眼光看待工人参加抗议活动的可能性的。也许更为引人注意的是有一些学生领袖违反了他们自己的绝食行动——这一事实是美国新闻媒介的一些人所知道的，但是没有报道……。最后，美国的关于6月3日~4日夜间的报道常常是夸大的。关于死亡、受伤及逮捕人数的报道也是夸大的。……中国军队内部深刻分裂、内战迫在眉睫和图谋暗杀中国领导人等虽然经证实是不正确的谣言，常常被作为事实来报道。”^①

于是，在美国传媒的引导下，美国的公众舆论普遍认为，中国政府的行动是一个独裁政府对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的最残暴的践踏。据哈里·哈定的统计：

1989年上半年，美国三大商业电视网广播了近600篇有关中国的报道，而1988年全年不到50篇。报道的高潮时，即4月中旬到6月中，三大电视网晚间新闻节目有近四分之一篇幅是播送有关中国的内容，中国的报道是50%以上无线电广播节目的主要新闻。……观看电视网晚间新闻的观众人数在6月5日~

^① 哈里·哈定：《脆弱的关系》，第323~324页。



9日期间,平均增加了14%。随后的民意测验显示四分之三以上的美国人说他们是密切或非常密切地注视事件发展的。……1989年2月抗议活动开始以前,将近四分之三的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是大部分赞成或很赞成。这是中美关系正常化和7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政治改革逐渐改善美国人对中国印象的结果。但是政治风波急剧地改变了这10年来逐渐发生的变化。7月进行的民意测验报告说,只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仍然持有利于中国的印象,而现在有58%的人对中国印象不佳。……现在,把中国视为美国朋友或盟友的百分比在1989年7月下降到16%,与美国人对苏联的看法大致相同。相反的是,把北京当作不友好国家或敌人的人数比率从1988年5月的19%上升到39%,比克林姆林宫只低9个百分点。

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中,政府行为除了会受舆论的影响外,还会受到各种团体压力的制约。在政治风波发生后,美国的“人权观察”组织就立即向总统发出一封公开信,敦促他对中国实施全面的制裁,包括召回美国大使、取消北京的最惠国地位、暂停贸易发展计划和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的商业奖励、终止所有的武器出售、禁止对中国进一步的技术转让以及反对国际间对中国的借贷等等。^②

在这些舆论的引导和那些非政府组织的压力下,美国政府和国会对中国的国内事态采取了积极干预的姿态,并在西方世界中带头制裁中国。而中国政府也对美国的制裁迅速作出强烈的反应。在1989年的六七月间,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处于“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严重危机之中。

1989年6月5日,布什总统举行记者招待会,谴责中国政府平息

① 哈里·哈定:《脆弱的关系》,第322~326页。

② 哈里·哈定:《脆弱的关系》,第310页。



暴乱的行动是“违反人权的暴力镇压”。在会上,布什总统宣布了美国政府针对中国的几项制裁措施,主要有:停止美国官方和民间向中国的武器出口;暂时停止美国与中国军事领导人之间的人员交流;对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关于延长在美滞留时间的要求予以同情的考虑;通过红十字会对受伤人员提供人道主义的医疗援助;在中国的事态不断揭开的同时重新研究美中关系的其他问题。记者招待会后,布什总统还在白宫接见了在华盛顿地区留学的四名中国学生,以表示对中国学生运动的支持和慰问。按照布什总统的制裁要求,美国国防部很快就通知美国的格鲁曼公司,要其立即中止同中国的改良 55 架歼—8 战斗机的价值 5 亿美元的合同;商务部则取消了向中国出口价值 5 亿美元的核电厂的许可证。^①

1989 年 6 月 6 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以 406 对 0 票和 100 对 0 票通过了谴责中国政府的决议。众议院的第 136 号决议表示支持总统宣布的制裁行动。参议院的第 142 号决议则在“支持总统采取行动”的同时,还提出了“美国及其主要盟国是否对中国采取集体军事制裁”的议题。^②

1989 年 6 月 7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针对美国政府和国会的制裁行动指出:美国政府对纯属中国内政的事务横加干涉,并单方面采取损害两国关系的行动,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这是中国政府所绝对不能接受的。希望美国方面能从中美关系的大局和两国的长远利益出发,不要做任何损害两国关系的事情。^③

1989 年 6 月 8 日,美国驻华使馆接受了方励之夫妇在其使馆内进行“政治避难”的要求,从而引发了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的外

① 哈里·哈定:《脆弱的关系》,第 303~304 页。

② 哈里·哈定:《脆弱的关系》,第 309~315 页。

③ 《人民日报》1989 年 6 月 8 日。



交冲突。当天,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朱启桢紧急约见美国驻中国大使李洁明,对美国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朱启桢表示,美国的决定是无视中国法律的行为,是对中国内政的严重干涉。中国政府对此表示极大的愤慨并提出严重的抗议。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并讲了话。邓小平在这次讲话中,谴责了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干涉。一开始,邓小平就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在讲话中,邓小平还指出:“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确。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邓小平在这里所说“国际的大气候”,就是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在讲话中,邓小平还对美国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批评:“在政治制度改革方面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实际上,西方国家也并不都是实行三权鼎立式的制度。美国骂我们镇压学生,他们处理国内学潮和骚乱,还不是出动了警察和军队,还不是抓人、流血?他们是镇压学生和人民,而我们则是平息反革命暴乱。他们有什么资格批评我们。”^①

1989年6月20日,布什政府宣布了对中国的第二批制裁措施。包括有:美国请求国际财政机构推迟向中国提供所有的进一步的借款;白宫暂时中止助理国务卿级别以上官员同中国的全部交往。取消商务部长罗伯特·莫斯巴赫尔和财政部长尼古拉斯·布雷迪已经商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02~308页。



定的于当年年底的访华。后来透露,当时美国政府还对中国实施了其他的制裁而未曾公开宣布,包括有:暂时中止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的投资担保和贸易发展计划规定下的资金筹措;暂停颁发准备由中国的火箭推进器发射美国卫星的出口许可证以及暂停执行同中国签定的1985年核合作协定。^①

布什政府还积极鼓励它的西方盟国跟它一道行动。在6月末举行的一次最高级会议上,欧洲共同体宣布推迟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暂时停止同中国高级官员的接触,并宣布反对向中国提供进一步的多边借款。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国还中止了军事方面的接触,停止武器出售以及向不愿回家的中国国民提供避难。在美国的操控下,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也停止了向中国提供新的借款。^②

1989年6月29日和7月14日,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先后通过了关于制裁中国的修正案。这个修正案在众议院是以418:0票通过,在参议院是以81:10票通过。修正案把大部分白宫早先在6月份已经宣布的制裁措施整理成法律,这些措施包括:暂时停止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的投资担保和贸易发展计划,暂停颁发军火出口许可证和卫星出口许可证,暂停放宽出口控制以及中止执行核合作协定。它还赞同美国反对国际财政机构向中国提供进一步借款。此外,法案在那些已经由总统下令实施的制裁以外又加上了几项措施:要求暂停发放警察装备的出口许可证,并建议进出口银行的任何进一步向中国的贷款都将延期。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法案没有要求在这个时候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因为取消一国的最惠国待遇需要一些相关的委员会分别举行额外听证会,而增加听证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甚至会引起与中国有重大利益关系人士的严重反对而搁浅。

^① 哈里·哈定:《脆弱的关系》,第304页。

^② 哈里·哈定:《脆弱的关系》,第305页。



这一修正案还要求：在取消任何这些规定的制裁之前，总统必须证明中国“在政治改革计划方面取得了进展”，或者证明美国的国家利益需要放宽制裁。国会还规定了“政治改革计划”的含义包括取消戒严令、停止处决和对参加非暴力示威者的其他报复、释放政治犯、增加对人权的尊重、停止干扰“美国之音”的广播，以及扩大外国记者的采访机会。而且政治改革应该在“包括西藏在内的全国”同时进行。此外，如果中国的镇压继续加深的话，该立法会“建议”总统实施进一步制裁，诸如收紧出口控制、结束中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观察员地位、反对中国成为关贸总协定的正式成员、撤销最惠国待遇和其他双边贸易协定以及终止中美关于核合作和卫星发射协定等。

这项立法一出笼，就受到了美国的各种人权组织、报界的大部分以及一些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和学者组织的支持。在国会领袖修改了议案，赋予总统根据他自己对国家利益的评估在是否取消制裁问题上有很大的回旋余地时，美国政府最终同意了这项立法。^①

1989年7月16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发表政治声明谴责中国。之后，整个西方社会对中国实施全面的所谓“制裁”。美国等西方国家与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科学等各个方面的合作和交流都全面停止了。中美关系也处于自1972年以来的最危急的关头。

在指示美国政府对华采取制裁行动的同时，布什总统还是能够保持一个现实主义政治家的冷静，没有盲从舆论界和国会的压力。他希望对中国的制裁能够有一个“度”，使之能把事态处于可以“控制之中”。在其回忆录中，布什总统就认为：

^① 哈里·哈定：《脆弱的关系》，第312～315页。



天安门事件很大程度上打消了中国在西方赢得的好感。对许多人来说,改革不过是种假象,中国还一如既往地是个独裁国家。我不这样看。基于我14年来对中国的了解,我认为中国在缓慢地发生变化,已经完成的改革的推力仍然十分强大。在强硬派再次坚持维护自己的权利之前我们已从为期6周的天安门事件中见到了一些端倪。我的问题是如何指责我们所见所闻的事件是错误的,并采取适当的行动;同时又要保持同中国打交道,即使这种关系目前必须在“控制之中”。我知道在美国激愤的情绪在滋长。在先前的那些日子里,当中国政府开始跟踪示威的学生领袖的时候,很可能更强烈的举动的压力已经在增长了。

布什总统还努力化解国会要求政府与中国断交的压力,他对此事回忆道:

我早上八点和尼克松谈了一下,他说,“别破坏这种关系。已经发生的事处理得很糟,令人难过,但把目光放远点。”我告诉他我想召回大使李洁明,他认为那样做很好。他认为我们不应停止贸易,只应象征性地做点文章,但必须保持长久的友好关系……。而且在我们指责他们的暴行和滥用权利时我们也要试图保持这种关系……。来自中国的报道仍然是疯狂的,有谣传说“李鹏被击毙了”,还说“邓小平死了”。这一切都在提醒我要小心谨慎,要保持冷静。

斯考克罗夫特作证道:

总统不愿我们的回应都是否定的。他想和中国领导人交谈,一方面为了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不切断与中国的联系,另一方面

① George Bush and Brent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97 ~ 98.

② George Bush and Brent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98.



也试图向他们解释在全世界的眼中他们的行为是一种暴行。我十分赞同，也觉得我们对中国的局势花费精力过多却不能一举击中要害。经过一番讨论之后，他决定打电话给邓小平，我们从未如此行事，直接给中国高层领导人打电话是个不寻常的举动。但他的电话没能打通。

在电话没有打通的情况下，布什总统亲自起草了一封给邓小平的信。^②研究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怎样经历暴风雨式的折腾而坚韧不倒，布什总统这封信所反映出的主流政治家对华政策的思想可以供我们参考。这封信有几个要点：

首先，布什总统相信：“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良好关系是建立在双方的基本利益之上”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和政策的立足点。

其次，布什总统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大国，已经摆脱了封闭，实行改革开放，而且中国因为对苏联“包围”的担忧，以及要致力于维持中国的向前发展而有必要保持同西方的良好关系。

第三，布什总统表示，要尊重美中“两国社会和两种制度的不同”。因此，布什总统语气委婉地对邓小平表示：“我非常艰难地试图不让自己涉入中国的内部事务之中。还非常艰难地试图不让自己看起来以任何方式对中国应如何解决自己内部的危机指手画脚。”布什总统这里所说的“非常艰难”，就是想要邓小平理解他作为美国总统所受到的压力和制约。

第四，布什总统表示，美国的建国原则是民主和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免除受一切专断权威统治的自由。“正是对这些原则的尊敬不可避免地影响了美国人对别国事务的观点和反应。这并不是

① George Bush and Brent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99.

② 参看附录一(6)及 George Bush and Brent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100 ~ 102.



一种傲慢的反应或强迫别人接受我们的信念这样一种欲望，而是对那些原则的永恒的价值和他们普遍的适应性的单纯信念。”在这里，布什总统如同其他的美国政治家一样，把美国以民主和自由为旗号干涉别国内政的行为，装饰得正义、纯洁而庄严。

第五，虽然在美国“要求更强烈的反应的呼声还很高”，但是布什总统“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布什在信中写道：“因为我清楚，我不想见到你我辛苦地营造起来的中美关系一朝破裂。我对美国人民解释说我不想把经济制裁不公正地施加在中国人民的头上。”

第六，对方励之问题，布什总统提出了一个“不动声色地驱逐他以使他离境”的解决办法。

最后，布什总统建议派一名特使到中国见邓小平，布什在信中写道：“他将全权代表我最真挚的信念和您开诚布公地商谈”中美关系的问题。

邓小平看到布什总统的这封信后，很快就给予了答复，同意美国政府派遣特使前来中国。这样，中美关系在严重对抗和危机之中，两国的最高层却还能保持直接的联系，这是中美关系能够在经历两三年危机后又能重新走向正常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1989年6月30日至7月4日，美国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与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秘密访华。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与二人就中美关系的现状和前景交换了意见，邓小平并向其表达了中国国内政治稳定的必要性和中国决不会向西方的制裁妥协的坚定立场。邓小平指出：“现在中美关系确实处在一个很微妙、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危险的地步。中国没有触犯美国，任何一个小问题都没有触犯。问题出在美国，美国在很大范围内直接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我要明确告诉阁下，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中国的内政要由中国来管，什么灾难到来，中国都可以承



受,决不会让步。中国领导人不会轻率采取和发表处理两国关系的行动和言论,现在不会,今后也不会,但在捍卫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国家尊严方面也决不含糊。”^①

关于这次会见,后来斯考克罗夫特在其回忆录中有一个详细的记载:

邓小平以一大段谈话开始了我们的会见。“我选择布什总统做朋友的原因,是由于自我们开始交往以来,我发现他的话相当可信,”他说到,“他很少讲空话或者言不由衷。这也就是在你们大选之前我就表示希望他能当选总统的原因……不过,他并不总是那么幸运,因为他就任以后不久……中国就发生了动乱。这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很不幸美国也深深牵涉其中……自从两个多月以前在这些事件发生以后我们一直感到美国外交政策的各个方面都使中国陷入困境。这就是我们这边的感受。……因为这场暴乱的目的是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他们的目的得逞了,那么这世界就完全是另一副模样了。坦率地说,这甚至可能引发战争。”

他谈到大多数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议论都属谣传,夸大了死亡人数。他警告说,如果一个国家以这样的谣传为基础来制定政策,那么政府将蒙受很大损失。他说,国会就是以这些谣言为基础采取行动的。“的确,中美关系处于一种很脆弱的境地,你甚至可以说是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这种行动将导致中美关系的破裂。”他承认总统派遣我们来华是一个明智而冷静的举动。“看来保持我们原来的关系还有希望,”他补充道,“我相信那是布什总统的希望,也是我的希望。然而,这种性质的问题不可能单凭两

^①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33页。



个人从朋友的角度就能加以解决。”

我们两国间的差异的起因不是因为中国侵犯或影响了美国的利益，他说到，而是美国采取的行动很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利益，也损害了中国人的尊严。“至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中国有句谚语——‘解铃还需系铃人’。我们希望美国未来的行动步骤会寻求一些解铃的工作。”这取决于美国不再火上加油。他还说到北京还没有停止镇压那些反革命活动的领导人。“中国会允许依照中国法律审判那些叛乱的鼓动者和幕后操纵者。中国对这种反革命活动的立场决不会动摇。不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何以继续存在？”他告诉我他们决不允许外人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不管会有什么后果。他还说他本无意讨论这些事，但既然我来了，他也愿意见见我。“刚才我向你讲述了我个人对此事的看法，我希望你能把我的看法传达给我的朋友，布什总统。请把下面这些话转达给他……无论我们两国政府之间关于此事将发生多么大的争论，只要他还愿意把我当作朋友，我也愿意把他当作朋友。”他把以后如何讨论的决定权留给了李鹏总理。

我提醒邓，我们两国自上海公报以来已经取得的进展。“我们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视角……”我说，“我们两国的关系出现了许多起伏，但从总体上，是在不断深化。这不仅是因为这是对双方共同利益的回应，还因为我们尊重我们两个社会间的差异。”双方都从这种关系中获得利益，比如从对苏联的战略问题上、从我们的关系对整个世界局势的稳定上。同样地，我们也获得了经济利益，我们的双边贸易从一无所有到每年超过100亿美元。“最后还应注意美国人民非常支持我们两国关系取得的进展。”我说，“随着那些联系的发展，我们对中国人民、对中国政府为鼓励经济改革所做出的努力的钦佩之情也与日俱增……”



而这种正在深化的合作、日益增长的同情构成的双边关系，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发生对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继续说道，“美国对他们所见到的示威活动所持的观点——或对或错——是他们价值观的表现，代表他们最可贵的信念，这信念从美国革命开始就扎根于他们心中……我们，也像你们一样，深深地坚持着我们自己为独立而战的信条。我们国家的全部经历，从我们的革命开始，就是一场扩充自由的领地之战，而自由的定义由我们界定。我们的革命的目的是建立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从一切独裁统治下解脱的自由。这些信念代表了美国的传统和文化。很自然美国人民看到其他地方这些价值观念的增长必然会充满感情地回应。

“中国政府决定如何处治那些卷入中国近期事件的市民，诚如您所刻意强调的，是彻头彻尾的中国内政，”我说，“然而，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如何看待此次运动，同样地，是美国人民的内部事务……很明显，中国对近期纯系关于中国内政问题的解决行动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反响，这些反响也反映了我们自己的信念和传统。因此这些行动也产生了对于我们国内的影响，这是实实在在的，而我国总统必须处理好。这是目前布什总统面临的问题的关键。

“总统和美国人民一样，对中国这些事件怀有相同的情感，但他同时深信我们两国可以保持以往的关系。他希望这些事件可以通过一种能够确保两国关系长期健康发展的方式得以解决。这并非易事。迄今为止，这并非未付出代价的，而且，根据事态的发展，很可能对他来说变得不可能。中国政府对示威者采取的行动直接影响美国人民和美国国会要求采取我们自己的步骤表明我们对这些行动并不赞成。

“布什总统采取相应的步骤，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是必



要的和合适的。您对他的这些行动提出了抗议,而国会和大多数美国媒体攻击他的行动不够有力。”三天前,众议院投票决定对中国施加更严厉的制裁,结果以 418 对 0 票通过。“总统会继续反对这种法案,但投票的数量说明了他必须解决的政治现实,面对这种一致通过就连他的否决权也无能为力。

“总统对此很敏感,即中国人对他为能控制美国国内事件所必须采取的行动表示的关注,但对于控制这类事件他也不是全知全能的。不容置疑,如果中国领导人也对这样的事实试图保持相似的敏感,即你们的行动以及你们的行动方式,将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对你们的看法产生重要影响,这些你们在以后的几天和几周之内即将经历,那么总统对局势的控制能力才可能有所增强。”最后我总结说我并没有带来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我只是来阐明我们的观点。

邓说他希望美国和他的人民能够理解一点。“我认为一个人必须理解历史;我们战斗了二十二年,以二千万生命为代价最终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其标志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场战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如果再加上三年抗美援朝,那总共就是二十五年的奋斗。其次一点就是人们必须了解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也就意味着不容外国人介入……无论如何并没有一种力量可以取代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不是一句空话。它的确为几十年的经验所证实和检验。”他不同意我所说的大部分观点。“至于结束这中美关系中令人不快的一幕,让我再重申一遍,我们只能看美国将采取什么样的步骤。”说完这些话,他离开了这次讨论。

……

当我们结束了这次艰难的对话,我很清楚地看到了文化间的



冲突在我们之间造成了一个很宽的鸿沟。中方对外国的“干涉”的不满贯穿始终。他们关注的是安全和稳定。我们感兴趣的是自由和人权。不过,我此行的目的不是谈判——没什么要谈判的——而是做出一种努力以保持和一个民族的交流和联系,他们倾向于自我孤立,并由于长期受到外国人的侵略产生了仇视外国人的心理。双方都十分坦率而开放。我们互通了有无、倾听了对方的看法,但要跨过这道鸿沟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给我的印象是双方都决心不要让天安门事件毁掉两国关系。

本人认为,斯考克罗夫特对这次与邓小平会见的记载是真实而传神的。在私人关系上,邓小平一直把布什总统作为“老朋友”看待。但是,邓小平也实在地告诉斯考克罗夫特说,中国发生的动乱,有美国政策的因素,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各个方面都使中国陷入困境”。如果美国的目的得逞,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被颠覆,就有可能“引发战争”。邓小平始终认为,不是因为中国侵犯或影响了美国的利益,而是美国采取的行动很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利益,也损害了中国人的尊严。“至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中国有句谚语——‘解铃还需系铃人’。我们希望美国未来的行动步骤会寻求一些解铃的工作。”斯考克罗夫特对邓小平的这句话作了一个正确的理解——“这取决于美国不再火上加油”。斯考克罗夫特还向邓小平解释了一番关于美国虽然尊重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尊重中国的内政、确认拥有共同的战略利益的种种立场,但是,“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如何看待此次运动,同样地,是美国人民的内部事务。”斯考克罗夫特的结论是:中美“文化间的冲突在我们之间造成了一个很宽的鸿沟”。这是毫无异议的。美国始终认为干涉有理,但中国始终坚持内政不容干涉,这

① George Bush and Brent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106 ~ 110.



一点在当时确实无法调和。而无论如何,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下,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格尔伯格的秘密访问虽然不可能有什么戏剧性的效果,但是它对保持中美两国高层的接触,还是十分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斯考克罗夫特得出了一个印象,那就是“双方都决心不要让天安门事件毁掉两国关系”。

三、再度正常化

在斯考克罗夫特秘密访华后,中美关系仍然陷于不断恶化的危机之中。在其后的一段时期里,中美两国领导人也经历着一段艰难的、努力使中美关系回复正常的历程。

美国国务卿贝克在1989年6月下旬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作证时,就呼吁议员们要通盘考虑美国的总体利益。他认为,美国“应该有一种协调一致的方式,有一个声音讲话”。他说:美国正确的对华政策应该是平衡的和两方面都考虑到的,这就是“既要对践踏人权的行径表示愤怒,又要考虑到其他的利害关系,即经济上和地缘政治上的利害关系”。贝克还于7月末继续与中国同级别官员、外交部长钱其琛在巴黎举行的关于柬埔寨的会议上,以及在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进行了接触。^①

除了布什总统、贝克国务卿和斯考克罗夫特将军等在朝的官员以外,美国的一些政治家如前总统尼克松、前国务卿基辛格、罗杰斯、万斯、马斯基、黑格等和一些有影响的中国问题学者如鲍大可、哈定等,都对中美关系提出冷静、客观和务实的看法,并主张尽快结束美中之间的这种不正常的关系。在1989年10月,约翰·霍普金斯外交

^① 刘连第、汪大为:《中美关系的轨迹》,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280页。



政策研究所发表了一个有前福特、卡特和里根政府成员签名的所谓政策共识报告,这份报告强调了“美中合作对美国战略、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长期重要性”。该报告既强调中美关系的全面正常化将取决于中国结束镇压、恢复政治自由化,又呼吁尽量大力维护合作关系的基础。^①

1989年10月底,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布什总统的授意下访问中国。据当时尼克松的秘书莫尼卡·克罗利的看法:“尼克松相信他是惟一能够做这件事情的人。布什政府既要天安门事件作出反应,又想稳定中美之间的关系,处境十分微妙。总统迫于国内政治压力要制裁中国,又因外交的压力要与他们共事。尼克松认为,凭着他的地位、经验和对中国人的尊重,他是惟一可以直言不讳地传送不愉快的信息和可以重新建交的谨慎而乐观的美国人。他像以往那样以私人身份旅行,不受政治干扰,无须摆出外交姿态。只有尼克松可以比得上中国领导人务实家的智慧,警告他们倒退的严重后果,而且也只有尼克松,可以在回国后向美国总统提交一份清醒、冷静又现实的报告。”^②

据说,尼克松是卸任的美国总统中对布什总统影响最大的人,因此,邓小平是非常重视尼克松此行的。10月31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与尼克松交谈了一个半小时。邓小平在会见尼克松时表示了中国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几个基本立场。这次谈话,是“六四”风波后邓小平就中美关系所作的最重要的一次谈话。

在与尼克松的谈话中,邓小平首先高度评价了尼克松在1972年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明智和战略勇气,提出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

① 哈里·哈定:《脆弱的关系》,第340页。

② 莫尼卡·克罗利著,杨仁敬等译:《冬天里的尼克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6~237页。



该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和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应该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接着，邓小平坦诚地说出了一段名言：“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邓小平虽然点明了美国对在北京不久前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是有责任的，并指责美国在中国煽动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潮的这个问题上卷入得太深了，但是，邓小平还是表示，中美之间可以“结束这几个月的过去，开辟未来”。在重申了与斯考克罗夫特谈话时所申明的中国政府的立场、阐述了中国国内稳定压倒一切的必要性以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必须有国权和国格的道理后，邓小平叮嘱尼克松：“请你告诉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最后，邓小平抓住美国不愿放弃中国市场的心态，表示：“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我们欢迎美国商人继续进行对华商业活动。”^①

尼克松访华返美后，立即给美国国会两党领导人写了一份报告。在递交国会两党领袖的一份报告里，尼克松认定保持对华合作关系符合美国的利益。中国将“在抗衡日本和苏联在亚洲的势力方面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控制先进常规武器的扩散、防止核扩散、讨论环境问题及处理地区争端方面，中国也将扮演必不可少的角色。中国有朝一日必将成为一个经济和军事强国。尼克松总结说，美国把自己排除在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之外不啻莽撞之举，更不必说华盛顿要“在下个世纪冒险与中国为敌而不为友”。尼克松建议重新同北京建立高

^① 邓小平与尼克松谈话的全文见附录一(8)，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30～333页。



级官方接触。他承认两国都须采取许多步骤,以恢复较正常的关系。中国须改进其人权记录,改善外国投资环境,解决关于方励之问题的争执,恢复天安门事件后中断的文化和学术交流计划。美国须取消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允许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恢复对华贷款。但作为第一步,这位前总统建议同北京恢复高级接触。正如他所言,“孤立中国现在和未来的领导人,用他们视为不公正的反华行为来加重他们对美国的不满甚至仇恨,是不理智和事与愿违的。”^①

在给美国国会两党领导人撰写了报告的同时,尼克松也给布什总统写了一份18页的报告,题目是“中美关系的危机”。这份报告包含了尼克松对中国领导人和他们的政策的评价、对改变天安门事件期间政策的展望以及对改善中美关系的建议。尼克松首先确认:美国人和中国人用截然不同的观点来看待天安门事件,那是“完全无法逾越的”鸿沟。尼克松指出,1972年美国刚与中国接触时分歧极大:两家在越南、朝鲜、日本、台湾和意识形态问题上都有分歧。但我们认识到,我们却有着共同的、压倒一切的利益,那就是提出一项政策以制止抱有侵略及扩张野心的苏联对我们双方的威胁。今天,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和冷战可能结束,我们必须找到“能把我们连在一起的黏合剂”。为什么必须找到这一黏合剂,这对美国又有什么利益?尼克松解释道:首先,尽管苏联的威胁减弱,但潜在的苏中关系会对美国不利,不能苏中有对话而美中无对话。其次,中国是个核大国,我们需要为防止核扩散问题而共同努力,否则我们将无法阻止核技术销售到国际热点地区。第三,要在亚洲维持权力的均衡,美国与一个强大而稳定的中国的参与是很有必要的,否则朝鲜地区、台湾问题和印度支那将不得安宁。第四,中国将不可思议地变成一个经济强国,美国没有

^① 哈定:《脆弱的关系》,第340页。



理由把如此巨大的市场让给日本人和欧洲人。“十七年前我们寄予如此厚望的大门应该关闭吗？”所以，尼克松认为：美国不可能也不应该干预只有中国自己才能作出的抉择。但是如果美国继续孤立中国，将会长极左分子的威风而灭改革力量的志气。尼克松强调，要使支持邓小平改革的人占上风，那么美国与中国保持交往和合作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尼克松建议，双方都应该采取具体的步骤来弥合裂痕。美国方面应该取消经济制裁，继续为那些想到中国投资的人提供政府帮助，并继续通过国际金融机构为中国重要的项目提供融资。尼克松还建议，双方为恢复关系所采取的步骤时机和“舞台设计”是至关重要的，只能通过最高层之间的私人外交达成共识。最后，尼克松说：尽管存在分歧，但与1972年相比，中美关系的前景更为乐观，因为在当时，两国是为了对抗共同的敌人走到一起的，而现在是经济进步与和平的希望把两国联系在一起的。^①

1989年11月7日~10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应中国外交部的邀请来华访问。邓小平与基辛格的这次会见，是邓小平辞去他的最后一个职务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后见的第一个客人。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位记者的记录，会见的气氛非常好，85岁的邓小平神采奕奕，当基辛格走进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时，邓小平高兴地迎上去紧握着他的手，他们站着说了好几分钟的话。

邓小平：博士，你好。咱们是老朋友之间的见面，你大概知道，我已经退下来了。

基辛格：我昨天听到了消息，但你仍将始终有很大的影响力。

邓小平：你不反对吧？

基辛格：我赞成。

^① 莫尼卡·克罗利：《冬天里的尼克松》，第238~241页。



邓小平：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制度。中国现在很稳定，我也放心。

基辛格：我相信，你在中国的未来也将起到重大的作用，正像你过去起的作用一样。

邓小平：因为我是中国公民，还是共产党员。公民有权利有义务，党员也有权利有义务。我的作用就是一个普通公民，一个普通党员，需要的时候，他就起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两个方面的作用。你现在不是不当国务卿了吗？还不是照样为国际事务奔忙？

基辛格：我也只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同时，我知道，你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基辛格作为中国的老朋友，即使在“六四”后的那段日子，也没有附和那些对中国政府的责骂，反而为中国政府作了许多解释。他有一句名言：“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政府能像中国政府那样容忍示威者占据一个国家的首都广场达六周之久。”尼克松把邓小平要求美国采取主动的“解铃还需系铃人”的话捎给了布什总统，事隔几天，基辛格就又把布什总统的回讯捎回给邓小平。11月10日，基辛格在会见邓小平的时候，转达了布什政府的意见，基辛格表示：美国的国家利益要求美国谋求同中国的谅解。但是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要得到国内的支持，还必须在反映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同时，反映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和传统。由于稳定与和平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两国应该采取“共同步骤”使双边关系更顺利地发展。^②邓小平则再次表示：中美合作的基础是有的。那种按社会制度决定国与国关系的时代过去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发展友谊，找到共同的利益。中美之间

① 魏赤娅：《我在采访中见到的邓小平同志》，载《大地》杂志，1997年第6期。

② 《中国外交概览，1990》，第311页。



肯定能够找到共同的利益。^①

1989年11月17日,邓小平在会见到访的美国前驻华大使伍德科克时又再一次表示:“中美要友好相处,这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稳定,有利于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我们不做伤害美国的事,美国也不能做伤害中国的事。这次美国官方使用的手段太厉害,甚至连回旋余地也没有留。中国是不怕孤立的,是不怕压力的,同中国闹僵没有好处。要尽早结束这个纠葛,最好不要超过今年,为什么八十年代的事情要拖到九十年代?不必讲谁占了上风,谁占先,谁胜利,也不能让世界的人认为哪一家输了,哪一家屈服了。解决中美之间半年纠纷,不管美国使用什么语言、方式,要在实质上结束制裁。我们希望短期内解决这个纠葛。作为一条原则,将来两国之间如果发生纠葛和争执,双方都应该采取克制态度来解决纠葛。”^②

邓小平与伍德科克的这次谈话也非常诚恳,并提出“结束这个纠葛最好不要超过今年”。但是无论如何美国“要在实质上结束制裁”。

1989年12月10日,斯考克罗夫特再次秘密来访,实践布什总统的两国应该采取“共同步骤”的建议,邓小平表示,可以双方都让点步,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邓小平与斯考克罗夫特的这次谈话,是从世界政治和和平的角度来看待中美关系的代表之作。邓小平提出:“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邓小平认为,近17年来,世界局势比较稳定,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分量不轻的一个原因。而且中国在国际上有特殊的重要性,如果中国动乱,那问题就大得很了,就肯定要影响世界局势的稳定与安全。为此,邓小平甚至还提出,中美之间连笔头上和口头上的打架都不要。只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就可以解决两国之间

^①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42页。

^②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43页。



的纠葛。最后,邓小平说:“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这是一句非常动情的话,显示出邓小平对中美关系的无比珍惜之心。^①

邓小平在“六四”后与斯考克罗夫特、尼克松、基辛格和伍德科克的会见和谈话,使中美两国在关系极其严峻的情形下,仍然保持在最高层的接触和对话。这对中美关系逐步解冻并走向正常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然,在公开的场合,邓小平也毫不客气对美国以及西方国家中国的制裁进行强烈的指责。

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李政道时,谴责了美国对中国搞“和平演变”。邓小平说:“西方世界确实希望中国动乱。不但希望中国动乱,也希望苏联、东欧都乱。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别国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中国的事情我们就得管。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行,不坚持社会主义不行。”^②邓小平还向李政道表示:第一,中国目前局势是稳定的。第二,中国人吓不倒。“请你告诉美国所有对我们友好和不友好的人,在判断中国局势的时候,这两点是必须看清楚的根本的两点。”^③

1989年10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时,谴责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在巴黎七国首脑会议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七大工业国决定使用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制裁中国。邓小平对之谴责说:美国也好,法国也好,他们的决策人至少有两点对中

① 邓小平与斯考克罗夫特的这次谈话全文见附录一(9),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0~35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5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7页。



国认识不清。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二十二年仗建立起来的;第二,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所以,外国的侵略、威胁这一套,在我们看来并不高明。”西方社会应该学会“怎样真正认识中国”。^①

1989年11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再次点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想对中国搞和平演变,并就人权问题发表了强硬的看法。邓小平说:“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邓小平训斥道:“西方国家说我们侵犯了人权,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侵犯人权。……他们谈人权是没有资格的。”“七国首脑发表宣言制裁中国,他们有什么资格!谁给他们的权力!”“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②

1989年12月1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樱内义雄时,表示了中国政府始终是要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的,并就人权问题再次对西方世界进行谴责。邓小平说:“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任何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动,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③

1990年4月7日,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时,回顾了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表示中国政府不怕西方的制裁,中国是一个政治大国,还将会在不长的时间内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中国要在“亚洲太平洋世纪”发挥重大作用。^④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8~32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44~345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48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7~358页。



1990年7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再次表示了中国政府不怕西方的制裁,并强调了中国永远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①

另一方面,邓小平在中国面临复杂的国际局面的形势下,向党内的领导高层也作了多次全面分析。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向中央政治局请求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时,与中央几位负责同志作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提出了中国在外交上的“韬光养晦”之策。在谈到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应策时,邓小平认为,在战争问题上,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没有世界大战。小的战争则不可避免。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保持警惕,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的形象。中国的立足点是: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但是真打起来也不怕。邓小平强调:在苏联东欧出现问题后,中国的旗帜不能倒。从策略上,我们对发达国家还是友好往来。“朋友还要交,但心中要有数”。“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总之,邓小平认为:“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②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与中共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就世界形势和格局谈了总体的看法。邓小平认为:“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中国……怎么样也算一极。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9~36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9~321页。



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紧接着说:“具体的做法,还是要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对苏联对美国都要加强来往。”在政治风波过去后仅九个月,中国还处在美国的严厉制裁之中,邓小平就具体地在内部指示要加强对美国的来往,邓小平还提醒说:“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①

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与中共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提出了要把“不当头”当作中国的“根本国策”。邓小平说:“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邓小平还提出:“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②

综观邓小平在“六四”后处理中美关系的方略,就是这“二十字诀”: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③

所谓的冷静观察,就是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此外,对于党内的一些同志来说,也不要头脑发热,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3~35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3页。

③ 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1995年12月12日在外交部邓小平外交思想研讨会开幕式上讲:“邓小平同志纵观全局,对形势突变及时作出了精辟的论断,……及时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战略方针。”载《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不能因为美国和西方社会对中国进行制裁就一下子倒回去。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不应该走回头路的,我们还是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虽然西方世界对中国想搞“和平演变”,但是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中国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在西方国家之间,在美国的政治集团内部,也是矛盾大得很,多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还刚刚暴露。我们要善于利用,利用他们内部的矛盾和不一致,瓦解他们对中国的围攻和制裁。邓小平一再叮嘱,要“要冷静、冷静、再冷静”。

所谓的稳住阵脚,就是在苏联、东欧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崩溃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要自乱阵脚。我们既要高举社会主义的大旗,更要立足于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苏联、东欧乱了,但是中国自己不能乱。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是要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希望。中国只要沿着改革开放的方向搞下去,就可以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邓小平认为,只要中国站住了,还有世界上占五分之一的人口在搞社会主义,就可以证明社会主义是成功的。如果中国真正按计划实现了第二个翻番,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如果到21世纪中叶基本上实现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而中国乱,就不仅是中国之祸,还是世界之祸。中国不但要对自己负责,还要对世界负责,对全人类负责。

所谓的沉着应付,就是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对美国和西方国家制裁中国的行径,既要敢于揭露,无情指责,又不要害怕。要敢于声明中国从来就不怕制裁,不怕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经过22年的战争打造出来的,在过去美苏两霸围困中国的时候,中国照样可以生存。但在同时,也要留有回旋余地,“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做到“朋友还要交,但心中要有数”。“要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对苏联对美国都要加强来往。”

所谓的韬光养晦,就是要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不当头”。在外



交上,中国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不扛大旗不当头”^①做到中国古人所说的“韬光养晦”。在中国的成语中,这个“韬光”是韬剑之光,意指在时机未到的时候,要忍辱负重,待时机成熟,再拔剑而起。邓小平引用这句成语,作为其时中国外交的方针,是极具谋略,有着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深意。

所谓的有所作为,就是要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方面、在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方面和在联合国的舞台上发挥作用等方面。邓小平认为,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总之是一个多极的世界。在这个多极世界中,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社会主义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政治大国,还将是一个经济大国,中国还将在即将到来的“亚洲太平洋世纪”发挥重大作用,为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发展作出贡献。

邓小平在 1989 年政治风波后所形成的这些指导中美关系和中国整个对外关系的方针,是邓小平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基于国际政治局势变化而作出的正确判断,也是他外交思想的最新发展。在这些方针的指导下,中国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安全,避免了国际斗争的风口浪尖,避免了意识形态的争论、缓和了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的严重对抗、加强了与第三世界的友好联系,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交局面。

通过两国领导人所确认的“采取共同步骤”、“双方都让点步”的共识,实际上,从斯考克罗夫特特使的第二次访华算起,中美两国领导人就开始逐步地努力稳定和修复两国之间的关系。

在斯考克罗夫特第二次访华返国后几个星期,美国政府就取消

^① 《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第 11 页。



或减轻了“六四”后对中国制裁措施中的三项:1989年12月19日,美国政府批准了3颗美国通讯卫星的出口许可证,允许使用中国火箭将它们送入运行轨道,此举等于是取消了国会的全面制裁法案的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同日,白宫宣布将恢复进出口银行的对华贷款,遂排除了国会在即将产生的立法中建议但尚未授权的一项制裁,此为第二项。第三项在1990年1月10日,美国政府表示将不再反对世界银行的所有对华信贷,但将逐一考虑那些用于满足中国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的项目。

中国随后采取的一些措施也被视作是对美做出的和解姿态。中国外交部在12月否认关于其将向叙利亚出售M-9型导弹的报道,并称之为“无稽之谈”,还第一次公开阐明了中国“没有也不打算向任何中东国家出售任何中程导弹。”中国政府还开始取消在美国对中国实施制裁后对中美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实行的部分限制:同意重新接受“美国之音”的一名记者;同意恢复富布赖特学术交流计划中的教授和学者访问计划。在1990年1月10日,北京市政府取消了自上年5月20日起一直在首都实行的戒严。一周后,又宣布释放近600名在参与动乱中被逮捕的人。^①

另外,在美国政府和国会之间,关于如何制裁中国的问题,却从“六四”后的高度一落变成了长期的纷争。

在1989年11月3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个关于允许留美国学生在签证期满后继续留在美国的提案。对这个《1989年紧急放宽中国移民法案》,布什总统给予了“搁置否决”,但是众议院又在1990年1月24日以390票对25票的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推翻了总统的否决,在1月25日的参议院投票中却没有得到三分之二的多数

^① 哈里·哈定:《脆弱的关系》,第343页。



通过对总统的否决。^①被布什总统“搁置否决”的另一个议案,“国务院授权法案”及其附在上面的制裁中国的修正案,却在1990年1月30日由参众两院重新投票通过。这样,美国国会就以立法形式确定了对华制裁措施。

1990年5月24日,布什总统宣布,决定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一年。对此,美国参众两院反应激烈。以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切尔和赫尔姆斯以及众议院的兰托斯和佩洛斯为代表的一大批议员们,强烈主张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10月,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的议案。由于参议院未能在国会休会前就此项议案进行投票,根据美国的法律,这项议案无效。此后,在1991年和1992年,都出现了类似的局面。布什总统每年都决定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一年,然后在众议院都以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的议案,旋即布什总统否决众议院的议案,最后由于参议院以过半多数但未足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而无法最终否决总统的意见。因而,在布什总统的任期内,中国都保留了最惠国的待遇。^②

在中国最惠国的待遇问题上,美国的行政当局与国会的矛盾和冲突尖锐而又复杂。这不但是观点不同的问题,而且还纠缠着美国党派政治的斗争。由于民主党控制着国会并着眼于1992年的大选,所以,在中国人权问题上与共和党斗法,民主党自认为是“双赢”的,要么在国会推翻总统的决定,要么逼共和党政府为中国辩护,从而在美国民众中留下骂名。^③而在中美两国政府间恢复正常关系的努力中,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且还因为被

① 哈里·哈定:《脆弱的关系》,第348页。

② 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可参阅武桂馥:《最惠国待遇与中美关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王勇著:《最惠国待遇的回合1989-1997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③ 民主党参议员米切尔的这一谋略参阅《A GREAT WALL》。



附加了许多条件诸如所谓“释放政治犯”、“停止迫害民运人士”、“自由移民”、“宗教自由”、“防止武器扩散”、“制止劳改产品出口”等等而具有复杂的和政治筹码的意义。

1990年11月,中国外长钱其琛到美国纽约参加联合国安理会部长级会议讨论海湾危机问题。在表决联合国授权美国等国对伊拉克使用武力时,中国投了弃权票。中国的这一弃权票,以及投票后钱其琛与布什总统进行的会面,应是邓小平亲自导演的一出好戏。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军队借口科威特偷采伊拉克石油,入侵并占领了科威特全境。伊拉克的侵略行为,激起了世界各国对它的谴责。联合国安理会在8月份连续通过了五项决议,强烈谴责伊拉克的入侵,并宣布它对科威特的吞并无效,要求伊拉克立即从科威特撤军。对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和部分阿拉伯国家组成多国部队,准备军事方面的解决。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反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态度是坚决的,但是,由于其时中国正处在美国的制裁之中,所以,中国政府对于美国的行为是十分警惕的,对于联合国决议的态度则是微妙的。从1990年8月到11月,联合国安理会在讨论海湾局势时,有过十一项决议,对于这些谴责性和制裁性但不涉及武力的决议,中国政府都投了赞成票。但是,当美国力求通过联合国采用武力解决伊拉克-科威特问题时,中国的态度就变得暧昧了。1990年11月19日,美国国务卿贝克从巴黎给钱其琛打电话,希望中国能投票赞成联合国使用武力驱逐伊拉克的678号决议。贝克还说,中国投赞成票或弃权票,美国将邀请钱其琛访问美国,并暗示,要是中国投赞成票的话,钱其琛可能在11月30日在华盛顿见到布什总统。当时,钱其琛不置可否。据一位当时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工作的高级官员的说法,邓小平对如何在安理会上投票有三点指示:“第一,弃权;



第二,作一个简短说明;第三,要重申中国的立场,但字句上要多斟酌。”

①在当时的形势下,中国采取弃权的方式是最佳的。在美国仍在制裁中国的情况下,中国没有理由全面支持美国,但是也不宜反对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11月29日,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678号决议上投了弃权票。随后,钱其琛外长对中国在安理会678号决议上的立场作了说明。会议结束后,钱其琛外长应邀于11月30日作正式访美,并与布什总统进行了会面。这是1989年6月后中国政府这一级别的高级官员第一次访问美国,两国也从此恢复了高级官员的公开接触。在12月份,布什总统从南美访问回国后,随即向国会提出延续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建议。外界认为,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678号决议上投了弃权票与两国恢复了高级官员的公开接触、及布什总统向国会提出延续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建议,就是中美利用海湾局势进行政治交易的结果。②实际上,由于中国投弃权票是当然的,所以中国是“不劳而获”,这是中国外交上的一个胜利。而美国政府愿意为一顿免费的晚餐付费,本人认为,这应是美国政府为避开舆论和国会的压力而采取的一个与中国修好的“假痴不癫”之计。

1990年12月,世界银行年会对是否恢复对华贷款进行表决时,美国代表投了弃权票。于是在1991年度,世界银行对中国提供了15.79亿美元的贷款,基本上恢复到1989年以前的水平。

1991年11月15日~17日,美国国务卿贝克正式访问中国。这也是1989年6月后美国政府这一级别的高级官员第一次访问中国,正如贝克所言,“我的访问意味着暂停高层接触的制裁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③在贝克访问中国时,邓小平已经有一年多没有会见外宾

① YOUWEI CHEN:《中美外交内幕》,台北:正中书局,1999年版,第285页。

② 《脆弱的关系》,第361~369页。

③ 《美国对华制裁情况回顾》,《参考资料》1995年2月24日。



了,所以贝克想会见邓小平的愿望没有实现,但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国家主席杨尚昆和国务院总理李鹏都会见了贝克。在这次访问中,中美双方就一些问题达成了协议和谅解。美国方面表示,美国支持中国作为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参加关贸总协定,台湾作为单独关税区加入。中国方面则就知识产权问题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双方还商定,将在华盛顿举行会议,解决美国对中国进行“特别条款301”调查的问题。

作为贝克访华的成果,1991年12月29日,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批准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决定;1992年1月17日,中美双方就保护知识产权问题达成谅解备忘录;2月2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取消在1991年6月宣布的三项制裁。至此,中美关系出现了重大的转机。

1992年1月31日,中国总理李鹏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安理会首脑会议期间,与美国总统布什举行了会晤。1992年7月美国新闻署署长卡托,8月军控与裁军署署长莱曼先后访问中国;12月参议院外委会主席佩尔访问了中国西藏。1992年12月9日,中国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率领中国政府科技代表团访问美国。正式恢复了中美科技领域的双边关系;12月17日,中国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和美国商务部长富兰克林在北京共同主持第七届中美商贸联委会,在会上,中美共签定了价值10亿美元的合作协定。12月22日,布什总统决定了结1989年中止的四宗对华军售项目。

这些交往说明,到1992年年底,布什政府任届结束以前和中共十四大召开时,中美关系已基本恢复正常。

我们在回顾1972年~1992年中美关系的历史时可以看到,在这20年间,中美之间的关系是经历了一个波澜起伏的发展历程。1972年尼克松历史性的访问中国是影响深远的。随后,中美建交、中美签



订“八一七”公报以及中国 1989 年政治风波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制裁与反制裁,是尼克松访华后 20 年间中美关系中的三件大事。而造成这三大事件的原因,是与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中美台三方关系的互动以及中美两国国内政治形势的走向等各种因素密切相关的。中美两国的关系,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背景下日渐成熟地发展起来。著名的美国学者哈里·哈定将这种关系称之为“脆弱的关系”。而且,哈里·哈定的观点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还得到了中美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但本人经过认真而审慎的研究和思考认为:这 20 年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历程证明了,中美关系是一种“坚韧的关系”。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政治经济体制都明显不同甚至还尖锐对立,但是,基于两国关系正常发展所带来的“战略利益”,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不论有多么大的风波,都能安然度过,即使是美国不顾中国的面子和民族感情顽固坚持卖武器给台湾,或是中国义正辞严地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甚至出现像“六四”这样的事件,中美两国的关系都能够坚韧地保持并跳跃式地向前发展。中美关系的“战略利益”之所以如此坚实,是因为它不仅给中美两国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带来莫大的好处,而且,还关系到亚太地区的安全和世界局势的稳定。在这 20 年间,中国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虽然有过战略调整,但基本上一以贯之的是邓小平的思想和对策。邓小平以一个大国领袖的胸怀,始终从全球战略的高度来审视和处理中美关系。而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尽管是历任总统略有不同——风格不同、感情不同、意识形态的偏好不同——但重视中国的国际战略地位的观点却是基本相同的。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中美关系所具有的“坚韧”的基础。



第四章

统筹全局的战略观

作为中国这么一个大国的领袖，在处理国际事务和制定外交政策的时候，都会有一套完整的全球战略思考。在毛泽东时代的后期，有“三个世界”的理论，在邓小平时代，则有他的“东西南北”论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新主张。邓小平的“东西南北”论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新主张，乃是基于对变化着的世界格局的冷静观察而形成的一种全球战略观。邓小平的有关中美关系的所有考虑，都是与他的“东西南北”论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这一套全球战略观相一致的。在邓小平的思考中，中国的对美外交，是中国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的组成部分。

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中美关系的基础。中美两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冲破意识形态的障碍握手言和，就是基于这种战略关系给中美两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带来的好处。邓小平在处理中美关系的 20 年间，一直都是以“战略的”眼光来看待中美关系的。在中美关系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邓小平都在不断提醒他的同志们和美国的朋友们，要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待和维护中美关系。邓小平在中美关系问题上所表现的战略观，是他高瞻远瞩、善于从大局



着眼的宏观思维的一个突出表现。

一、“东西南北”论天下

根据 20 世纪 60 年代世界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格局变化的形势，中国领导人的全球战略思想也作了重大的调整。首先是毛泽东摆脱了意识形态的羁绊，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沦。邓小平主政中国后，又根据时局的变化，在“三个世界”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东西南北”论。

新中国成立后，在二战结束后世界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垒中，中国是明确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但是，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的中苏论战到 60 年代末的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中苏两国的矛盾激化了，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也不存在了。与此同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大批国家获得了独立。这些新独立的国家通过不结盟运动和进行反帝反殖反霸的斗争，国际影响力日益提高。西方阵营内也开始出现了分化，美国与西方其他发达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矛盾不断出现，美国的指挥棒越来越不灵了。看到这一变化了的世界形势，毛泽东认为世界局势出现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据此，毛泽东逐步形成了他的“三个世界理论”。

“三个世界”的说法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已经在国际上流行。1956 年，法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首先使用了“第三世界”这个词。按照索维的解释，“第三世界”一词系从法国“第三等级”一词演变而来。在封建时代的法国，所谓的“第三等级”是指农民、手工业者和资产阶级；第一和第二等级则是指僧侣和贵族。从索维开始，西方的学者们通常把亚、非、拉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非工业化国家称为



“第三世界”或“第三集团”；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称为“第一世界”；把苏联及其盟国和社会主义国家称为“第二世界”。但是，毛泽东对“三个世界”的划分，是明显地不同于西方学者的概念。

1963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国际形势时指出：“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①1964年1月17日，毛泽东在同几位外国专家的谈话中又谈道：“美国现在在两个‘第三世界’都遇到抵抗。第一个‘第三世界’是指亚、非、拉。第二个‘第三世界’是指以西欧为主的一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有些还是帝国主义的、国家，这些国家一方面压迫别人，另一方面又受美国压迫，同美国有矛盾。”^②这里，毛泽东所说的“中间地带”和“两个‘第三世界’”实际上就是后来“三个世界理论”中的“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正式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但是比第三世界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③

中国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属于毛泽东的，但是将之进行全面的、系统的论述却是邓小平。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第一次系统地向全世界阐明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他说：“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是第

①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06～507页。

②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14页。

③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600～601页。



三世界。处在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①接着,邓小平按照毛泽东的思想,对“三个世界”各自的划分标准、相互关系和历史地位以及第三世界面临的政治、经济任务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述。邓小平在阐述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时,把美国和苏联划为“第一世界”,指出美苏两国是“原子弹多,也比较富”,对外都想争夺世界霸权,他们对世界霸权的争夺构成了新的世界大战的策源地,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同时,美苏两霸都想极力控制第二和第三世界,是世界各国的最大的剥削者和压迫者。因此,它们推行霸权主义与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就成为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对于“第二世界”的分析,邓小平指出,“第二世界”国家是工业发达的国家,它们在政治上与美国、苏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甚至是美苏的盟国。但是,“所有这些发达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着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威胁或欺负,其中有些国家在所谓‘大家庭’的幌子下,实际上被超级大国置于附庸的地位。”因此,“第二世界”国家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们中的一些国家至今仍然保持着对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和控制,同第三世界国家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另一方面,“这些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摆脱超级大国的奴役或控制,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的要求。”因此,“第二世界”国家是我们进行反对霸权主义斗争中可以联合的力量。而第三世界国家“受的压迫最深,反对压迫,谋求解放和发展的要求最为强烈”。它们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至于中国,邓小平宣称:“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殖民主

^① 邓小平:《在第六届特别联大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74年4月11日。



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同时,“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摆脱了以往意识形态的羁绊,客观地揭示了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政治力量分化组合的基本态势,为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设定了一个合适的角色。在当时的形势下,毛泽东已经把美国与苏联的争霸置于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方面,对世界政治力量的划分不再以意识形态为标准,而是以是否反对霸权主义为标准。毛泽东的全球战略思想就是要建立国际的“反帝统一战线”和“反修统一战线”,特别是,在苏联争霸世界的风头正盛,而美国处于战略收缩的格局下,从中国的国家安全出发,毛泽东更强调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反修统一战线”的建立。正是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中国与美国才可能化敌为友,握手言和,毛泽东才有可能与美国谈到在中美之间建立“政治关系”,提出从中国到美国、日本、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要结成“一条线”的联合反苏战略。^①从而使国际政治军事格局出现了有利于中国的新的局面。

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的理论对邓小平的全球战略观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实际上,从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之初,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邓小平基本上是以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和进行反对霸权主义作为中国外交的战略重点的。在1977年10月18日,邓小平在与正在访问中国的巴基斯坦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齐亚·哈克上将谈论国际形势时,还是坚持毛泽东的战争不可避免论。邓小平对齐亚·哈克上将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威胁着全世界人民。现在需要的不是掩盖这个问题,而是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看清楚两霸发动战争的危险,特别是苏联发动战争的危险,看清楚世界各

^① 威廉·伯尔著:《基辛格秘录》,第87页。



个地区一切问题的灾难根源,主要的(不是全部)是两霸争夺世界霸权。”^①

但是不久,在中央军委的内部会议上,邓小平已经敢于突破“两个凡是”的束缚,突破传统的战争不可避免论,提出战争可以延缓爆发的观点。在会见齐亚·哈克上将的两个多月后,即1977年12月28日的中央军委会议上,邓小平指出:“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所以,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②

从1978年中美建交谈判到1979年3月,中国外交基本上是奉行联合抗苏的“一条线”战略,但同时,中国始终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口号。正如邓小平在1978年8月10日会见来访的日本外务大臣园田直时所说:“反霸是不针对第三国的,但有一条,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③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一次中央干部会议上表示,中国在80年代主要要做三件事,其中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邓小平认为:“全世界都估计到,80年代是个危险的年代。反对霸权主义这个任务,每天都摆在我们的议事日程上。80年代的开端就不好,发生了阿富汗事件,还有伊朗问题,更不用说早一点的越南问题、中东问题。这样的问题以后还会很多。总之,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始终是作为一项严重的任务摆到我们国家和全国人民的日程上面就是了。”“80年代无论对于国际国内,都是十分重要的年代。国际上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问题,但是,可以说是非常动荡、充满危机的年代。当然,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

① 《伟人的足迹》,第161~162页。

② 《伟人的足迹》,第164页。

③ 《伟人的足迹》,第158页。



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不仅世界人民,我们自己也确实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所以,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是假话,是真话。这不仅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①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中国的国际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在上述的讲话中,邓小平继续申明他的“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的观点。而且,邓小平指出:不仅世界人民,而且我们自己也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仅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这表明了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已经开始把和平问题作为中国的全球战略目标来考虑。

1982 年以后,苏联几位领导人相继去世,政局动荡,其对外扩张的步伐也明显放慢。到 80 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新思维外交”,实行战略收缩,从而推动了美苏及东西方新一轮的缓和。与此同时,中苏关系也开始松动和改善,中国的对外关系进一步向全方位方向发展,中国的国际环境进一步好转。

在国际形势总体趋向缓和的大势下,经济改革与发展就成为各国国策的重点。中国及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掀起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浪潮,西方各国的经济也进入了一个全面调整和复兴的时期。在这样的时世下,邓小平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他对世界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

1982 年 8 月 21 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新当选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就中国与第三世界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中国对世界和平的渴望等重大问题作了一番详细的论述。^②邓小平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39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415 ~ 417 页。



这次与德奎利亚尔谈话的时间背景,是中苏关系尚未得到改善,而正与美国里根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僵持不下的时期。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把中国的对外政策概括为三句话,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和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邓小平认为:第三世界是真正的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对于人们所说的“中国在第三世界处于特殊的地位”、“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等等,邓小平则从“真实的政治考虑”出发而予以婉拒。在战争问题上的观点,邓小平认为,虽然“战争的因素在增长,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在当时,中国正面临发展和摆脱落后的任务,所以邓小平是希望至少为中国争取五十年到七十年和平时间。邓小平不久后在一次谈话中确认:战争至少十年打不起来。1983年3月2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就谈到:“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该上的要上。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①在这次谈话以后,邓小平对于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问题是考虑得越来越多,越来越重了。

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强调中国对外政策的原则一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二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邓小平还说:“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②在与巴西总统菲格雷多的谈话中,邓小平已经明确地意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6页。



识到,世界上的问题就是两个问题比较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另一个就是南北问题。

1984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坦诚地表达了中国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新观点。在会谈中,邓小平表示:从中国的利益出发,中国最不希望发生战争,中国需要和平的环境来发展自己。因此,中国必须同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合作,这就包括改善同美国、苏联、欧洲和日本的关系,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合作,以维护世界和平。^①

1984年10月31日,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的谈话中,对国际重大问题的思考已经基本成熟了,确认世界的和平问题和南北问题是带有全球性、战略性意义的问题。邓小平说:“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现在世界上北方发达、富裕,南方不发达、贫困,而且相对地说,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南方要改变贫困和落后,北方也需要南方发展。南方不发展,北方还有什么市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发展速度问题,再发展问题。所以,南南合作还有一个意义,可以推动南北合作。”邓小平并强调:“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②

到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终于完整地提出了他的全球战略观——“东西南北”论。邓小平说:

对中国的发展,国际上可能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他们从各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6页。



种角度来分析,中国的发展对他们有利还是有害?我想从两个角度来考察和回答这个问题,一个是政治角度,一个是经济角度。

从政治角度说,我可以明确地肯定地讲一个观点,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过去,在国际上有人认为中国是“好战”的。对这个问题,不仅我,还有中国其他领导人,包括已故的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都多次声明,中国最希望和平。中国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领导的时候,就强调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并认为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因为我们讲的战争不是小打小闹,是世界战争。打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别人没有资格,中国没有资格,日本没有资格,欧洲也没有资格。所以,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也就是维护世界和平。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制定中国的国策,同样也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总起来说,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核武器谈判,外层空间武器谈判,看不出有什么进展。所以,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后来我们的观点有点变化。我们感到,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日本人民不希望有战争。欧洲人民也不希望有战争。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希望自己发展起来,而战争对他们毫无好处。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从政治角度来说,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对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都是有利的。世界上的人在议论国际局势的大三角。坦率地说,我们这一角力量是很单薄的。我们算是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又是小国。大是地多人多,地多还不如说是山多,可耕地面积并不多。另一方面实际上是个小



国,是不发达国家或叫发展中国家。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现在这个力量还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我可以大胆地说,到本世纪末,中国能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也就是我曾经跟大平正芳先生讲的达到小康水平,那时中国对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肯定会起比较显著的作用。

再从经济角度来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我过去跟很多日本朋友谈这个问题,跟欧洲朋友、美国朋友也谈这个问题,他们脑子里也是装了这个问题。现在世界人口是四十几亿,第三世界人口大约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其余四分之一的人口在发达国家,包括苏联,东欧(东欧不能算很发达),西欧,北美,日本,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共十一二亿人口。很难说这十一二亿人口的继续发展能够建筑在三十多亿人口的继续贫困的基础上。当然,第三世界有一部分国家开始好起来,但还不能说已经发达了,而大部分国家仍处于极其贫困的状态,他们的经济问题不解决,第三世界的发展,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都不容易。中国这么一个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对外贸易额去年才刚刚达到五百亿美元。如果对外贸易额翻一番,达到一千亿美元,国际上的市场不就扩大了吗?如果翻两番,达到两千亿美元,中国同国际上交往的范围不就更大了吗?贸易总是一进一出的,如果达到翻两番,中国容纳资金、商品的能力



就大了。一些发达国家担心,如果中国发展起来,货物出口多了,会不会影响发达国家的商品输出?是存在一个竞争问题。但是,发达国家技术领先,高档的东西多,怕什么!总之,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

从1977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首次提出“战争可能延缓”的观点,到1985年3月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的谈话,邓小平逐步地完善了他的“东西南北”论。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这个判断,是一个十分正确的和对中国的历史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的判断,它把中国的整个政治、经济结构从“准战争状态”中解脱了出来,使中国的经济建设、人民生活和社会都走上了正常的和良性循环的轨道。而这一判断,对于中国外交政策包括对美外交政策的制定,更是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对此,本文将在第三节作更深入的探讨。

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在邓小平正式提出他的“东西南北”论后大约三年,到1988年,邓小平又把他的国际战略目光放到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目标上来。随后,国际形势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戈尔巴乔夫主政苏联以后,他的改革新思维使原来东西方之间紧张的战争对抗形势得到了很大的缓和。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华沙条约组织解散、苏联解体,原来所有的苏东国家全部宣布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这样,原来的东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对立没有了,笼罩在欧洲上空的战争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4~106页。



乌云也消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世界政治军事格局也由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是,和平与发展的问题,仍然是20世纪末国际间的两个最重大的问题。而邓小平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新主张,则变得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在旧的世界政治军事格局即将崩溃,新的世界政治军事格局还未见端倪的情况下,邓小平及时提出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新主张,充分显示了邓小平作为一个世界级大国领袖的敏锐和全局观。

17世纪以来,在国际关系上出现过许多协调国家之间关系的机制和准则,在大家认同并共同遵守的情况下而成为一种“秩序”。1648年10月24日,欧洲各大国共同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这个条约创立了通过国际和会和和约的形式解决国际问题的先例。它确立了国家主权独立、平等相处和领土完整等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创立了对违约国家进行集体制裁的案例。此约缔结后,缔约国开始互派常驻外交使节。1713年通过的《乌德勒支和约》使欧洲大国普遍接受了均势原则。至此,欧洲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政治秩序。此后在1815年建立的维也纳体系,也维持了欧洲近100年的和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8年的凡尔赛会议和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建立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但是,这一体系事实证明是不成功的。这一体系建立不久,便激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而造成了以美苏争霸为主导的东西方两大集团的冷战,冷战成了战后二三十年世界政治军事格局的最显著特征。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的政治军事格局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为冷战的一方——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国家——竟然不攻自破,分崩离析,所有国家在几年内都“改变了颜色”。这样,在过去的“两极体系”崩溃后,世界各种政治力量出于各自的战略地位考虑,都纷纷提出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和构想。



首先,在冷战的“胜利者”美国看来,冷战的结束是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的“不战而胜”,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成为世界历史的潮流,美国成为世界上处于领导地位的惟一超级大国。因此,美国的许多人便想乘着这种强大的势态,来建立一个美国领导下的单极世界秩序。在美国的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构想中,首先是要确立以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地位,同时与欧洲、日本等盟国协调合作,共同推行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推进世界经济的市场化和一体化,共同对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无赖国家”和恐怖主义、国际犯罪、贩毒等新的国际性安全问题。在这些前提下,可遵循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团结一致反对侵略,减少和控制核武器,公正对待所有国家人民等原则。值得一提的是,在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构想中,中国的地位也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在苏联崩溃后,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健全的同时还是共产主义的核大国,在国际上的军事和战略的地位更加令人注目。而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和无比巨大的中国市场,更增强了中国作为世界政治经济大国的地位。但是,在另一方面,特别是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以后,美国把中国作为“假想敌”的倾向加重,在对中国内政横加指责的同时,“中国威胁论”、“中国挑战论”、“文明冲突论”等言论也在美国朝野间流行。中国这样的一种“复杂的形象”,使冷战后的美国政府对华采取了“复杂”的、不冷不热的、不远不近的“接触战略”。

欧洲曾经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也是两大阵营冷战对峙的前沿阵地,所以冷战的结束,从和平和安全的角度来看,得利最大的正是欧洲。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西欧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念也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冷战结束后,虽然美国变成了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但是美国仍然没有力量独霸世界,因而,欧洲各大国主张,建立



美欧日三边协调的全球新秩序,但重点要放在欧洲。在 90 年代初,欧共体提出了实现欧洲统一的“三个同心圆计划”,第一个同心圆,是在欧共体内部。为此,欧共体相继作出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政治联盟等重大政治决策。首先把欧共体建成一个强大的政治、经济实体,以欧共体作为欧洲统一的轴心。第二个同心圆,是向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成员国扩展。第三个同心圆,是把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纳入到欧洲联盟当中。最终,建立一个全欧洲的政治经济大联盟。并以此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大作用。

日本也想趁此机会从小国外交迅速变成大国外交,把日本从世界经济大国变成世界政治大国,彻底摆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战败国地位。日本主张,新的国际秩序应由美、日、欧协调共管。日本还特别希望能够在亚太地区的国际舞台上发挥重大作用。日本主张的国际新秩序的原则,也是基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等共同的价值观念,主张尊重自由和民主;保障和平与安全;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下确保世界繁荣;确保人类理想的生活环境;在国际关系中争取以对话取代对抗等等。1993 年 3 月,日本政府还提出了对外开发援助四原则,即日本的对外开发援助要与受援国的军事支出动向、大规模破坏性武器的扩散动向、武器出口动向、民主化和人权状况相联系的原则,以保持与西方在国际安全观念上的一致性。

美国、欧洲和日本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构想,从总的来看,都是企图凭借自身强大的实力垄断国际事务;在意识形态上,推销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在经济制度上,则借开放的世界一体化的市场经济体系来保持自己的垄断地位。当然,在他们的主张中也有一些是冠冕堂皇的、合理的国际关系准则。

在两极体系崩溃和冷战结束以后,第三世界的国家也要求平等地参与国际秩序的重建,反对少数大国垄断、操纵国际事务。主张未



来的新秩序应遵循保卫国家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等原则。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重要一员,也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构想。^①

在两极体系崩溃以前,邓小平就预见到国际时局可能出现的新变化,从而明确地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

早在1988年9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斯里兰卡总理普雷马达萨时就说:“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新的政治秩序就是要结束霸权主义,实现阁下刚才提到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看来,最经得住考验的不是霸权主义,不是集团政治,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邻国之间的关系。解决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问题,都需要这些原则。”^②

邓小平这里所说的斯里兰卡总理普雷马达萨所提到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1955年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所提出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而早在1984年10月31日,邓小平在与缅甸总统吴山友谈话时,就提出过:“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③此

① 关于世界各方对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可参阅郝润昌等主编:《世界政治新格局与国际安全》,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陈启懋编:《跨世纪的世界格局大转换》,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杨净主编:《2000年: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何新:《全球战略问题新观察》,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

②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12~41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6页。



后,邓小平多次重申了这一主张。

1988年10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时说:“就我个人的知识来说,经得起考验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五项原则能够为不同制度的国家服务,能够为发达程度不同的国家服务,能够为左邻右舍服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虽然是亚洲的产物,也适用于全世界。所有国家应该能够接受这些原则。”^①

1988年12月2日,邓小平在会见以樱内义雄为团长的1988年度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时说:“目前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时期。国际政治领域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因此应该提出一个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理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和地区性霸权主义应该停止了,它们应该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代替霸权政治。不管是国与国也好,还是这一部分与另一部分也好,都应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际事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有生命力的。”^②

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更详细地谈到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邓小平说:“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那末应当用什么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呢?最近,我同一些外国领导人和朋友都谈到这个问题。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早在一九七四年我在联合国发言时,就用了很长时间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提,今后也还要提。至于国际政治新秩序,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这些原则的创造者

①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13页。

② 《伟人的足迹》,第356页。



是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这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我们向国际社会推荐这些原则来指导国际关系,首先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要遵循这些原则,而且我们同各自的邻国之间的关系也要遵循这些原则。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考虑,我们两国同邻国的关系应该做些调整。我提出这一建议,请阁下考虑。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不赞成的人会有不少,但只要有高度的智慧和战略的胆识,就一定可以完成。我想,我们就首先在阁下来访的新闻公报中体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①

1989年10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时说:“我们两国的关系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典范。最近一个时期,我多次向国际上的朋友们说,应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解决南北问题,还应该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使它同国际经济新秩序相适应。我特别推荐50年代由我们亚洲人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今后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准则。我们两国自70年代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可以说真正遵循了这个原则。”^②

从整个80年代邓小平的有关言论中,我们可以把邓小平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概括如下:

第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实现世界的真正的和平与发展,首先“就是要结束霸权主义”。世界霸权主义的特征就是少数几个大国凭借其军事和经济实力,欺负大多数小国、弱国。从世界历史的发展来看,这是世界不得安宁、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导致人类文明停滞和倒退的主要原因,也是奉行霸权主义的大国最终走向衰败和灭亡的根源。而在20世纪末的世界当中,还有一百九十多个主权独立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2~28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8页。



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各异的国家,要全人类服从于几个大国的指挥是行不通的。邓小平就说过:“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世界上那么多伊斯兰国家就根本不可能实行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穆斯林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向美国学习资本主义制度,中国人口也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还有非洲,非洲统一组织的强烈的普遍的呼声就是要求别国不要干涉他们的内政。这是世界局势的一个大背景。”所以,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中建立一种政治经济的新秩序以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霸权主义首先就必须结束。

第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邓小平经过反复思考认为: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最经得住考验的,能够为不同制度的国家服务,能够为发达程度不同的国家服务,适用于全世界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邓小平最强调的,是互不干涉内政这一条。在冷战结束后,西方少数几个大国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大的挑战,也就是把自己喜好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强行对别国推销,干涉别国的内政。所以,针对此,邓小平在1989年10月31日与尼克松谈话时就提到:“国家关系应该遵守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干涉别国的内政。”^①在1990年7月11日与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谈话时,邓小平更加强烈地说:“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他还说:“如果西方发达国家坚持干涉别国内政,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那就会形成国际动乱,特别是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动乱。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来摆脱贫困。政治不安定,谁还有精力搞饭吃?更谈不上发展了。所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30页。



以现在确实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现在出现的新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少数国家垄断一切,这种形式过去多少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今后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①在邓小平的心目中,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互不侵犯的具体体现,也是国家间交往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基础。

第三,邓小平认为:“改变国际经济秩序,首先是解决南北关系问题。”邓小平早在1985年把和平与发展概括为“东西南北”问题的时候就已经指出:“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到1988年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时候,也把解决南北问题作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首要问题。邓小平认为,国际经济新秩序应该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平等互利原则。在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少数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垄断,操纵了国际生产分工体系、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以不平等交易和在国际金融市场兴风作浪盘剥发展中国家,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对于在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南北经济差距越来越大的问题,邓小平有几点尖锐的看法,一是“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②所以“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③二是南北问题也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邓小平在与日本客人谈话时说:“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总之,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9~36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6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2页。



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①三是南北问题的解决重要途径是南南合作。邓小平在会见巴西客人时谈道:“我们主张南北对话。不过,单靠南北对话还不行,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南南合作。第三世界国家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合作,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前景是很好的。”^②

从上述邓小平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主张的内容中我们可以感觉到,邓小平的主张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主张有着本质的不同。首先,邓小平的主张是要结束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确保世界的普遍持久和平和共同发展,为此,邓小平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拥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而西方的主张还是要维护少数大国的霸权主义地位,以强权政治来维护他们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由他们来主宰和控制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从而达到长期操控世界的目的。在国际新秩序中有关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问题上,邓小平主张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主张各国有权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反对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不同来干涉别国内政。西方则主张以他们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等价值观来评判别国的事务,并以此来确定与别国的关系并干涉别国的内政,这实际上也是霸权主义的表现。在国际安全问题上,邓小平主张国与国之间应该和平共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用和平方式,通过政治谈判和协商来解决国际争端与分歧。西方则主张依靠少数大国的军事强权和组建军事集团来维持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在国际经济秩序问题上,邓小平主张改变旧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解决南北问题,建立平等互利、等价交换、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西方则主张建立开放的世界市场经济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5~10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6页。



体系,以其强大的资金、技术和市场优势保持他们在国际市场上的垄断地位。邓小平的这些主张,既是中国在这一时期国家利益的反映,同时,也代表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利益。这对于提高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地位 and 树立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总而言之,反对霸权主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解决南北关系问题,是邓小平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主张的核心。邓小平的这些主张,反映了他作为一个大国领袖善于站在全球战略的高度来观察事物的思维特征。邓小平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为中国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对美外交政策,提供了重要的思维和理论框架。

三、从战略的高度审视中美关系

邓小平对世界大局的“东西南北”的判断和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是中国从战略的高度审视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的框架。

在邓小平所提出的“东西南北”论中,所谓的“东西”问题,就是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的情况下和平共处的问题;“南北”问题,就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如何跨越贫富悬殊的鸿沟共同发展的问題。邓小平认为,从国际政治与经济的角度来考虑世界的战略问题,就是“和平与发展”的问题,就是“东西”与“南北”的问题。而在这一战略格局中,中美两国又都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中国乃是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同时又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则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头号政治、经济和军事大国,也是冷战结束后惟一的一个超级大国。中美两国在“东西南北”格局中所处的这种地



位,就不仅使中美关系在中美两国各自的外交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而且还超越了双边关系的性质而具有了影响整个国际社会的意义。

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中,不管是按照谁的想法去做,美国与中国都是世界力量的两个重要的“极”。邓小平在1990年3月的一次内部高层会议上,精确地分析了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指出旧的格局正在改变,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但无论如何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美国当然是一极,中国也算一极。邓小平强调说:“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邓小平认为: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但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这一条要反复讲。邓小平用嘱咐的口气对新的领导人说,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的“具体的做法,还是要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对苏联对美国都要加强来往”。^①

实际上,从70年代到90年代这20年间来看,邓小平本人都一直是从战略的高度来审视中美关系的。邓小平总是把中美关系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与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统一,与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全球发展联系起来考虑的。邓小平对发展中美关系有一个全局性的战略思想。

(一) 发展中美关系以开创和维护中国国内改革开放这个大局

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是邓小平对中国的一大历史性贡献。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后的禁锢和封闭的社会中,倡导改革开放并使之付诸实施,无异于一场巨大的革命。领导者不仅要有胆略和勇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3~354页。



气,还要有极其缜密的谋略和策划。中国在进行“文化大革命”的10年,正好是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十年。在这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的经济由停滞、倒退到接近崩溃的边沿;相反,美国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急速膨胀,日本则从战败国变成了世界一流的经济强国,连不久前还是战争废墟的韩国和小小台湾岛,都变成了经济繁荣的“新兴工业化地区”。这一巨大的反差,使中国的对外开放成为历史的必然。中国要是继续孤立于已经趋向全球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以外,继续增大与世界经济发展水平的反差,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邓小平的非凡胆略、富于历史感的洞察力和现实主义的精神,使中国共产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作出了实行对外开放的正确选择。

但是,对外开放也需要一个外部条件,那就是外部世界也要接纳和欢迎你的对外开放。这一点,在中国尤其是紧要的。在1978年以前,中国与苏联、东欧大部分国家、亚洲的蒙古、越南和印度等国都处于军事对峙的紧张状态,战争随时可能会爆发,经济关系则早已断绝。西方国家除与法国和英国等少数几个国家有外交关系外,与美国、联邦德国、日本等许多西方大国都没有外交关系,而且法国和英国等少数几个国家由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分歧以及中国长期的“极左”外交,与中国也没有太多实质性的政治和经济联系。可以说,其时的中国,基本上处于“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状态。所以,很明显,中国要在此时实行对外开放,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是非常必要的。

从1972年2月开始到1978年底,中美之间探讨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的时间已近七年。其间的种种障碍不一而足,有时机问题,也有具体问题。具体问题最关键的是台湾问题。到1978年11月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进行之际,亦是邓小平即将全面接掌中国政治权力并



提出改革开放方针之时,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是,台湾问题始终在中美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美国坚持,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美国要继续与台湾保持军事联系及售卖武器给台湾的问题,但中国始终反对这一点。在中美建交谈判的最后的關鍵时候,也是确立邓小平领导地位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重要时刻,邓小平罕有地,三天内四次从会议中抽身亲临谈判现场,当场拍板决定了许多重大的事情。在谈判的过程中,邓小平充分表现了他绵里藏针的性格特征,对美方是嘻笑怒骂皆成文章,最后,暂时放下了美国以后如何处理与台湾的军事关系问题,在最重大的关系正常化问题上取得成功。^①当年毛泽东说“世界事大,台湾事小”;如今邓小平则是“建交事大,台湾事小”。两位对国家大事的轻重缓急都是心中有数。可以说,中美建交谈判的成功,是邓小平敢于确立对外开放作为中国重大国策的重要基础。在正式建交的当天下午,邓小平作了一个讲话。在讲话中,邓小平把中美建交与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和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相提并论,作为中国政府在国内工作和国际事务中取得的“相当大的成就”,可见中美建交对于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重大的战略意义。

中美建交后,中国的国际环境迅速好转。这对中国实现把战略重点转移到经济工作上,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创造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外部条件。在此以后,邓小平在重要的时刻,都非常重视发展中美关系,并往往从保障中国的国内建设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的战略高度来考虑中美关系的持续发展。

当时,美国是世界上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而中国是一个比较“贫穷”的大国。美国的资金、技术和市场对于起步的中

^① 参阅第一章。



国是急需的。事实上,到 80 年代末,美国是中国的第三大外来直接投资者,仅次于香港和日本。除直接投资外,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金融组织的对华贷款和援助中,也有许多的资金是来自于美国。在技术转让方面,美国无论在规模和先进程度上都是位居前列,美国的公司通过贸易和投资,向中国转让了先进的计算机、通讯、石油和煤炭开采、化学和药品制造等方面的技术以及可用于军事用途的一些高科技技术。同时,在邓小平时代,美国也一直是中国出口产品的最大的海外市场,中国出口商品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都是投向美国市场的。美国是中国宝贵的创汇来源之一。所以,邓小平在后来总结说:“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①

此外,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影响着中国与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这一点,在中美关系改善之初,就已经非常明显。1972 年 8 月 24 日周恩来总理与朝鲜金日成主席谈话时就说:“这一突破,使世界上的国家都愿意跟我们来往了,中美来往的收获就在这里。”^②在中美建交前夕,1978 年 11 月 27 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时说:“如果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首先是使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安全和稳定的话,我想中美关系正常化,对全球的和平、安全和稳定比中日条约的意义更大。”在过去,西方以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跟随美国对中国采取不承认、孤立和遏制的政策。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带动了中国与整个西方国家的关系正常化,从而使中国的对外开放有了更广阔的空间。1989 年中国发生“六四”事件后,美国带头对中国实行制裁,整个西方世界也随之响应。邓小平要打破这个僵局,也把工作的重点放在美国。事实上,中国与西方世界的重新和解,首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32 页。

② 金冲及:《周恩来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110 页。



先也是与美国的和解。1991年11月15日~17日,美国国务卿贝克正式访问中国。这一访问正如贝克所言:“我的访问意味着暂停高层接触的制裁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西方世界对中国制裁亦随着贝克的访华而全面结束。可以说,中美关系是中国与西方关系的纲,中美关系的月圆月缺,紧密地关系着中国与整个西方世界关系的潮起潮落。

(二)发展中美关系以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推进统一大业

当年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中美上海公报的时候,就说过一段一针见血的话。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其实,这个公报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上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是不能两面作战。”^①在当时的中、美、苏三角关系中,美国实力最强,但战略在收缩当中;苏联貌似强大,正进行战略扩张;中国则是力量最弱的一方。而且,美苏间还有来往,中国却还要“反帝、反修”,两面交恶,处于尼克松所说的“愤怒的孤立”之中。所以,中国的处境是最艰难的。对此,毛泽东、周恩来是在承受着巨大压力的同时积极地考虑对策。在1969年6月~10月间,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师受毛泽东、周恩来的委托作了一个“战略研究”。这一“战略研究”的其中一个题目就是:“万一苏修对我发动大规模战争,我们是否从战略上打美国牌。”叶剑英认为:“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连孙吴,北拒曹操’,可以参考。”陈毅也认为:“当年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也可以参考。”^②这几位老师的观点可以说是深得毛泽东之意,毛泽东一向认为,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是“统一战线”,这一策略的充分运用,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应付最危险的敌人,

①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05页。

② 熊向晖:《历史的注脚——回忆毛主席、周恩来及四老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王永钦:《1969年——中美关系的转折点》,载《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



他下决心改善中美关系的出发点就是“联美抗苏保中”。

到邓小平在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考虑国家安全的时候，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虽然已有了改善，但基本格局没有大的变化，还是美、中、苏“三国鼎立”的状况。在 1978 年前后，苏联在全球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战略扩张行动，对美国 and 西方的威胁加大了。而苏联与越南的结盟所造成的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威胁，也是中国所不能容忍的。这样，对付苏联的威胁，就成为中美之间的共同需求。由于中国处在较弱的一方，所以，诸葛亮“东连孙吴，北拒曹操”的战略方针仍然是有现实的参考价值的。因此，为了中国的国家安全，“打美国牌”，或者说采取“联美拒苏”的战略方针，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发展中美关系对于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统一大业的积极作用还表现在台湾问题上。

台湾问题的形成本来就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结果。如果没有美国的介入，台湾可能在 50 年代就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怀抱。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时候，美国承诺了要与台湾废除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全部撤军；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这些，曾使邓小平感到非常高兴，邓小平以为，祖国统一的大业可以在他的手上完成了。在 1979 年的元旦，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举行座谈讨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的会议上讲话。他说：“今天是 1979 年元旦，这是个不平凡的日子。说它不平凡，不同于过去的元旦，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我们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了；第二，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第三，把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因此，今年这个元旦是值得特别高兴的日子。这三个特点，反映了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在国内工作和国际事



务中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①邓小平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了,那么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在1980年1月16日的中央干部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中国在80年代要做的三件事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加紧经济建设。邓小平在此时仍然觉得,台湾问题可以在80年代解决。在1983年到1984年间,邓小平富于政治智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主张,邓小平考虑:“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应该是能够接受的,台湾也应该是能够接受的。”^②从邓小平考虑的顺序来看,“一国两制”的主张能否被接受,第一是要看美国,第二才是看台湾。足见美国在邓小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心目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到了这个时候,邓小平也意识到了:“解决台湾问题要花时间,太急了不行。”^③邓小平一直希望,以发展中美关系来带动台湾问题的解决,但是,到1989年5月16日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时候,邓小平终于遗憾地说道:“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

虽然在整个邓小平时代,中美关系的发展并没有完全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台湾问题的解决最终还要视中美关系的走向,则是邓小平一个重大的战略判断。

(三) 在发展中美关系的过程中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在与美国的交往中,经常遇到美国轻视中国的观点,在中共党内,也有对自己的国力认识不足的情况。所以,邓小平时时在提醒人们说,虽然中国是个穷国、弱国,但中国同时也是个大国,也是多极世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6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6页。



界中的一极,美国不要小看中国,中国也不能小看自己。

1981年1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副领袖史蒂文斯和美国总统出口委员会副主席陈香梅时就表示:中国并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和不值得重视的国家,美国不要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发生错误的判断。如果有什么人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发生错误判断,那他起码不会有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①

1983年8月27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逊时,针对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轻视中国的战略地位,认为中国只能起地区性的作用,对全球无足轻重的观点提出:中国对国际安全和稳定并不是无足轻重的,美国要真正同中国改善关系,必须从全球战略来认识这个问题。^②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针对西方的制裁,对内、对外都宣扬中国块头大、制裁不倒的观点。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时就说:“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就是“因为中国块头这么大,人口这么多。”^③在中共内部的谈话中,邓小平同样对形势作出冷静的分析,邓小平说:“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④

邓小平在强调中国的大国地位的同时,也坚持在发展中美关系中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中美关系是一种既联合又斗争的复杂关系。邓小平在着力发展中美关系的同时,一直十分警惕美国右翼势力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在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75页。

②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65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9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3~354页。



斗争中,邓小平显示出了一个经过战争磨炼的大国领袖的“钢铁公司”^①风格。

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仅三个月,美国国会和政府就通过了一个《与台湾关系法》。美国通过这个国内法,使美国与台湾的军事交易“合法”化,对中国的统一大业起着极大的阻挠作用。美国的这个《与台湾关系法》,使邓小平清醒地看到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霸权主义的一面。在198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在致开幕辞时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②邓小平的这些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言辞,就是针对美国的这个《与台湾关系法》。

里根政府上台后,在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上采取了许多倒行逆施的言行,邓小平也毫不退缩地与之作了坚决的斗争,最后终于取得了“八一七”公报的成果。在签定中美“八一七”公报以后,邓小平已经强烈地意识到,中国必须从与美国的“一条线”联盟中退出。“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③中国“不能坐到别人的车子上去。我们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最有利于世界和平”。^④中国要做到真正的不结盟。这样做,“我们国家的政治分量就更加重了”。^⑤此后,终邓小平时代,中国不再提与美国的战略联盟关系,而是强调了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这个“谁”是既指苏联,也指美国。

① 毛泽东在1973年12月1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对邓小平的评价语:“柔里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见高屹:《历史选择了邓小平》,第3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7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6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2页。



在1989年中国发生政治风波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了所谓的制裁。在与美国进行的这场制裁与反制裁的斗争中,邓小平指示:中国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这样中国在国际上才能站得住。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与新组成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谈话时指出:“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为什么有中美苏‘大三角’的说法?就是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国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否则,只能是看着美国人的脸色行事,看着发达国家的脸色行事,或者看着苏联人的脸色行事,那还有什么独立性啊?”^①1989年9月4日,邓小平与中共中央几位负责人商量他“退休”问题时,对新的中央核心要做的事情作了许多交代,在如何维护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的问题上,邓小平说:“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②

对外界,邓小平则反复强调:“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1989年10月31日,邓小平在会见前来中国进行斡旋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又说:“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③1990年4月7日,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时也说:“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制裁是不管用的。中华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9~320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31~332页。



人民共和国是打了二十二年仗才建立起来的,是在被封锁、制裁、孤立中成长起来的。”^①

邓小平是一个彻底的爱国主义者。中国的强大,是邓小平毕生的奋斗目标。在与美国打交道的时候,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与最富的国家在打交道。但是,不管在中美关系发展的顺利时期还是在中美关系的危机时期,邓小平始终都认为,中国的“块头大”,这就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一股不可忽略的战略力量,也是美国人在对世界政治力量进行判断时的一股不可忽略的战略力量。正是在邓小平的战略思想指引下,中美关系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大国地位也不断得到了提高。

邓小平提出的“东西南北”论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新主张,是他成为中国的领袖后逐步形成的全球战略观。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对发展中美关系形成了三个带有全局性的战略思想:一是发展中美关系以开创和维护中国国内改革开放这个大局;二是发展中美关系以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推进统一大业;三是在发展中美关系的过程中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邓小平这三个战略思想,对于中国历史走向的影响之大,我们当代人可谓体会良深。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7页。